

微 言

必须把文根扎在厚土上

为什么生长在石山顶上的那些树老是那么矮小，老是那么枝叶稀疏，老是那么花果零落。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把根扎在厚土上。

当年提倡白话文，主张废止文言文的“先驱”们，从小都接受过读懂文言文的训练，因而把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华文化的厚土上，这才使他们成了参天大树。可自从废止读经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就读不懂文言文了。因而参天大树也就渐渐少了起来，以至于使我们这个时代成了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

凡称之为经的书，都是文言文中最好的书，都是经过文化长河数千年大浪淘沙，选出来的精品，把文根扎在那里，就可以吸收到极其丰富的“营养”，根深则果茂，源远流长，即使成不了“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儒，也绝不会成为一个文化侏儒，更不会成为一个废物。

有人一定会说西方文化先进，再怎么说明现代文化要比古代文化先进。就科技文化而言，从 16 世纪起，西方确实比东方先进，现代确实比古代先进。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就人文文化而言，东方不比西方落后，古人不比现代人落后。这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科技文化解决人类物质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不外：穿、吃、住、行、用五个方面。人欲不止，进步不止。人文文化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总括起来也是五个方面：仁、义、礼、智、信。知其所止，止于至善。

科技文化前人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个台阶，后人可以登上前人的台阶，去创造新的高度，后人永远在前人之上。人文文化前人留给后人的不是台阶，而是高度。孔子之后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了，尽管孔子说过“后生可畏”的话，可孔子对于后人来说至今依然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因此，科技文化一定要向西方学，向现代人学，而人文文化则要向东方学，向古人学。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犹如一部车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厚此薄彼也不可，可历史之舆总是在偏颇中行进着，这就给人类带来了不尽的祸患。对于中国人来说，不重视科技文化有外侵之患，不重视人文文化有内戕之祸，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科技文化如果没有人文文化作导航，科技就会给人类带来防不胜防天诛地灭的灾难。造假，历来都是利用高科技手段造出来的，毁灭人类，毁灭地球的器物更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二

十世纪是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世纪，二十世纪也是世界人文文化严重衰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还不知道把跑气多年的那个轮子补一补，历史之舆就快成“独轮车”了。高速运转的“独轮车”将会把人类带向何方，可想而知了。

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人人文文化的根扎的深不深，有没有德行，不仅对中国的前途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前途也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命，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精神是文化厚土培育起来的，而不是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1995年，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冰心、曹禺、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叶至善、启功等九位风烛残年的文化老人，在他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向中国人发出了《紧急呼吁》：“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他们希望能建立“幼儿古典学校”，期待“在有生之年听到弦歌，到古典学校里走一走，看看后继有人。”郭齐勇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建议《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进入中学生的课堂，其实《四书》首先应进入小学生的课堂，因为小学阶段不仅是人一生中记忆最好的年龄段，而且是入德立节的最好年龄段。佳县燕翼堂义塾。义教十多年来，所教教材主要是《四书》，免费教学，免费提供教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的时间实施教学。现在第一批学子已上了高中，第二批已上了初中，第三批，正在读《大学》、《中庸》。我不敢说他们以后一定会如何如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至少不害怕文言文了，和同龄人比已经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毕竟接受过一段读懂文言文的训练，知道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可惜的是，后续教育跟不上，“应试教育”对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时间久了，他们记住的那一点点东西，很可能被挤掉的。尽管如此，我相信人文文化的种子已播撒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那些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榆林市苏州中学赵燕燕老师带的班、佳县屈家庄小学、木头峪小学、榆林世纪广场晨读，所用的教材也都是《四书》。我希望他们在诵读的过程中，有所感悟，从而打下读《五经》的基础。《五经》读熟了就基本上建立起了主体文化的根系。主体文化根系建立起来才有可能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化。“学贯中西”的前提是先建立起自己的文化根系，连自己的文化根系都没有建立起来，要想结出别人家的果是不可能的。

北京一耽学堂总干事逢飞，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他放弃了去德国留学的机会，从 2000 年起，一心扑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事业上，带领北京和全国各地有志于弘扬民族文化的高校学生，扎根厚土，担当义道，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做出了非常显著的成绩。肖先华也是一个年轻人，他每年抽一段时间徒步黄河，走了整整十年，他走到哪里，就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播种在哪里，同时，把那里的文化遗产加以挖掘，他的“寻根之旅”在全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香港冯燊均先生已年近八旬，曾在大陆捐资修了不少学校和医院，他觉得还不够，于 2008 年又成立了“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弘扬文化，道济天下。基金会在全国各地已设了好多教学点，在传承着仁、义、礼、智、忠、信、孝、廉、和、毅十大义理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如逢飞、肖先华、冯燊均这样的人还很多很多。这一切都说明，弘扬民族文化已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扎根厚土重塑中华美德已成了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根一定会重新扎在厚土上。我们也一定能重新找回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华美德一定会重光于世。

《玩味论语》（节选）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仅仅二十五个字就说明了一个千古不易的治国大道。政、刑、德、礼是其中四个关键字，前两个字构成今人一再推崇的法制社会，后两个字构成了古人反复倡导的德治社会。其实二者，自古及今，始终存在于一体之中，少了哪个都不行。只是千万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舍本求末。德者本也，法者末也，舍本求末，无异于斧根灌叶。

道者，引导也。政者，正也，以制度示民，使其为善，以禁令戒民，使其不为恶。但，社会上总会有一些不遵守制度、禁令的人，这就不得不制定出一些严厉的刑法，使其不得不为善去恶，以济制度、禁令之不及。这样做，只能使民免罪而已，并不能去掉他犯罪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依然是一个无耻之辈。无耻是一切犯罪的源泉，大凡一个无耻的人，他不是不想为恶，而是不敢为恶，一旦有了机会，一旦有了可乘之机，他就会为恶，更有甚者，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行险侥幸之徒，常常会做出一些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事情。因此，政刑只能加强，不可削弱。但是，政刑再严，总不能使人有耻。有资料表明，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真正犯罪的往往是那些知法、执法而无耻之辈。近些年来，许多高官纷纷落马，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些法院的院长也被送上了审判庭。那些高官不懂法吗？那些法院院长不知法吗？他们太懂法了，可他们为什么要犯罪呢？因为他们无耻。

在法院的判决书里，常常会出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话，其实，在一个无耻之徒充斥的国度里，尽管法令会一天比一天多，法网会一天比一天密，可犯罪的人反而会越来越多，而落入法网的人往往万不及一。因为有些执法的人也无耻，以无耻，治无耻，怎么可以奏效呢？有一天，我在某县街上散步，听到居民在议论：比张之善、刘青山，现在的贪官，随便拉出去枪毙几个，也不会有屈死鬼。这些话虽有些太夸张，但至少可以说明，法网并不是“疏而不漏”。这种社会现象正印证了老子的一句名言：“法物兹彰，而盗贼多有。”

历史早就得出了结论，单凭法治，是很难治理好一个国家的。在法治的同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才能奏效。“道之以政”的道是引导的意思，可是“道之以德”的道，就不是引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那些做头头脑脑的人，躬先倡率，正人先正己，以己之正道，方能正人之不正。这就要求各级领导首先自己有德。自己有德，才能为政以德，才能以德化民。礼者，理也，人若真正明理，不但会耻于不善，而且会格以至于善。一个无耻之徒，千方百计寻找制度、禁令、刑法的空子，只要能钻就钻；而一个有耻的人则常常会反省自己，就像曾子那样“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即使独处，也会慎独，也会格去心灵里的纤细微尘。这就是“无耻”和“有耻”的根本区别。

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了单纯法治的轨道，治国就非常的累人，今天这里出了问题，赶紧制定出个法来，明天那里有了漏洞，赶紧又制出一个法来。可是，人要无耻了，要钻制度、禁令、刑法的空子，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啊！正如俗语所说：“十个指头，哪能按得住浑身是孔的筛子呢？”但是，那孔、那漏，非堵塞不可，于是执法队伍就会越来越庞大。然而执法队伍庞大了就能把国家治好吗？非也，因为执法队伍也不会是清一色的有耻之人，常常会混进一些无耻之辈，如果是那样，麻烦就大了，古今中外，警匪勾结是常有的事。警匪勾结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法对法，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大，对国家的危害更大，解决那样的问题，国家往往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不仅如此，还会使好端端一个政府形象变得不成样子，从而失信于民。

因此，单纯以法治国的国家，必然会回到以德治、法治并重的路子上来。

国家领导人早就提出“以德治国”，后来又提出“八荣八耻”，把以德治国具体化。“八荣八耻”，抓住了治国的核心，那就是要使中国人，人人都能成为“有耻且格”的公民。

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心灵工程。这个工程大而无形，视之不见，听而不闻，但上至国家领导，小及黎庶小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无所不包，无所不括。对于胡主席提出的荣耻观，应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理解，不仅仅是那八个方面，比如：为人父应以慈为荣，不慈为耻；为人子应以孝为荣，不孝为耻；与朋友交应以信为荣，不信为耻；作诗，应以思无邪为荣，思有邪为耻；作文应以，以文载道为荣，以，以文不载道为耻；老师应以能传道、授业、解惑为荣，不能为耻；学生应以尊师重道为荣，反之则为耻等等。

面对如此宏大的心灵工程，必须做。从何做起？从“八荣八耻”做起，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起，从儿童教育做起。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只要我们去，认真地去做，“有耻且格”的境界，中国人是可以达到的。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对于这则《论语》，多数解释为“做儿女的只担心父母会有疾病。”做儿女的做到这一点就孝了吗？不！只要考察现实生活，只要用常理想一想，就会得出结论，这样的解释是错误的。

古人以孝为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人、及于物，就像孔子在《礼运篇》中说的那样：“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立于爱，爱莫大于爱亲，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兄

弟都不爱，而爱别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古人把孝悌看作做人的根本。因此就有许多人到孔子那里问孝。孟懿子是孟武伯的父亲，父子俩都到孔子那里问孝，可想而知，孝在孔子那个时代，还是被人们十分重视的问题。然而同是问孝，孔子却根据不同的对象作了不同的回答：孟懿子问孝，孔子只回答了“无违”两个字，子游问孝，孔子主要讲了一个敬字，“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色难”。而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父母唯其疾之忧”。

孔子为什么会对孟武伯作这样的答复呢？据古籍记载，孟懿子是鲁国大夫仲孙氏，鲁国三氏，季孙、仲孙、孟孙，都是桓公的后代，属于世家。所谓世家，就是世代做官。鲁国三氏势力很大，常常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往往做出一些僭越之事。因此，孟懿子问孝不问忠，孔子心里明白，只能和他以礼论孝，这也是孔子的高明之处，他能理解了更好，理解不了也作罢。而孟武伯问孝，孔子就回答的很具体。孟武伯年轻气盛，出身世家，有权有势，有钱，什么事情办不到？父母的吃穿不仅不会有问题，而且有许多下人侍候着，孟武伯也不可能对父母有不好的脸子看。那么孟武伯怎么做才是孝呢？以我之见，孟武伯就像现在有钱有势家的孩子一样，经常给家里闯祸，父母的心时时刻刻被他不检点的行为熬煎得睡不着觉。即使这样，孔子也没有直接指出他的毛病令他难堪，回答的非常巧妙，“父母唯其疾之忧”，这里这个“其”字，指的就是儿女。一个孩子，为人处事如果能做到事事、处处让父母放心，那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如果能做到不熬煎父母的心，就意味着，他为人处事能掌握了分寸。唯一掌握不了的就是疾病。父母只担心他会有什么疾病。除过疾病，什么都能放得下心。那样的儿女才能称得上孝。

现在的父母好可怜啊！有的儿女们像豆芽菜，豆腐丝，经不起一点点生活的磨炼；有的儿女如狼似虎，经常闯祸，父母跟着给他擦屁股。不是“父母唯其疾之忧”，而是“父母唯其祸之忧”，无穷无尽的忧虑，熬煎着天下父母的心。做父母好难啊！父母还能负担的年龄，为子女们像牛马一样操劳着，可当他们成了子女的负担的时候，就赶紧得死，不然，就有好脸色看了。现在要看到一个孝子太难了，把父母能像犬马一样养着就很不错了，“色难”算得了什么？更有甚者，把风烛残年的老人赶出家门，死于沟壑者也是有的。

孝是仁之根本，也是人之根本。这个根本不能丢啊！丢不得啊！如果丢了，人岂不是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了吗？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鲁定公初年，由于季氏擅权，阳货作乱，孔子就在家呆着，有人就想，新君初立，正

是孔子这样有德行的人大展宏图的时候，可为什么不出去做官呢？“或谓”就是有一个不知姓名者，就问他“子奚不为政？”子，指的是孔子，奚是为何的意思。孔子说：“尚书里不是讲孝吗？‘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惟孝友于兄弟”语出《周书》君陈篇，君陈是个有美好品德的人，既能孝顺父母，又能友恭兄弟，把家政处理得非常好。周公死后，周成王便命令君陈去治理周公治理的那个地方。周成王为什么能选上君陈呢？就因为他家政搞的好，大凡家政搞的好的人，治国也不会有什么問題。

在孔子看来，家政也是政，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国，家和国是不能分的，国是由一个家一个家组织的，如果把一个一个家治理好了，国也岂不治理好了吗？“奚其为为政”，何必一定要出去做官才叫为政呢？

治国难，治家也不易，如能像君陈那样，以孝友之心处理好家庭内外、左右、上下、长幼之间的关系，使一家人，老有所安，少有所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时候是大家族，几世同堂，能齐其家者，就是十分了不起的人物。现代家庭，小家庭，三口之家，也难治理好，如能治理好，也应予以赞扬。大凡能把家政处理好的人，处理国政也不成问题。因为国政，家政，其道一也。最根本的一条，治家者，自己要正。要让别人按规矩来，自己得成为规矩，方能以己之正，正他之不正。自己不正，肯定正不了家，那样的人，即使给他一个官做，亦非政矣。

看这则《论语》其重点不在去弄明白孔子不仕的缘故，而在弄清家政也是政。政家，政国，以孝为本，友从孝上来，施于有政，政又从孝友上来，推而广之，国政的根本还是孝友。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忠臣出孝子。其道理也在这里。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輶，小车无軹，其何以行之哉？”

輶和軹是车与牛马相接处。车与牛马若没有輶和軹相接，车就行不动了。孔子拿輶和軹比作人的信。信是人与人、家与家、集团与集团、国与国相接的犹如輶和軹一样重要的那个东西。“轻诺必寡信”，人如果纯粹没有信，言不由衷，行不践言，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再能的人也无法在社会上行动。

信是做人之本，不管其职位高低，有钱还是无钱，只要他不讲信，他就是一个人格很卑下的人，还只是一个物种意义上的人。那样的人，虽然人模人样，可知道他的人，往往不把他当人。

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谁如果不要信，无异是把财富往门外推。没有信的人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因为他在别人的眼里始终还没有成为一个人，不仅在社会上立不起来，就是在亲戚近邻之间，在自己家里，甚至夫妻之间也立不起来。那种人多么的可怜！信，对于一个

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当下不少人热衷于说性。信和性音同字异，以愚之见还是先把信教育开展起来为宜。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应把信教育当成一个根本的教育来抓。信是一种心性的修养，这种心性的养成必须下大功夫教，下大功夫学才能奏效。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诚信的社会里，即使是黑社会的老大，也希望他的部下诚信。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到处都会是陷阱，你给别人设陷阱的当儿，别人也正在为你设下了陷阱，防不胜防。谁能想到，猪肉里会注水；谁能想到，有颜色的鸡蛋里有毒；谁又能想到，婴儿奶粉里做假，谁又能想到，有人会在婴儿疫苗里做假？假酒、假药、假职称、假文章、假文凭、假公司，什么都有假，一个到处充斥着假的社会，还是人生存的社会吗？

过去，由于无知和偏见，我们曾把“仁、义、礼、智、信”五个法宝当作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丢掉了，现在看来，我们得把那五样东西一个个再捡回来。由信而后智，由智而后礼，由礼而后义，由义而后仁，最后得到道。

其实，信没有像钱那么难得，孔子说，我欲仁，得仁。自然，我欲信，就可以得到信。只要你想得到它，就会“信手拈来”。人人都能由我做起，才能构建一个诚信的社会。诚信的社会才是人生存的社会。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的仪邑。古代把管土地的官叫封，什么地方的土地官就叫什么封。仪邑的土地官就叫仪封。从这则《论语》里看出，仪封人这个人的官位虽然不高，可他却十分关心天下国家大事，尤其对当时离道失德的世道很是忧心。因此，常常爱向一些有道德有学问的贤人请教，探讨拯救时弊的办法。孔子是他平素很仰慕的圣人，当他得知孔子带着他的一帮门徒到了仪邑，高兴得不得了，迫不及待地来到孔子下榻的地方，求见孔子。可是到了门上，却被孔子的门人挡住了，仪封人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在门口踱来踱去，干着急，说：“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斯字，在这里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意思是说，凡到仪邑来的君子，我仪封人没有见不到的，还是请你们通报通报。门人见他是那么的真诚，便报告了孔子，于是，孔子就会见了仪封人。

他们谈了些什么，虽然只字没有透露，可是从仪封人从孔子门里出来，说的那些话里可以看出，孔子的谈话令他十分的振奋，使他豁然开朗。他说：“二三子，何患于丧乎？”意思是说，有什么可忧患的呢？“天下无道也久矣”，世道衰微，人心陷溺好久了，乱极思

治是人心所向的事情，孔子有那么好的学问，那么高的道德修养，“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里所说的天，就是人心。意思是天会使孔子得位设教，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慢慢使世道人心变好。

铎，有金铎，有木铎。金铎振武事，木铎宣文教。金铎木铎都是警众用的器物。仪封人用木铎比喻孔子，预言孔子文化的弘扬就像木铎的声音似的，会振醒天下愚蒙之人。

仪封人在这则《论语》里没有说多少话，可却把一个活生生的关怀世道人心的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跃然纸上。仪封人能以天心识圣人，亦非常之人矣。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古代有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之说，里，居也。可是这里的“里仁”，指的不是身之所居，而是心之所止，志之所止。心志止于何处？止于仁。曾子把仁说的很沉重，可孔子说的很轻松，很美好。“里仁为美”，这个美是美好的人生，美字用的很妙，耐人寻味。“择不处仁，焉得知？”择字用的更神。“里仁”还是“不处仁”，其实只在一念之间的选择耳。择仁而处，就是智，就会有美好的人生；择不处仁，就是愚，就会有糟糕的人生。可是有许多人“择不处仁”，这就酿成了好多的人生悲剧。因此，孔子发出“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的感叹。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择不处仁的人，一定不会是个仁者。约是贫贱，乐这富贵。不仁者，久处约必滥，长处乐必淫。是处约亦悲，处乐亦悲。贫贱了，偷、盗、拐、骗、谄；富贵了，强、霸、嫖、赌、骄。这样的人生还谈得上美好吗？而处仁，就是另一种人生了。就如孔子说的“贫而乐，富而知礼”。处在贫贱的地位，安贫乐道，永远有一个仁者的心怀，独善其身，改变自己贫贱的处境。富贵了，富而不骄，永远有一个仁者的心怀，兼济天下。这种人生是贫贱亦乐，富贵亦乐。真可谓“里仁为美”啊！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唯是独。好和恶都用情，情由心生，理自情来。仁者，心正，至公无私，其好恶皆循民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所好必然当好，所恶必然当恶。好亦为公，恶亦为公，必然会见贤能举，举而能先，见不贤能退，退而能远。不仁者则相反，其心不正，至私无公，其好恶皆徇私情，民之所好恶之，民之所恶好之，所好必然不当好，所恶必然不当恶，好亦为私，恶亦为私，必然会见贤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贤不能退，退而不能远。

仁是人的性，凡仁者都是恢复了人性的人，而不仁者尚未恢复人性。因此，惟有恢复了人性的人能好人，能恶人。这两个能字，须细细玩味。不管什么时代，仁者是国家之宝，

人民之宝，天地之宝，愿天下人都能做个仁者。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苟是诚意，诚心诚意要做一个仁者的人，一定不会为恶。这节《论语》重在一个志字上，更要着力苟字。诚心诚意志仁，心无恶意，身无恶行。“人心惟危，道心维微。”人心不志于仁，便纷乱，纷乱之心，岂有不为恶之理？志仁之心，就是道心。道心原自义理，心纯于理，心从于理，岂有为恶之心？无为恶之心，定然“无恶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此章开示人，为了得到仁，应有什么样的取舍功夫。孔子说，富贵，人都想得到，贫贱，人都厌弃。然而不以正当之道得来的富贵不要，不以正当之道脱离贫贱不干。因为那样做会损仁，会害仁。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仁，不是富贵。为了得到富贵损仁，为了脱离贫贱害仁，就是舍本求末，到头来必是得不偿失。贪官转眼落马，强霸银铛入狱，此等事是常有的事。退一步说，即使能逃脱了法网，可逃不脱天网。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曾子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仁者虽然侥幸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可是，在人们心目中，他还不是一个入了“人格”的人。时间久了，必然受到“报应”。这里所说的“报应”，不是神灵的报应，而是因果律的作用。

一个人要是没有了仁，就没有了根本。没有根本的人，还能成了什么样的名呢？因此，要活一个真正的人，不敢有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到了最紧迫的关头如此，到了颠沛流离的状况也如此。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仁，人所当好，不仁，人所当恶。可我未见好仁的人，亦未见恶不仁的人。我所说的好仁的人是真的知道仁确实可好，好到天下再没有什么可以夺其所好。我所说的恶不仁的人，是真的知道不仁确实可恶，可恶到视、听、言、行不能有一丝一毫不仁的事加在自己的身上。好仁和恶不仁，是成德的事，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或许有能一日奋然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好仁、恶不仁的事上。我没有见过力不足的人。因为好仁，恶不仁靠的是心力，心力所至便可以做到。仁，虽然难能，可真想得到它也很容易。因此，只有不用力的人，没人力不足的人。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义矣。”

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圣贤也会有过。颜子是大贤人，颜子不二过，说明颜子也有过，只是不二过；孔是大圣人，孔子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直到七十岁，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而曾子则临死的时候，连手和脚都不会动的时候，说，我已成了这个样子了，大概不会有什么过错了，小子们，你们可要小心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人的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绝对不可认为有过的人就不是个仁者，不仁者可恶，可对有过者不能厌弃。因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这里的党，不是政党的党，古时的党指的是邻里、亲戚、朋友、同事。邻里、亲戚、朋友、同事，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处理这些关系中，厚薄不当，爱恶稍差，或过分了，或不及了，就会发生过。过是属无心的失误，不是有心的算计。有心的算计，已不属过的范围了。有人闻过则喜，知过必改，对自己的过，悔恨不已，痛心疾首。而有的人则闻过饰非，饰非已不是过了，成了过上加错。“观过知仁”，观字须细玩，首先观过的大小，进而观过的原由，这就进到了细微的心理分析，再而观对过的态度。这样观下来，仁，还是不仁，岂不一目了然吗？其实，知仁的同时，也就知了不仁。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才是真正的知仁义矣。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在前面讲了许多关于仁的道理。追根问底，仁只是道的用，道才是仁的体，仁的根。因此，孔子激励人一定要闻道。朝，是早上；夕，是晚上；闻，是心里贯通的意思；可，是没有悔恨的意思。道，对于中国人来说，一说到道，人们就会有玄之又玄，深不可识的感觉。其实，道，就是事物当然之理。当然之理，看似平常，但，人糊涂就糊涂在不明白当然，《道德经》里不是说“道法自然”吗？自然就是当然，明白了当然也就明白了道，就贯通了道，这才叫做闻道。闻道，绝不是说，你听一下就会明白，而是日用之间的格致功夫，就平日那些平平淡淡的事里，日积月累地练，方能在某一日豁然开悟，明白了“当然”。“夕死可矣”，是说，人一旦明白了“当然”，就没有白活，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死字须活看，不是说一定要死。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士字，由上面一个十，下面一个短横组成，据古籍记载，远古时代，十个人丁中选出一个来为大家做事，称之为士。曾子所说的士，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们既不经别人选，也不需要上面任命，就担当起了一个重任。这种担当，是他自个找的，而且“当仁不让”，明明知道不可为，还要为之。就如孔老夫子，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道德衰败，世风日下，许多人认为不可挽救了，就避了世。不是隐入深山，就是隐入闹市，任世风衰落下去，

可孔老夫子却四处奔走的挽救。他的行为常常不被人理解，讽刺的有，打击的也有，说他是“丧家之犬”也罢，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罢，他全不管，只是尽心竭力地去做。在曾子看来，孔老夫子就是一个“以仁为己任”的人。曾子和他的老师一样，也是那样的人。

他一开口就说：“士不可以不弘毅”，曾子当时是对谁说的这些话，无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有感而发的，而且对听他话的那个人，有一种深深的责备。“不可以不”，四个字斩钉截铁，细细玩味玩味，不难感觉出曾子当时的心情。“不可以不弘毅”，就是一定要弘毅，绝对要弘毅。弘是宽广，指的是心量；毅是坚韧，指的是心力。一个心量狭小、心力不够的人怎么可能完成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事呢？何谓任重？“以仁为己任”。何谓道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仁是一个全德的概念，居仁、义、礼、智、信五德之首，兼容四德，统领万善，其重无比，天下莫能胜者，而自己却想把它挑起来。“不亦重乎？”挑起这个担子要走多远？天下莫能知者，而自己却有着一一种期望，这种期望一直伴随到他死，“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仁道重大，非弘毅之人不足以担当。弘，不以一善自足；毅，以半途而废为耻。曾子不愧为孔子弟子，能说出如此震撼人的心灵的话来，一定有他至深的感悟。

对于士字的解释，多数解释为读书人。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弘毅，不是读书人的专利，仁，更不是只有读书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仁者爱人”，爱父母，爱众生，爱物，爱国，爱天下，谁都可以做，只要有一个宽广的心量，有一种坚毅的心力，死守善道，谁都有可以做到。

也说《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

《神木》2001年第3期发表了陈冲先生《〈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的文章，读过之后有些想法，可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虽然这几年在给孩子们教《论语》的过程中，读了不少有关《论语》的书，但学养功夫不深，惟恐说错了什么，以致上获罪于圣哲，下贻误于

后学，就把一些想法压在心里，谁知这东西是压不住的，不如一吐为快写出来，倘有不妥之处，还请陈冲先生批评。

《论语》到底是本什么书，自古及今尚未有一个准确的定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牛粪者，见牛粪，驴屎者，见驴屎，如此而已。因此，说《论语》到底是什么，往往到底还不是什么。

说《论语》必然要提到孔老夫子。孔老夫子并不期望人人都说他好。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我们姑且不论，孔老夫子是“善者好之”者，还是“其不善者恶之”者。但对孔子这个人，一些人好之，一些人恶之，已成不争的历史事实。好之者，说《论语》，道孔子，说了道了两千多年，恶之者，打孔子，砸孔家店，也打砸了两千多年。说《论语》道孔子者，为孔子说了那么多好话，没有给孔子添上一丝一毫的光彩；打孔子，砸孔家店者，说了孔子那么多的坏话，也未损孔子一丝一毫的光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是败絮裹十层绸缎依然是败絮，是真金压千年尘垢依然是真金。

打孔子，砸孔家店者，往往打砸的不单单是孔子，连孔子的“好之者”一齐打，一齐砸。秦代，“焚书坑儒”就是一例。其实，说《论语》，道孔子者，所说、所道都是自己的心得而已，所谓心得，乃一己之得，一时之见。一己之得，一时之见，自然不可能全面，比如易中天说《论语》的精神就是“让世界充满爱”，比如说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渴望的那种快乐生活”，比如说，陈冲说《论语》是一本讲如何“治天下”的书等等。能说他们错了吗？不能，因为在《论语》里确实可以找到他们所说的根据。能说他们全对了吗？不能，他们所说，只能算作冰山之一角。各人的视角不同，心得各异，是很自然的事情。千人千双眼，万人万条心，其看点不同，其心得怎可能一致呢？即使就是同一个人，看《论语》，看一遍有一遍的感悟。年轻时看，也许看见的是一条小河，老了的时候，也许看见的是大海。因此，用自己的心得轻易去否定别人的心得，显然，是不明智的，至少是没有慎思过的。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是颜渊对孔子的评价。

“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是子贡对毁孔子人的批评。

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崇信西藏密教，到忽必烈死后，由铁木真“元成宗”继位，就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诏告天下：“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

以上种种就是孔子好之者心目中的孔子。然而孔子在其恶之者心目中，却是古今中外最坏最坏的人，说他是“民族的罪人”，说他“倒栽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树”，说他“折断了中国人的脊梁”等等。相比之下，陈先生对孔子还算比较客气一点的，说“孔子在他自己家乡讲学的时候（《论语》就是这类讲学的结果），本来有不少人听，不料忽然出了个叫少正卯的，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也开课讲学，孔子的听众中忽啦啦便有一批人跑去听少正卯的课，不听他的课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直到后来当了官有了权，上任后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少正卯杀了”为什么不听孔子的课了呢？“皆因为少正卯的课比较讲道理，而孔丘的课往往只讲道不讲理，即只讲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不讲或很少讲为什么应该，为什么不应该，所以我说他只是个言论家，连理论家都不够。”因此“孔丘死的时候，葬于泗水之上，‘墓而不坟’，连个坟头都没有起”。以上说词，仿佛如陈先生亲历一般。在恶孔子者的眼里，孔子是顶级坏人，少正卯自然是顶级的好人了，岂只比孔子讲的好，有人甚至把少正卯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何许人？第一个轴心时代，也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在世界的东方，世界的西方，几乎是同时出生在这个地球的四五个顶尖级人物中的一个。就这么一个可以影响世界文化的中国的苏格拉底——少正卯就被孔子杀掉了，孔子岂不成了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了吗？

可惜的是少正卯这么一个人物是否真有其人，早就成了历史上的一大疑案，自从钱穆先生以大量的历史史实，做出了无可辩驳的史学界公认的结论：少正卯这个人物根本不存在之后，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孔子恶之者”站出来，说一个不字。如此说来，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也就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了。陈先生说少正卯讲的如何如何好，如何如何有理，也只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了。而且谁都从未听说过孔子生前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中哪个人因为孔子“只讲道，不讲理”而跑到别处听课的事。倒是孔子周游列国，他的许多弟子还跟着去，不仅如此，到孔子死后，门徒还为他守丧三年，这倒是事实。《孟子》中有这么一段话：“昔者孔子殁，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不仅孔子的门徒如此追慕他们的老师，有许多鲁人也追慕他们时代的圣人，纷纷在他的墓地居住下来，陪伴着孔子“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而且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家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

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由此可见事实上并不是陈先生说的“经过 300 多年时间的检验，孔丘的价值终于被汉武帝发现，也就是说孔子被人尊敬并不是自汉武帝才开始的。

平心而论，孔子“吾少也贱”的一个人，十五岁志于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活到如此辉煌的程度，恐怕是古今中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还不值得我们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学习和尊敬吗？可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偏偏时常遭到人们的攻击，而且攻击者偏偏又都是一些中国人。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中国现象，正印了孔子“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的话，只不过变成了“国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罢了。孔子除杀少正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以外，另一条严重罪状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陈先生说：“什么是孔丘心目中做良民的纲？那就是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个叠起来的字，原本是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当时齐景公，“失其君道，威福下移。失其父道，嫡庶内乱”，不知如何是好，这才请教于孔子。孔子说此话，是对治齐景公所犯错误而说的，有循名责实之意，所责侧重在君父这一边。齐景公心知肚明，可齐景公却用“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么一句话搪塞过去，不知悔改，导致“陈氏弑君篡国之患”。稍稍了解一下历史，了解一下孔子当时说此话的语境，就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但“孔子恶之者”，从古至今，把这一条当作孔子的主要罪状批。孔子岂不冤哉！至于后来的“三纲”似乎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孔子的创造。管仲没有跟着他的主子公子纠去死，还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有人批评管仲不忠，孔子不仅没有批评管仲，还表扬了管仲。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首先要求的还是君，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至于那些不仁的昏君，“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的暴君，孔子及其儒者从未说过他们的好话。

总而言之，《论语》并不是如陈先生所说是一本专讲“治天下”的书，也不是一本“专劝皇帝当明君，教育百姓做良民”的书，有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教人如何做一个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孔子对所有人的要求，因此，有人称孔子的学问是人性学。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儒字从人，人字旁一个需要的需字，会其意，儒者，就是人需要的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才是《论语》的核心思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才是孔子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

陈先生说“要德先生，要赛先生”，这没错，但“打倒孔家店”则没有这个必要。民主、自由、科学，也还是要人去做的，倘若，人不知道如何做人了，到处是野蛮，到处是欺骗，到处是腐败。就像老百姓说的“鞋没有鞋样子，袜没有袜样子，人没有人样子”，“德先生”、“赛先生”又奈何得了什么呢？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为乎内，男正为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正而天下定矣。难道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才是今天的人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吗？

《论语》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说《论语》是一部高深永恒、包罗万象的书，就像颜回说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如果能说“到底”，也就称不上高深了，最高深的也是最平实的，最平实的才是最高深的！

（《榆林日报》·文化陕北 2009 年 4 月 13 日）

鲁迅与国学大师

打开国学网站，看见在国学大师栏目里，排列着几十位国学大师的名字。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便觉着有点滑稽，不仅是对鲁迅先生的不恭，甚至有点讽刺的味儿。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把一个“不相干”的帽子，戴在一个“不相干”人的头上，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鲁迅先生

不配有国学大师的称号。纵观近代、现代文学史、哲学史，如鲁迅先生那样精深国学的人，真可谓“多乎哉，不多也”。从鲁迅著作的瀚海里，不难看出，鲁迅先生不仅熟读了《四书五经》，而且熟读了道家，佛家经典。二十四史，诸子百家，野史外传、家训族谱，笔记短简，三教九流，凡能找到的古书，恨不能全装入他的脑子里，因此，他能纵横驾驱，挥洒自如，隽思妙旨，叠出不穷。真是，落笔涛飞雪溅，用典穿珠连玉。读鲁迅的作品如登泰岱，愈转愈高，如游武夷愈入愈深。尤其杂文，微辞冷讽，语语刺心，伐毛洗髓，字字见血。中国近代、现代作家多如牛毛，哪一位可以超越鲁迅？没有。鲁迅是一株在国学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尽管鲁迅先生自己说“不相干”，但，没有国学就没有鲁迅，这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为止，这棵大树，依然根深叶茂、苍劲挺拔，没有人可以企及。正如《鲁迅全集》序言里写的那样“如今回首鲁迅作《热风》的年月，已经过去七十年矣，而且中国也从旧社会变成了新社会，然而，鲁迅杂文还在千百读者的心中，使他们感到‘深刻’，较之近代、当代任何作家的文字都来得‘深刻’，这可以让人深思，这是我辈的幸事呢？还是不幸呢？”

以我之见，首先应该肯定，中国出了个鲁迅，是我辈的幸事。如果没有鲁迅，当时的中国人，除了古书，就没有书可读。毛泽东早就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的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文化精品，令我们现在读起来，都感到深刻、过瘾。这能说，不是我辈的幸事吗？然而，鲁迅之后，那么多的作家，没有一个比鲁迅来的“深刻”。这又是我辈之不幸。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那就是近代、现代那么多的作家，谁都比不上鲁迅先生读孔孟的书“读得最早、最熟”。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的地位》中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然而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处在鲁迅的时代也许只能有一种选择。正如鲁迅先生在他的《忽然想到》里说的那样：“我们目下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进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坟五典，宋百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处在鲁迅的时代，中国的读书人，大概只知道读中国的古书，就像生活在一个封闭十分

严密的房子里，令人郁闷得透不过气来。鲁迅这个先知先觉，不得不大声呐喊：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话语，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若要说明鸦片的弊害，大概吸过鸦片者最深知，最为痛切的一般”。

“中国书虽然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颓唐厌世的，但都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先生这些话，在当时是没有错的，那些读孔孟书最早、最熟的中国读书人，确实应该清醒清醒，读点外国书，吸收一点外部世界的先进东西，以强国强民。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良苦用心。但是，令鲁迅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名教，被深深印在中国人的心里，以致影响到了中国的启蒙教育。

《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等这些蒙学教材被废止之后，新的更好的蒙学又没有人弄出来。鲁迅先生虽然在百忙之中亲自翻译了许多外国的进步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小彼得》、《表》、《小约翰》、《爱罗先珂童话》等等。但，终不能成为儿童的启蒙教材。于是，一些缺乏“营养”的启蒙教材，应运而生。

谁都知道，儿时是人生中记忆力最好的年龄段，本应记住那些最经典、最有“营养”、可供一个人一生去消化吸收的东西。可是近代，尤其是当代人，一代一代都是在文化饥饿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鲁迅先生也说过“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始不盛者终必衰”，我辈能和鲁迅比吗？鲁迅读孔孟的书“读得最早、最熟，我辈读过些什么？历史注定了我辈为文化侏儒的命运，这是时代要我辈付出的代价。

现在，国学又香了起来，孔府、孔庙、孔陵也都热闹起来了，孔子学院也在世界各地一座一座修建起来，中国似乎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据说，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已走进了许多美国人，英国人的家庭。有人说，东西方长久以来的较量，其实质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只不过是以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科技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将是两种文化的直接较量，较量的结果也逃不脱优胜劣败的法则。

东方文化重道贵德，要人从小建本立节，讲的是仁、义、礼、智、信，追求的是至诚，追求的是中和。西方文化则贱德贵货尚斗。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竞争场上无父子。为了我

的生存，不管别人的死活。两种文化孰优孰劣，只有历史去证明，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看清的，那就是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起来的，竞争到一定程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人类不得回过头，到孔老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鲁迅批孔反儒的历史问题呢？从哲学的观点看，事情原本就很难分出个好坏来。彼一时，此一时，在彼是好事，在此，往往表现出坏的结果来，这是常有的事，因此，也不必去翻历史的老账，硬要争个彼长此短。一个人，只要对人民，对国家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就够了。鲁迅先生当时，救国救民的心是何等的热忱，何等的急切。还有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顶天立地的气概，以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永远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但是，国学大师的桂冠，就不一定硬戴在鲁迅先生的头上。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做他的“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好了。因为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孔孟的书和他是“不相干”的。自然，国学大师的桂冠也应该和鲁迅先生没有什么“相干”。

文言与白话

白话文与文言文是个老话题，当时争论的双方各执一端，都有其毋庸置疑的道理。但最后白话文占了上风，文言文被打入了“冷宫”。谁知百年之后，有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那就是大多数中国人读不懂文言文了。上完小学读不懂，上完中学读不懂，

甚至上完大学有的还读不懂；基层干部读不懂，中小学教师读不懂，甚至有的作家、艺术家也读不懂。

当时提倡白话文的人都是能读懂文言文的人。也许是因为他们看到当时的中国人大都是文盲，着了急，于是下决心推广白话文，用以扫除中国的文盲。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百年之后，文盲少了，可“文言文盲”却充塞了这个世界。这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中国的史就在文言文里，中国人读不懂文言文，就意味着忘掉历史，忘掉历史必然会引发文化危机，而文化危机往往要比经济的、政治的危机还要难以扭转。

读不懂文言文不是因为文言文难，也不是因为今天的人笨，而是因为没有从小给孩子们教，如果早一点教，人人都可以读懂。黄河边上出生的孩子，之所以那么小就敢在大浪里耍水，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在水里泡着。胡适之所以四岁就能读他父亲写的古体诗，九岁就熟读了《四书五经》，十一岁就能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不到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国文化的大家，就是因为有人从小就给他教。

文言文是一座极其富丽的文化宝山，那座宝山是人类几千年智慧的结晶，而经书又是结晶之中的结晶，是“文章之骨髓者也”。要想启开人的智慧之门，就得让孩子从小去爬那座山，不从小爬起，要达到文化的顶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要爬上文化的顶峰，读经又是最佳捷径。“书读不到精髓处，翰染难达性灵中”。我这样说，并没有丝毫贬低白话文的意思，“五四”兴起的白话文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当时的中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进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那样做，别无选择。事实上白话文运动有其不可磨灭的伟大历史贡献，那就是使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中国最大范围的普及了初级文化。不仅如此，而且使中国懂得了科学、民主和自由。

然而白话文和文言文相比，后者毕竟是更为高级的书面语言。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劳动创造了语言，先有了口头语，然后有了白话文，然后才有了文言文。所谓白话文，就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的一种书面语言。而这种书面语言，我们的老先人原本就会，而且就是那么做的。再早的古人我们没有赶上，清朝过来的人我们是赶上了的，他们的日常用语都是方言土语，老百姓是那样，读书人也是那样。书信往来，立个字据什么的，大都也是白话，我收藏有道光年间的文约，和今天人写的没有多大差别。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创造一种文言文呢？这是我这篇文章里要重点说明的问题。文言文的创造，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酝酿期才创造出来的。据有关研究表明世界各个种族几乎都创造了自

己的口头语，自己的白话文，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白话文一直在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使后人读不懂前人的文字了，这就给文化的积累、传承和交流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于是各个种族的智者无不想创造出一种不管经历多久都可以使后人能读得懂的书面语言。但事实证明，许多民族都未突破这一关，唯有中国创造的古文有了重大突破。这种古文不受语言变化的影响，以不变应万变，成为千古流传的书面语言。这个创造太伟大了，它使中国文化有了博大精深的积累，有了薪火世代相传的文脉。假如中国人也没有创造出古文，中国文化也必然如印度的梵文，欧洲的拉丁文，古希腊文那样早已不被世人所识了。

古文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保存了下来，而且把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也保存下来，这不仅是中国人的幸运，也是世界人民的幸运。

在科技的发明创造上，古人绝对比不上今人，可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上，今人很难超越古人。古文的创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文化工程！把古文创造出来，又要推广到那么多民族，做到“书同文”，又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可我们的祖先，为了博大精深，为了永久性的传承，硬是把那么一个庞大的文化工程完成了。这不得不令后人叹服，他们为了我们后代，想的是多么深远啊！

然而，他们之后的人又是多么的短见！就以近百年来的白话文说，鲁迅时代，鲁迅的白话文堪称最好的白话文了，可时至今日喜欢鲁迅白话文的人已越来越少，为什么？不是鲁迅的作品变了，而是语言变了。今天人的语言和鲁迅时代的语言起了很大的变化。今天尚且如此，再过五百年，再过上千年，又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至于赵树理的山西方言小说《小二黑结婚》，贾平凹的关中方言小说《秦腔》，就更没有永久传承和广泛传承的可能了。其原因，也是语言的变化。

历史又一次证明，白话文只能红极一时，不能成为永久。白话文里，不能说没有好东西，原本是应该永久传下去的，但由于语言的变化慢慢会使他们失色。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和古代文化巨人一样有各领风骚的风光，可由于语言的变化，会使他们的东西，不被永久性的文化长河所接纳，这就是这个时代文化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只重视古文，不利于文化的普及，只重视白话文，不利于永久性的传承，这就是历史老人作出的结论。白话如皓月，文言似骄阳，日月同交辉，今古共奎光。这就是今后我们对白话与文言的正确态度。用科学发展观回顾历史，开创未来。历史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未来让我们看得明明白白。

现在该怎么办？首先应使中国人读懂文言文，小学生就应该让他们接受读懂文言文的训练。读懂文言文并不是一件难事，古人十七八岁就能中状元，今天的人比古人更聪明。中国人一旦读懂了文言文，就意味着他拿到了打开文化宝库的钥匙，他就会学着写文言文。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人完全可以和几千年的文脉相连在一起。《光明日报》上选登的《百城赋》就是最好的证明。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既是一个各种文明冲突的时代，又是各种文明交融的时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个价值是世界所有人可以接受的。因此，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将会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文化的输出不会使我们少了什么，反而会使我们更多。正如《老子》所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我亲爱的同胞，赶快让你的孩子去读文言文，那是一方经过数千年沉积的文化沃土，那是一股万世不竭的源头活水。吸足了“营养”和水份的幼苗定会长成合抱之木，即就是作一篇白话作文也会是更高层次的白话文，有着甚深文化底蕴的白话文。

也说国学热

前些年有人就说，“国学热”，担心再热下去不得了了。果真热了吗？非也。“冬至一阳生”倒是真的，离热还差好些个节令哩，大可不必惊慌。“讲史热”，“公祭热”，“汉服热”只是商业的炒作，一些人的作秀。那种“热”和“国学热”是两条道上的车，背道而驰，不能同日而语。

国学——儒释道三教共炉，融为一体的东方文化圣火，在中国大地上燃烧了数千年，其温暖不仅遍布中国，也遍布东亚、南亚，影响着整个世界。近百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人不得不采用“以其人之道，还致其人之身”之术面对西方列强，这才使自己炉膛里的火势渐渐弱了下来。到现在，几乎到了快要熄灭的程度。然而道消之极也是道长之初，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时令的运转终于到了东方文化复兴的时节，炉心里又慢慢热了起来，先是一丝青烟，继而有了微微的火苗，真可谓：薪已尽，火犹存。就这么一点点微热，就吓得一些人大喊：“太热了！太热了！”如果不是错觉，倒有点像吴牛喘月了。

1995年，赵朴初、冰心、曹禺、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启功、叶至善九位德高望众的文化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以016号正式提案形式，发出《建立幼儿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呼吁说“我国文化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到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呼吁还说“构成我们民族的这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韧带，如果不及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这是九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发出的最后呼吁，呼吁犹如九天惊雷，震撼着当时还被笼罩在打倒孔家店历史烟尘里面的人们。紧接其后，台湾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在大陆作了一场场“百年震撼”的报告，王教授说“即使我是美国人，我也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我是外星人，我也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太好了。”王教授的这些话，是发自一个对中国文化有至深了解人的肺腑，字字句句如千斤重磅，撞击着迷茫于西方文化而找不出出路的中国人的心。于是，连普通的中国人也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极少数的人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教古文经典。消失了百年之久的古文诵读声，在中国大地上，在不同的角落响了起来。最先

由家庭搞，随后有的人觉得这种教育太好了，就向社会推广，于是办起了私塾、义塾和学堂。有远见的一些校长，一些老师冲破“应试教育”的束缚，将经典大胆引入了课堂。但不久，就在学术界引发了争论：有人说，让孩子们读经是历史的倒退，是复古，“五四”批，文革时又批，看来还得批；有人说，读是可以的，但不是儿时，长大了再读怎么说也不迟；还有人说，读是应该的，可要把精华和糟粕区分开来再读，不然怕孩子们中“毒”，有的则说孔子是历史的罪人，是孔子使中国人愚昧，倒霉，要使中国人不倒霉，不倒大霉，就得把孔子打倒……

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支持者有支持者的说法。而做的人，还在继续做。在此期间，一些商家看准其中的商机，纷纷成立了儿童导读机构，导读是名，赚钱是实，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一套书上几百元。为了销书，他们组成了庞大的促销队伍，到了一地给校长花点小钱，将一班一班小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集中起来，进行“精彩”讲演。出于一时的冲动，许多家庭买了书，但把书买回去之后，又不知如何教，加上报纸上，电视上不时可以听到，看到反对者的声音，再加上“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孩子们哪有时间去读这些书呢？于是刚刚兴起的读经热，很快就冷了下去。后来于丹在《百家讲坛》开始讲“于丹《论语》心得”，使《论语》走进了千万个百姓之家，可是没过多久，于丹就遭到了十分猛烈的攻击，有人说于丹最反动、无耻，学界随之又掀起了一股讨伐孔子的寒流，孔子又一次因为于丹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有人向全国发了通告，说他要审判孔子。一时，近乎人身攻击的谩骂，充斥了一些著名的网站，谩骂者横枪跃马，如入无人之境，他们骂孔子，骂中国文化，骂中国人。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声中，一些家长又迷茫了，读经的孩子自然就越来越少。传播佛家文化有寺院，传播道家文化有宫观，传播儒家文化有文庙有书院。可是寺院、宫观大都还被保存下来了，唯独文庙大都被打了，至于书院早就在中国绝迹了。近些年建立起来的这书院那书院，几乎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院。儒家文化的传习原本是学校的事情，可进入学校暂时还是不大可能。尽管党中央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但要落到实处，形成一种传承的机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

人文文化的传习，比科技文化的传习要难得多。发明电灯也许经过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但电灯一旦发明，人人都可以使用。国学是用心灵体悟的学问。孔子发明了仁，并说“吾欲仁，仁至”，就这么简单，可就是难以做到。颜回是孔子最赏识的学生，尚且只能做到“三月不违仁”，而况于别人呢？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说：“仁者，德之总相也。开而为二，曰仁智、仁义；开而为三，曰智、仁、勇；开而为四，曰仁、义、礼、智；开而为五，则益之以信，开而为六，曰智、仁、圣、义、中、和。如是广说，右名万德，皆统于仁。学者当知，有性德，有修德，性德虽是本具，不固修则不能显，故因修显性，即是笃行为进德之要”。

不修德，性德不显，性德不显，就不能和经典会通，不能会通，就不得其要旨，不得其要旨，就没有文化力，没有文化力，就不能笃行，不能笃行，就不能进德，不能进德，焉能达仁？现在要找如马一溪先生那样有学养功夫的学者已找不到了，谁来传道？谁来授业？谁来解惑？木头峪村是佳县境内一个很著名的文化村，村创始人名叫曹琰，祖居县城察院巷。出外做官铁面无私，人们把他的府衙称为“开封府”。辞官后，便居住在现在的木头峪，一面耕地，一面教学，七年没有进过城，当时的州守亲自拜访，深受感动，为他居住的地方赠匾“小严滩”。赞誉曹琰有严子陵的风范。后理学家张玠也携家到木头峪设帐授徒，从游者甚众，举人柴牛山也在其中。从此之后，木头峪就成了闻名北国的文化村。进士、举人、秀才在木头峪村几乎家家出过。连船工都会做联。据传有一个山西的文人专程到木头峪，想看个究竟。上了渡船，对船工说：“听说你们木头峪人都会作联，今天我出一联，若能对上，河礼（过河费）加倍，若对不上……”船工们齐声接口说：“不拿分文。”船到河心，那文人出了上联：“东渡口，西渡口，东西渡口渡东西。”，有一个船工立即对下联：“春读书，秋读书，春秋读书读春秋。”佩服的那文人五体投地。为什么木头峪人能如此有文化呢？原来家家有藏书，户户是私塾。直至文革破四旧时，从一个一个四合院里用架子车拉出一车一车线装书，堆在戏楼滩，小山似的，一火化为灰烬。2009年冬我带了一些《大学》、《中庸》、《论语》来到木头峪，想把这个村的文化薪火重新点燃，可是，连个能胜任导读的教师都找不到。“文化村”尚且如此，别的村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也别指望天上会一下掉下来许多可以讲国学的教师，会使“国学”一下子热起来。能讲国学的教师太少了，也许大学里有，可大学里的那些老师，不可能到一个小县城里讲，更不可能到农村去讲，因此，在基层还得靠一些半桶子文化人教，尽管没有什么文化底蕴，可有热情也行，但有那种热情的文化人也少得可怜。因此，国学热在近期是热不起来的，要热也许是几代人之后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冬至一阳生”，是千真万确的，既然有了一个阳爻，必然会有二，有三，因此真正的“国学热”会到来的，一定会到来的。

二十一世纪是孔子的世纪

尼采说：“上帝死了，”当代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黎鸣说：“西方的哲学死了”。上帝没有死，在相信上帝存在的人们心目中没有死。西方的哲学家也没有死，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会议上发表共同宣言说：“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孔子那里吸取智慧”。这就是西方哲人向人类发出的警告。

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警告，这是上个世纪末，西方人类中的智者，向人类发出的最严重的警告。那么21世纪人类会遇到什么样的麻烦呢？什么样的麻烦事非得把孔老夫子请出来才能解决呢？

世人都知道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一生：“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对神的态度“敬而远之”，对鬼也不是见牌位就烧香的角色，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子不研究人死了以后怎么样，而注重的是人活着应该怎么样。孔子相信：“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此他一生不遗余力的从事着教育工作。

看来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人类教育出了问题。孔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人类教育出了问题，当然要把孔子请出来，这是必然的选择。民间早就流传着一句俗语：上500年尽人没鬼，中500年一半鬼一半人，下500年尽鬼没人。这是个无始无终的话，什么年代是上500年，什么年代是中500年，什么年代是下500年，人们无从知道，可这话一直在民间流传着。孩子们是怕鬼的，一听尽鬼没人就无比的恐惧，大人们就说傻孩子，尽鬼没人不是从外面来了什么鬼，而是人变成了鬼。孩子们就更为害怕了，好端端的人怎么变成鬼呢？是不是人都死了变成鬼了？大人们说：不是人都死了变成鬼而是活着就成了鬼，孩子们就更糊涂了，于是大人们就说你现在不明白，长大了就明白了。

现在有许多迹象似乎在验证尽鬼没人的时代已经来临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人类都遇到了同样一个麻烦，那就是“人而不人”。佛家希望人能成佛，道家希望人能成仙，儒家希望人能成人。要成佛的是少数，要成仙的也是少数，要成人的是多数。因此，儒教作为一种做人的教育，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而且，想成佛先得成人，想成仙也得先成人，

做科学家也是得先成人。总之不管是基督教也好，还是天主教也好，不管是民主派还是自由派，不管是一党专政，还是多党竞争坐庄，不管是官吏还是平民，都得先做好人，这是根本。如果人都做不好，一切免谈。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可是人类偏偏就在做人这个问题上出了麻烦。

人不知道如何做人，主要表现在“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个方面，叫做五伦。在人类奈何不了天地自然的农耕时代，只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就够了。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人类还必须处理好和天地的关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处理这几种关系时，应该是互爱互利。相互真诚，相互成人之美，在爱家，爱国，爱人类，爱万物，爱自然，爱天地，在爱满世界的爱的事业中，成就自己的人生。可是人类天生就是一种“不爱其类”的动物。人不如其类，人不胜鹰隼，“虎狼至暴也，鹰隼至鸷也，然不闻有相食者，何也？爱其类也。”可人类不爱其类，大概自从有了人类以来人就互相残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直到今天，残杀愈演愈烈，由冷兵器到核武器，都是用来杀人的。这是人类最为可恶的一点。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是人类这种动物，动物本能的表现。然而人又是动物里唯一能通过教育的手段可以超越动物的本能的一种动物，不仅可以成为爱其类的人，而且可以成为爱众生的人，能成佛、成仙、能成为仁者，成为圣人，这又是人类最为可贵的一点。

2500年前在世界的东方，世界的西方，同时出现了几个圣人：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在那个被称作人类的轴心时代，他们同时出现了。他们收徒、设教、传道、解惑，做起了教育人如何做人的工作，因此他们被人类誉之为佛，真人，圣人，先知。

孔子为了人类能超越动物本能，对人进行了最为深入的研究，打开《论语》细细玩味，孔子不愧为一个有史以来最有研究成果的人学专家，《论语》不愧为一部最权威的人学百科全书。

在人类所有的学问里头，对于人类来说最有价值，最有用的学问，莫过于做人的学问，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超越孔子所创立的高度。有一个叫叔孙武叔的人毁孔子，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但是毁孔子者从古到今没有断过，这也是孔子最伟大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每一次大规模的反孔，不仅没有使孔子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反而更为深刻长久。

秦朝的“焚书坑儒”导致了汉代的“独尊儒术”，文革时期的批孔破“四旧”，导致了今天的孔子热，中国文化热。中国的历史，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无论是哪

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府，哪一个家庭，一旦离开了对他的成员进行做人的教育，用不了多少年，就会使已经脱离了动物本能的人群，再回到“人而不人”的群体里边。有许多人是不愿意和“人而不人”的人生活在一起，更不愿意做一个“人而不人”的人。可是，眼见别人“人而不人”了，也只得“人而不人”。“人而不人”的世界是最可怕的世界。因此，弘扬中国民族文化，弘扬孔子文化，已经不是谁愿意不愿意做的事，而是必须做的事。这就是孔子重光于世的最根本的原因。二十一世纪是孔子文化的世纪，时也，势也。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因为人终归是要做人的。

孔子与老子根本上没有什么分歧

有人说孔子与老子的根本分歧就两个字“自然”，老子顺应自然，孔子要逆反自然。还说孔子抛开了老子的“道德”，抛开老子最高的“自然”，而把“仁”提到了最高。此论差矣。孔子与老子在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分歧，孔子也没有逆反自然，相反，孔子正是由于顺应了自然才成其为孔子的。“仁”也不是孔子能提到最高，而是自然把“仁”提到了最高。

这是老子告诉我们的。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这个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说，他说：“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怎么来的？是大道废了之后才有了的。老子还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乱之首。”老子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仁是失德之后产生的。礼也是，忠信薄了，社会开始乱了，这才不得不用礼来约束人们的言行。仁也好，义也好，礼也好，法也好，都是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产生的，是社会的产物，并不是哪一个人想提倡个什么就能提倡起来个什么，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一种东西在社会上流行，首先是社会有了这方面的急需，这才会一倡百应。倘若大道没有废，人们都以大道行事，还需要讲德吗？倘若人人都讲德，还有必要说仁吗？倘若人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还需要义吗？倘若人们都讲义，还要礼吗？同样的道理，倘若人们都知道荣耻，胡锦涛总书记还有必要提出个“八荣八耻”吗？

由此看来，孔子当初讲仁讲义讲礼，完全是顺应时势而来的。仁、义、忠、信、孝、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全都不是孔子的私货。孔子早就说过，他是“述而不作”，孔子所述的東西，在孔子之前就有了，孔子只不过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孔子和老子有什

么分歧可谈呢？孔子也好，老子也好，都是中国文化之树上生出的主要分枝，中国文化之树，根深叶茂，根而干，干而枝，枝而叶，累累相承，形成了一株不朽之树。这棵树上，千枝万叶，尽管枝枝相异，叶叶不同，可根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凡对孔子、对老子有深入研究的，都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

因此，以老毁孔，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可是毁孔者并不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对老子也没有多少研究，只是为了毁孔，才把老子抬了出来。前一阵子不是把上帝也抬出来了吗？上帝是神，孔子是人，人神不是同类，原本就没有可比性，可有人硬拿孔子和上帝比。说什么上帝使西方自由、民主，上帝使西方人聪明，孔子则使中国专制，使中国人愚蠢。如果中国人真的愚蠢也应该和孔子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孔子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个人，怎么可以苛求几千年前的一个人把几千年后的事都管起来呢？老子确实伟大，说老子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哲人，一点也不过份。但老子伟大，不一定就能证明孔子“是严重匮乏正确思维能力从而智能极其平庸的庸人。”更不能证明孔子是个什么“球”。孔子既然是个什么“球”，既然是一个“极其平庸的庸人”，何用一些人煞费心机、不遗余力地反孔呢？

几千年来，无论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孔子已不是一个人的符号，而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了。孔子伟大就伟大在他“述而不作”，伟大就伟大在他和整个中国文化融为了一体，伟大就伟大在他能顺应自然。中国古代的圣人不唯孔子一人。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是一个识时务的人，时务是什么？时务就是自然的一种势。自然无声无息，可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任何人任何物，顺自然者生，逆自然者亡。春种、夏锄、秋收、冬藏，这就是自然，违背了自然就不行。大棚蔬菜逆自然而生，可在大棚里人得营造适合蔬菜生长的室内温度，蔬菜才能生长，说到底还是在顺应自然。植物如此，动物如此，人如此，文化亦如此。逆反自然的文化必然是短命的，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孔子文化之所以不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顺应了自然。打开《论语》看看，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顺应自然的智慧之光。“适者生存”是西方一个很著名的哲学论点，孔子文化长盛不衰，正是“适者生存”这个论点最好的见证，怎么可以说孔子是逆反自然呢？中国人选择孔子，也是自然使然。孔子是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这是中国人唯一的选择。历史上的事我们没有亲睹，不敢妄加评论，近代，从砸烂孔家店到世界各地修孔子学院的历史，我们是目睹者。出生在文革前的人，谁都不会忘记“破四旧”的历史。在那个时代，谁家家里还敢藏一本古书？藏下就是祸患。在我们县城南面有个造麻纸厂，有一次我到那里看到小山似的书堆了大半个院子，有的古书装在布套子里、枕头似的，造纸工人拿铁锹铲粪似的，把布套子铲烂，同烂鞋底一起装入打浆槽里，打了纸浆。

多可惜啊！那是一场破坏文化的运动，那场运动不是冲孔子一个人来的，而是冲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的。因为孔子是和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的，孔子理所当然要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打那之后，中国的教育就完全走上了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远离孔子文化的教育。几十年之后，我们这一茬人，从青年步入老年，才逐渐认识到远离传统文化的教育，远离孔子的教育，是一种多么可悲的教育啊！1996年，九位德高望重的文化老人，向全中国发出了“紧急呼吁”，紧随其后，台湾王财贵教授，来到大陆，作了“百年震撼”的报告，这才唤醒了沉睡在打倒孔家店历史烟尘里的中国人，2000年，北京大学有一个名叫逢飞的青年，成立了“一耽学堂”，2001年河北涿州出现了中国第一个义塾——文昌祠义塾，同年陕西佳县出现了燕翼堂义塾。这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组织，以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一种文化责任心，开始了极其艰难的义教。这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就如孔子当年办学那样，谁能说不是一种自然呢？

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经历了传统文化从衰落到复兴的这么一个全过程，这个过程告诉我们，文化复兴也是一种自然使然。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都摆在了我们面前，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完全也是一种自然的选择，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在自己，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现在是这样，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因此，扣在孔子头上的种种罪名，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今后还会有人把人们想不到的罪名扣在孔子的头上，这也是一种自然，谁都管不了。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孔子也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米有三种价，人分上中下。中人以下，给他语上，他会笑你傻，他会骂你蠢，这也是自然。有人把孔子说成圣人，有人把孔子说成个“球”，谁能说这不是自然呢？上士有上士的自然，中士有中士的自然，下士有下士的自然，人有人的自然，狗有狗的自然，一切都在自然之中表现自己，这就是我所看到的自然。

闲话《闲话孔子》

佳县城的孔庙拆掉好多年了，现在，虽然变成了繁华的葭州商城，可那座庙依然屹立在我的心中。刚刚记事起，爷爷就领着我祭孔。爷爷说，这孔庙是他的爷爷亲自筹划重修的，当时的知州名叫凌树棠，安徽定远人，很支持这一义举。竣工时凌知州给我爷爷的爷爷赠诗一首，那诗就刻在碑上，爷爷常常念给我听，可惜我现在只记得其中的两句：“经营忘寝食，辛苦奠宫墙”。

现在，我也老了，该我领着孙子去祭孔，可孔庙却不复存在。但是，在孔子诞辰日，我还是要把孙子领到商城，表示一下对圣人的崇敬之情。我给孙子讲孔庙当年的情形，讲过之后，便一起背诵《论语》。

真没有想到，我的这一举动，却引起一个年轻人的嗤笑，说：“什么时代了，让娃娃念这些陈腐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科学和民主。孔子只不过是政客，一个中庸主义者，一个卖膏药的。你看看施蛰存先生的《闲话孔子》，你就明白了”。一阵劈头盖脑的批评，使我不知所措。我接过书一看，是一本高中语文《精品阅读》，里边收集了不少名人的作品，《闲话孔子》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不长。施先生在文章中说：“我读《论语》总读了几十遍，二十岁前，只读懂了“不亦说乎”，就是“不亦悦乎”，过了二十岁，又读马列，又读《论语》，足足四十年，我的思想依违于孔马之间，莫衷一是。于是我老了，重读《论语》才发现孔子并不是伟大的“圣人”，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是一个政客。孔子也创立了一个主义，叫做中庸主义。文章的结尾更损，竟然把孔子说成一个“卖膏药的”。

当然，这只是施先生的一家之言。孔子是否是个卖膏药的，无须我在这里赘言，人们都明白。我相信施先生也不是个卖膏药的，可《闲话孔子》倒是实实在在被人当作“膏药”卖了。在这本书里，在《闲话孔子》的后面，编者加上了四个大大的黑体字：美的品味！接着又是一段精彩的广告词。且不说广告词把《闲话孔子》吹了多高，光题目就够吓人的了：世纪难题与一家之言。几千年来，问孔、伐孔、批孔者不乏其人，然而如施先生如此品味的“一家之言”实在不多。我读了之后，倒觉的好像是一个被关在牛棚里的人写的“红心”表白书。

在中国，有不少骂祖宗的作家，在他们眼里，别人家的祖宗好，自己的祖宗该骂，骂得越下流越好。仿佛不骂祖宗他们就活不下去。他们骂祖宗时，往往把矛头首先对准孔子。其实，有些骂孔子者，只是为给主子看的，并不是他真的对孔子有多大的仇恨，更不是对孔子真的有多么深的研究。“生不能夺其志，死不能夺其名”的真正的学问家，实在是太少太少。

这就是我读了《闲话孔子》的感受。面对这个年轻人的批评，我能说些什么呢？孔子是中国人的孔子，也是世界人的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圣人、不是孔子自封的，是世界公认的，是历史公认的，不是几句“闲话”就可以话倒的。古今中外有多少人在研究孔子，有的人竭尽一生，都不能登堂入室，就连孔子的高弟子颜回都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施先生纵然是个天才，充其量只不过读了几十遍《论语》，而且在二十岁前，只读懂了“不亦说乎”，就是“不亦悦乎”。之后，整整四十年，依违于孔马之间。于是老了，忽然就读懂了孔子，并冠以孔子一个“卖膏药的”帽子，实在有些荒唐。

年轻人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科学，需要民主。中国人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就是在争取民主，在争取自由。以民主、自由为己任，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同样任重而道远。孔

子的文化我们丢不得，也丢不起。孔子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慎终追远、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仁义忠信、父慈子孝等等，难道我们不需要吗？如果舍弃了孔子的文化，我们的社会还能成其为人的社会吗？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科学、民主我们所欲也；孔子文化，亦我们所欲也。二者可以兼得，为什么要舍此取彼呢？

我把《闲话孔子》那本书还给了那位年轻人，说：“真正的卖膏药的不是孔子，而是编这本书的人，你听，商城里的那些叫卖声：美的品味！世纪新潮！精品一族！等等，和这本书里的广告词何其相似呀！”年轻人愣住了。回到家里，我久久不能入睡，便写下了这么一段闲话：——闲话《闲话孔子》。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读李国文《儿童读经之我见》。

读了2004年12月24日，李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我思了又思，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读经好，儿童读经真好。

我提倡读经，是因为我的孙子读经受益匪浅，这才想到别的孩子。我并没有如李先生所说的“神童期待”，更没有“成龙”的奢望。我有的是忧虑。忧孩子成不了人，更忧孩子读十几年书，什么也学不到。我看到“应试教育”的魔杖驱赶着成千上万的孩子，从儿时就不顾一切的涌向那座“独木桥”。少数跃“龙门”，多数休家门。休回家的孩子也都耗尽了父母的心血。希望破灭之后，不得不面对另一个真正的考验，那就是社会生活。许多孩子，几乎什么都不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我还看到，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只是有了成才的希望，能不能成人，依然是个未知数。烧熊事件、同窗凶杀，以及那个跳楼自杀的残疾人之子，就是证明。

现代的父母已不是“惟其疾之忧”，而是“惟其祸之忧”。他们的那颗心，受着儿女无穷无尽的熬煎。人们之所以大声疾呼儿童读经，正是对儿童成人的关爱，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倒退”，更不是“反时代的对儿童身心的戕害。”

近代，科技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使被人称作“东亚病夫”的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人文文化的失落，给人们带来的忧虑，不重视科技文化有外患之忧，不重视人文文化有自戕之祸。这已成了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科技文化，人文文化，犹如一部车子上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厚彼薄此，厚此薄彼也不可。

可是历史之舆，总是在偏颇中进行着，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如果，现在还不知道补那只跑气多年的轮子，我们将付出更加沉重代价。

李先生说：“以为从小灌输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就可以提高国民的教养素质，其实是一种虚妄的想法。”请问，中国的孩子，不灌输中国文化，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文化可以灌输吗？鲁迅先生也曾主张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可鲁迅写的书，也绝不是纯粹的“白兰地”，在他的“酒”里，依然有绍兴老酒的成份。因为他从小学的是中国文化，他所写出的书，也是中国书。中国文化的海洋，就是中国人在熔古化今的过程中积蓄起来的。什么儒家，道家，法家，什么杨朱，墨子，或者以后还一定会出现什么家，通通都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已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中国的孩子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首先接受中国文化。

几千年来形成的经典，不仅是智慧之门，也是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论语》是儒家文化之根，《老子》是道家文化之源。儒道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是中国人立心、立命、立德之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命脉所在，是中国人的“母乳文化”。我们的责任是让孩子们从小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民族文化的厚土上，让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流淌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从而树立起顶天立地的民族精神，并把文化之薪，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根之深者叶必茂，源之远者流必长。

然而，现行的教育却令人失望，孩子背上的书包越来越满，头脑却越来越空，用来作机械化训练的题卷越来越多，智慧却越来越少。为什么？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教材问题，翻开历年来的小学语文课本，无非是，人手口，蓝天白云，小羊小狗之类的东西。缺乏高明，缺乏博厚，缺乏睿智的所谓启蒙教育，荒疏了我们多少人的少年时光。泱泱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竟没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可是，使中国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个中国人却受到诺贝尔奖得主的无比崇敬，那个人就是孔子。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宣言说：“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到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可是，我们中国人，直到今天还被笼罩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烟尘里，有些人还要硬着头皮去诋毁孔子。年年陶醉在“圣诞”狂欢里的人们，他们哪一个人还知道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圣人呢？

面对如此浅薄的教育，许多家长只能“不惜心血”，“下大功夫”去补充自己孩子的文化。他们对现在的“应试教育”已完全丧失了信心。有人只所以还去挤那座“独木桥”，实在是出于万般无奈。如果学校能做到“因材施教”，使学生，各有所长，各有所长，能成人成才，敦厚崇礼，中正刚毅，文理密察。那一个家长忍心让自己的孩子“疲于奔命”呢？

我们处在一个物欲燃烧的时代，孩子“营养”不良，就不可能有较强的“免疫力”。我们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孩子没有实力，如李先生所说的“豆芽菜”，“豆腐丝”，在这个世界

上是难以生存的。

让孩子在经典里汲取点“营养”，增强点实力，有什么错呢？我的孙子今年九周岁，上四年级，六岁开始读经。已读了《大学》、《中庸》、《论语》、《老子》，现在正在读《诗经》。她越读越喜欢读。在校的成绩也不比别的孩子差，尤其作文。我惊喜地发现，读经之后，就好比给她心灵里安装了一个信息接受器。如温总理在电视上讲“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她边玩，边接口就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看到电视屏幕上“上善若水”，她很自然背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儿童读经太神了，难怪古人把它延续了几千年。原来，是一种绝妙的教育方法。我想，如果经典能进入幼儿园，进入小学，每天坚持二三十分钟，到小学毕业，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把该读的经读完。虽然还是一个小学生，但已经打下了成人成才的厚实的基础。事情就这么简单易行，何乐而不为呢？

李先生也承认“经应该读”。只是主张“成年以后再读”，并断言“怎么说也不迟。”我以为不可，连苏东坡那样的大家尚且感叹道：“书到今生读已迟”，何况我们这些读书甚少的人呢？诚如李先生所说“现在鼓吹儿童读经的人士”，“未必从小就读经”。不错，我就是“老大不小”才读经的。这正是我这一生最为遗憾的事。倘若我儿时就读诗书，我或许能成为一个鸿儒，可现在的我，却是个侏儒，文化侏儒。

至于说清王朝读经读出了“一盘散沙”，“东亚病夫”。那更是无稽之谈。白云苍狗，人老珠黄，自有其自然之理。“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从来没有人把功劳记在孔子头上。可清朝腐败无能，怎么就把责任推到读经上呢？如果有人以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异，就去找马克思算账，岂不冤了马老夫子吗？

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无不是前人精髓文化的集大成者，无不是在前人构建的文化顶峰上，添上了自己可贵的一簣，便成了巨人。“山登极处我为峰”便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凡称得上经典的经典，都有相通之处，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不难看到古圣先哲的思想火花，在儒家经典里亦可找到共产主义原理的基因。翻开《礼运篇》，看看孔子描述的“大同”，不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吗？

不要拒绝老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那份遗产太珍贵了。正如台中师范大学王财贵教授说的那样：“纵使我是美国人，我也要复兴中国文化，纵使我是外星人，我也要复兴中国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太有意义了。”老子文化“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孔子文化“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论谁，得其一鳞一爪，一角一趾，都会受用不尽。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敞开我们的胸怀吧！

人文文化，今不如古，西不胜东，科技文化则古不胜今，东不及西，中华民族文化的熔炉，必须容下古，容下西，熔得了古，熔得了西。只有可容能熔，才能铸造起无愧于时代的文化。而可容能熔，必须从儿童读经抓起，这是时代托于我们这些半桶子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来自山区的悼念

启功老人也走了，一位国学大师，真正的国学大师悄然而去，举国哀痛！不到十年的时间，九位可敬的文化老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原准备放了暑假，带上几个孩子到北京让启功老人亲耳听听来自山区孩子们的诵读经典的声音，可万万没有想到，启功老人没有等到放暑假就走了。

1995 年，启功老人同赵朴初、冰心、曹禺、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叶至善等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以 016 号正式提案形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

《紧急呼吁》字里行间，充满了焦虑和期待：

——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了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到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

——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们民族屡经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已到风烛残年，他们依然想到的是为历史负责，为民族负责，他们在殷切地期待“在有生之年重听弦歌，到古典学校中走一走，看看后继之人。”

“看看后继之人”，是九位老人最后的期盼！可是，就在当年，夏老就先走了，带着沉重的遗憾走了。之后，曹老、陈老、张老、还有冰心老人，赵老，吴老也都走了。

我是一个孤陋寡闻的人，当我看到《紧急呼吁》时，已到了二〇〇一年。那时，我对近百年来产生的那些效仿欧美、效仿沙俄，没有根的文学已没有了兴趣，一头钻在古书里，填补心灵的缺失，过起了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子。可是，越读，越坐不住了，一种责任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在我心里产生了。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子“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等等至理名言，汇集成了一股文化的波涛在冲击着我的心灵。

二〇〇一年，刚刚过了中秋节，天津师范大学一位教授来到我家，是他的一些话，打开了我心灵的闸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那位教授名叫邢向东，神木人，是一位古汉语专家，对方言的研究尤为精深。我直言不讳地问他，你是高等学府的教授，我不明白，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老祖先给我们遗留下那么多优秀文化遗产，不继承，不给孩子们教。这是为了什么？小学的语文教材浅而又浅，读起来味同嚼蜡，让孩子们学而生厌；数学教深而又深，又令孩子们不堪重负，望而生畏。真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精练导考》、《课课练》，各种“试卷”、“家庭作业”等等。这样的教育只能使孩子们“苗而不秀”、“秀而不实”……

邢教授听完我的话十分平静地说：“你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自从1995年九位老人紧急呼吁之后，老舍的儿子舒乙率先在北京办起了一所圣陶小学，把古典引入课堂，之后，全国各地都行动了起来，我的儿子七岁，就熟背了《大学》、《中庸》、《老子》……”

从此，九位老人就像九颗闪亮的星，在我心里升起，《紧急呼吁》就像警钟，时刻响在我的耳边。更像烈火，燃烧着我的心。

我首先教我的孙子、外孙子读古典，很快就见到了效果。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诲，又使我办起了“燕翼堂义塾”。每到周日，诵读古典的声音就会从教室里传出。每到这种时刻，我的脑海里就会出现九位老人慈祥的面容，期盼的目光。

到义塾来读古文的孩子们，不仅读古文，还学作文，学作古体诗，学作对

联，学说快板。并组织他们参加了“第五届手拉手杯”、“小天鹅杯”作文大赛，成绩很好。有获一等奖的，有获二等奖的，有获三等奖的。按通知，放了暑假，就可以到北京领奖。于是，我想，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们到启功爷爷那里，诵读经典，让老人家听听，可万万没有想到他却走了。

我打消了带孩子们去北京的念头，只能领着孩子们，遥望着北京，齐声诵读经典，表示山区人对一位国学大师逝世的哀悼。国学，不会成为“绝学”，国学的种子，已在千百万儿童心田里播撒，在生根，在发芽！启功老人，安息吧。

真有上帝上帝喜欢的一定是孔子

黎鸣先生《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的文章里说“西方人长期崇拜上帝，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上帝，中国人长期崇拜孔子，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孔子。”此论不可成立。据黎鸣先生说：“上帝是个抽象”，抽象即无像，无像之像，就无像可像，西方人的人性怎么就像了上帝了呢？上帝如果有像，岂不也成了具像了吗？人性如果能像了上帝，那么上帝也必俱了人性，俱了人性的“神”，还是上帝吗？由此推下来，黎鸣先生“西方人像上帝”论不可成立。不仅西方人像上帝论不可成立，就是“中国人像孔子”论也不能成立。试问。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那一个像孔子？鲁国有那么多人崇拜孔子，哪一个人像了孔子？孔子歿后，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由此可知。孔子的弟子中都没有一个像孔子者，有子也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孔子之后到现在二千五百多年了，在古人里，学孔子者，亦步亦趋，不能说没有下了功夫，可自古到今，没有听说谁像了孔子。

既然西方人性像上帝说，中国人性像孔子论都不能成立，那么，中国倒霉论也不能成立。

可黎鸣先生为什么能作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呢？好恶所致也，黎鸣先生好上帝，好西方人，恶孔子，恶中国人。《大学》中说：“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

黎鸣说：“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唯一的‘神’，神是什么？先于一切，而又创造一切的无上存在，无上存在是什么？无言可说。”

说了半天，上帝是个“无言可说”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中国人信了这个存在就有救，不信就倒霉。其实，黎鸣先生所说的那个存在不就是中国人说的道吗？道也是个“无可言说”的存在，也是“先天地而生”的存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是个创造一切的存在。不过，中国人把那个存在不叫上帝，不叫“神”，叫做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鬼神也是万物中的一种，也是道所生道所长，道所成。孔子也承认有鬼神，可他要人们“敬鬼神而远之。”他不言“怪、力、乱、神。”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季路又问：“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个很实际的人，他要人先把人的事做好，把活着的事做好。

中国人也有信神的，但神没有唯一，只有道是唯一。山神土地门神灶君，举头三尺有神灵，五行八方，风婆雷鞭，要什么神有什么神，想敬什么神就敬什么神，在中国人的心里，神不是至尊，道才是至尊。黎鸣先生想让中国人信上帝，从此不再倒霉，用心良苦，可是要办成这么一件事，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即使中国人全信了上帝，恐怕也难逃倒霉的命运。因为中国的倒霉肯定地说不是上帝使然，也不是“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使然。上帝爱众人，上帝对众人的爱一定是一种不加任何条件的大爱，绝对不会因为不信她，她就使他所爱的人倒霉。因崇拜上帝而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也绝对不会因不信上帝就去杀害他们。可偏偏在这个世界上，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中国人因为孔子倒过霉，阿富汗没有孔子，伊拉克也没有孔子，可也要倒霉，这些倒霉的事，到底是谁弄出来的呢？既不是上帝弄出来的，又不是人性像了上帝的西方人弄出来的。那么一定是不信上帝的西方人弄出来的。不信上帝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因不信上帝而倒霉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西方人吗？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信上帝的人过去就有，现在就更多了，现在的中国政府很宽容，十分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上帝的信徒在城市在乡村到处传教。既然信了上帝就不倒霉，可为什么信了上帝的中国人还要跟着倒霉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吗？

至于说孔子使中国人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此话也有些一概而论，中国人里头不信孔子的人比信孔子的人多的多，就现在的中国，一万个人里头，恐怕找不出一两个真信孔子的人，近几年出现的由唐装、汉服、祭孔、拜孔、名人解说经典，儿童导读所构成的所谓“国学热”大都是商人的炒作。真正的孔学，到汉代就变成了训古学，到了唐代就变成了诗赋学，到了宋代就变成了程朱理学。再加上批孔，一批再批，早把孔学连根刨了，哪去找信孔子的人呢？可中国人还为什么要永远倒霉，永远倒大霉呢？难道就因为中国过去有过个孔子吗？

黎鸣先生张口倒霉，闭口倒霉，我不知何谓倒霉。中国人倒霉的事莫过于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事，莫过于日本侵华的事了。还有比这更倒霉的事吗？如果这算作倒霉，这个倒霉

正是因为没有听孔子的话所致。孔子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中国共产党，教民以战，全民皆兵，西方列强不是夹着尾巴逃跑了吗？

孔子不是上帝，孔子是个人，黎鸣先生所说的上帝，如果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那么上帝最喜欢的人一定是孔子了。中国人真如黎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性像了孔子”，那么，上帝偏爱的一定也是中国人。因为孔子就是一个“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

让中国人倒霉的不是因为中国人不信上帝，也不是因为中国人信了孔子，而是因为西方人的霸道。要中国人不倒霉，惟一可信的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三问哲学家黎鸣

黎鸣先生要“消灭孔子”，要中国“彻底西化”，要“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咱先不问该不该“消灭孔子”，就问可能不可能“消灭孔子”？先不问中国该不该“彻底西化”，就问中国可能不可能“彻底西化”？先不问中国人该不该读中国书，就问中国人可能不可能不读中国书？

先说可能不可能把孔子消灭掉。最近在报上看到鲍鹏山先生一段话，他说：“孔子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他是中华民族道德信仰的核心，是整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是我们这个民族道德文化的最后依据。由“五四”前上溯到孔子在世之时，2400年间，我们一直是东方文明古国。为什么？因为有孔子以及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在，有为大众所崇尚并践行的仁、义、礼、智、忠、恕等孔子所提倡的东西在。这是一种内在的、深远的影响，无处不在，无远弗届”。

的确如鲍先生说的那样，那个“无处不在，无远弗届”的东西，已成了一个精神的存在，抽象的存在，绝对的存在。这个存在在中国乃至东亚南亚一些国家人的脑海里已存在了2500多年。孔子如果是个具象的存在，肉体的存在，实在的存在，好办，把他杀死，火化了，就不存在了。而孔子是捉不住，看不见的存在，黎鸣先生再有本事，是奈何不了这么一个存在的。李大钊先生说得好“实在的孔子死了，不能复生了，他的生涯，境遇，作为，丝毫不能变动了。可是那历史的孔子，自从实在的孔子死去的那一天，便已活现于吾人的想象中，潜藏于吾人的记忆中，今尚存于人类历史中，将经万劫而不灭。”秦始皇就消灭过孔子，来了

个焚书坑儒。如果秦朝能统治上三五百年，一直执行“焚书坑儒”的政策，三代五代，十代八代不提孔子，不读孔子的书，中国人就会把孔子忘掉。可惜，秦朝那么短命。到了汉代就出现了个“独尊儒术”。物极必反的法则，在孔子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文革”时代，中国人原本已经快把孔子忘掉了，想不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突然来了个批林批孔，把孔子又翻了出来。我们这一代人上学时，几乎没有受孔子的什么影响，就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了批判，读《三字经》，读《论语》，读《孝经》，我比别人还多读一本书，就是《白虎通义》。批孔的目的原本是想让人们把孔子批臭，不再信他，其结果反使许多中国人接受了孔子。黎鸣先生的批孔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此，黎鸣先生要“消灭孔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尽管他说他如何如何的悟了老子，对全世界说“现在有了我”的大话，但以我之见，黎鸣先生不及老子的一鳞一爪。尽管他把孔子骂得比狗屎都臭，但以我之见，他不及孔子一角一趾。消灭孔子唯一的办法就是超越孔子。有了石油，就不用麻油点灯，有了电灯，就不用石油灯。如果黎鸣先生能把自己的那一套拿出来，而且事实证明他的那一套确实比孔子高明，中国人自自然然就会把孔子忘了。说实际一点，黎鸣没有能力给中国人创造出一个可以取代孔子的价值体系，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个取代孔子的生活方式，更没有能力弄出个可以取代孔子的信仰来。没有电灯的时代，人们只得用油灯。

是中国人选择了孔子，而不是孔子让中国人选择了孔子。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谁不想打倒孔子，取而代之？秦皇汉武想，唐宗宋祖想，顺治想，毛泽东也想，生硬是取代不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哪一个不想取代孔子？都想，鲁迅就想，黎鸣先生也想。生硬是取代不了，他们能熬个各领风骚数十年就不错了。哪能和万世师表相比？

不要动不动就把孔子和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说事要实事求是的说，是大众选择了孔子。至于什么人想利用孔子，如何利用？那是他们的事，与孔子没有什么关系。一把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用来做什么？那是使用者的事，与刀没有关系。

这一次的“孔子热”，首先是从民间热起来的，人们受够了读不懂古书的苦，受够了没有孔子的苦，受够了没有道德仁义的苦，这才呼唤道德的回归，呼唤文化的复兴，呼唤孔子的重光。上学难，就业难，打官司难，看病难，赌博、乱性、偷盗、抢劫、吸毒、腐败、造假等等不道德的事越来越多，其根本原因就是孔子精神的失落，孔子文化的失落，孔子信仰的淡化。道德问题已成了普通老百姓最为忧心的事情。道德荒漠化，比土地荒漠化来的更迅猛，更可怕。婴儿奶粉里忍心放毒，狂犬疫苗忍心作假，买斤猪肉都不能放心，这还是人生存的世界吗？历史再一次证明，人类如果失去了孟子所说的四心，就不是人了。虎毒，蛇毒尚不伤同类，人一旦丧失道德，就成了不爱其类的动物。孔子把人引向人路，他所倡导的仁、义、

礼、智、信、忠、孝、廉、毅、和把社会引向人的社会，因此，中国人才把孔子尊为圣人。

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已不是实在的存在，黎鸣先生是一个哲学家，一定会知道，不是实在的存在，是消灭不了的存在。即使中国人不要孔子了，谁敢肯定东亚南亚诸国的人们不要孔子？上一代人不要孔子了，谁敢肯定下一代人不要孔子呢？即使东方人不要孔子了，谁敢肯定西方人不要孔子？孔子不仅是中国的存在，东亚南亚的存在，也是整个世界的存在，人类的存在。黎鸣先生面对这么一个绝对的存在，敢言消灭。这不是吹大牛吗？

下面说说“彻底西化”，东、西也不是一个实在的存在。只有具象才有底，升、斗、碗、瓶有底，江、河、湖、海有底。东、西、南、北没有底。东中有西，西中有东，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东西，如何彻底西化？

问题的关键是黎鸣所谓的“彻底西化”，会不会给中国人带来好处，还是个未知数。现在的西方人已经对他们的文明，产生了疑虑。所谓的西方文明，是野蛮掠夺资源的文明，是加速人类毁灭的文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曾经被认为普世法则的法则，已被现实粉碎。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哲学家已经在警告西方人，如果不吸取东方人的智慧，西方文明就没有指望了。气候变暖已经成了全人类不得不关注的头等大事了。然而在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气候会议上，那些国家政要们，在“无有适者”的事实面前，还在做着“适者生存”的美梦。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其态度是那样的不坚决，又一次暴露了西方文明是一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只顾当代不顾后代的文明。

世界原本就是由不同组成的，有东必有西，有西必有东，世界“彻底西化”之日，就是宇宙中这颗蔚蓝色的生命之星毁灭之时。

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五四”时提出的“全盘西化”，是错误的，同样黎鸣提出的“彻底西化”论也是错误的。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共同精神家园不是随便可以建立起来的，也不是随便可以毁掉的。苏俄式的精神家园，美国式的精神家园，都不会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安宅。中国人的共同精神家园，就是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中国人一旦离开了这个东西，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西方有优秀的东西，东方也有优秀的东西，取其长，补其短，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在中国文化的老干上换几个外来的优良品种的接穗是可以的，但是，要把老干彻底铲除，万万不可以。中国人近百年来在西化的路上，已经走的相当的远了。走到现在，才发现“此路不通”的警示。这才不得不会过头来，找回自己失去的文化。能找回来吗？能！因为，孔子文化的根就扎在中国人的心里，这个根不是孔子栽上去的，而是中国人与生俱有的。孟子所说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就是中国

文化的根。人如果没有了这四心就不是人。然而，人之初，四端只是萌芽。这四个萌芽，要养正，只有养正才能使它成长，因此《易经》上说：“蒙以养正，圣功也”。此四端若能扩而充之，顺着“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平天下”的路径走下去就“足以保四海”，不能则必然如《三字经》所说的“苟不教，性乃迁”的路径走下去，“不足以事父母”。人一旦性迁，轻则禽兽，重则禽兽不如。这就是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本所在，即使没有孔子，也必然会产生和孔子文化相同的中国文化。必然会产生与之相应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信仰核心。这也是中国不可能“彻底西化”的根本所在。黎鸣是中国人里头“深刻西化”了的一个，然而他也做不到彻底。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的是中国血，吃的是中国人的奶，读的是中国书。黎鸣尚且“彻底西化”不了，偌大一个中国怎么可能彻底西化呢？这不是白白做梦吗？

下面再说要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一个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不读中国书可能吗？鲁迅先生曾也说过，这样的话。可鲁迅自己也是读中国书长大的，如果不读中国书，也就没有中国的鲁迅。黎鸣不也是读中国书长大的吗？不读中国书，也就不会有中国的黎鸣。即使孔子不可以读，至少《老子》、《墨子》总可以读的。《老子》、《墨子》不是中国书吗？即使文言文不可以读，近百年来的白话文总可以读吧。鲁迅的书，黎鸣的书不都是中国书吗？鲁迅总可以读吧，黎鸣总可以读吧。鲁迅先生当年说中国人不要读中国书，可始终没有开出个中国人可读的外国书目来，黎鸣照样开不出来。最好是给中国人准备好比中餐更好吃的东西，再去夺人家碗里的食。建好了新房，再去折旧房子。否则面对这么多中国读书人，哪里去找那么多外国书？不要他们读中国书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一定得读中国书。只要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中国书就会存在，中国人必然首先读中国书。不要中国人读中国书，岂不太可笑了吗？

就此三问请教黎鸣先生。先生若说可能，请说出可能的道理。

铲除中国传统就是铲除人类文化

无论是西方传统，还是中国传统，都是人类经过长久的创造才形成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后辈人本应精心呵护，继承发扬才对，绝不能铲除，更不能彻底的铲除。“文革”时就做过那种彻底铲除的傻事，那种傻事不能再做了，再做，就更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

生存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由于地域的不同，生存环境的不同，便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世界上任何文化的产生，都是因为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才产生的。能形成传统的东西，一定是一种长久的需要，永恒的需要。当某种东西，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人类不再需要了，自然而然就会消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凡是倒了的，一定是人们不再需要的，凡需要的，谁也打不倒，打倒了还会站起来。

但是世界上被人为铲除了的东西确实也不少，尤其是文化。一个民族想要消灭另一个民族，首先消灭的是文化，只要三代人把自己的文化忘掉，事实上，那个民族也就不存在了，一个民族的存在，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个中国人不再认同自己民族的文化，不再认自己的祖宗，那么那个人也就不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我这样说并不是排斥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我们要学习，要吸收，这叫化西。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的消化，就变成了中国佛教，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经过中国人的吸收，变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自己永远是自己。要是把自己打倒了，铲除了，还有自己吗？因此，中国人还是不要把自己的传统彻底铲除为好。

现在世界上能保留下来的文化传统不多了，算来算去也就只剩下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为主流的两种传统，如果把中国的传统也人为的铲除了，地球上就只剩下一种传统。只剩下一种传统将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其结果就是人类整体性的灭亡。那样的结果，就连西

方人也不会接受。西方人对待中国传统也是一种学习的态度，他们过去在中国传统中学了不少东西，现在也还在学，将来还得学，不把东方的东西消化了，西方文化也发展不了。

世界万物，本来就应是《中庸》中说的那样“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类也是万物中的一种，人类如果要想在地球上长久生存下去，就得不害万物，“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把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把物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这样做还不够，还要做“赞天地之化育”的事（引自《中庸》）。赞者，助也，能助天地之化育，才配称天地人，三才中的一才，如果不赞天地之化育，人类将在地球上也难以生存。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在追求人类的幸福，其区别就是西方文化追求的是当下，是自己，而中国文化追求的是长远，追求的是整体的人类幸福。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用王阳明提倡的“知行合一”，佛家讲的“解行相应”去实现“天人合一”。因此，中国人不敢轻易损害天地，偏重在可再生的物类上做文章，使其成为“赞天地之化育”的自然产业，无害天地的产业。西方文化，欠考虑这一点，偏重在不可再生的物类上下功夫，无限制的索取自然。为了更快的索取，就发明高科技，更高的科技。科技水平愈高，不能再生的物类消灭上愈快，有害物质产生的也就愈多，他们过了今天不管明天，好活了这一代不管下一代。就这样，不“赞天地之化育”的生产愈发展，愈加速了人类灭亡的进程。进入二十一世纪，不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有许多人看出了这个严重的结果。西方人看得比中国人更清楚，因此，许多西方人的目光投向了东方，希望在中国传统里寻找出路。就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中国人还要大叫铲除中国传统。中国传统已成了西方，东方共同需要的东西了，能铲除的了吗？

事实证明，中国人“天人合一”就是比西方，“物竞天择”略高一筹。“赞天地之化育”的科技要发展，坏“天地之化育”的科技要限制，这是历史给出的结论。当下的利益固然不能忽视，可人类长远的利益也不能马虎啊！

和而不同是中国人的智慧。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如果把和自己不同的东西都铲除了，自己也就不可能生存了。现在的问题不是铲除这个，铲除那个的问题，而是出不来可以取代中国传统的新东西，如果出来了比中国传统更好的东西，中国传统自然会消亡的。

中国传统是人类文化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铲除中国传统就是铲除人类文化。

答格非小同学

尊敬的格非小同学：

我为什么也用尊敬二字呢？因为你小，孔子说“后生可畏”。你以及比你小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比你们大的人沾染已深，斑斑驳驳，已推满了许多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颜色，而你们却是素的。

你能提出问题，这本身就说明你善于思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中庸》中的话。有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问了还不知，再问，一直到知道了才肯罢休。有些问题思考不清楚，继续思考，一直到思考清楚。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也才开始学，有许多问题我也说不清楚，想不明白，因为“学而时习之”，重在时习，时习就是行，而且要“笃行”，如果学而不行，就不可能对事物的本末有个透彻的理解和体悟。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孔子对他那个时代学者的叹惜，他那个时代学者尚且如此了，何况我们今天的学者呢？知难，行亦难，知行合一更难。因此，我的解答不一定正确，仅供你参考。

你信中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孔子的错处，许多人这么认为，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哲学家，也常常拿这一条批判孔子。其实，他们并没有把这话的意思弄明白。此话是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复的话。齐景公，作为一国之君，没有君的样子，君使臣不以敬，臣事君不以忠；作为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父不仁，子不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这种情况下，问政于孔子。孔子没有客气，一针见血，刺到了他的痛处，只说了四个重叠起来的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个重叠起来的字，说了一个因果关系，不是说的等级关系，君君，父父，是因，臣臣，子子，是果。若君不君，父不父，必然导致臣不臣，子不子。齐景公是自食其果，怨不得别人。孟子对孔子这个思想作了发挥，孟子告诉齐宣王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齐宣王还问孟子说，汤放桀，武王伐纣，这不是弑君吗？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贼残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不管孔子也好，孟子也好，在君王跟前说话，有一点点奴性吗？没有。相反，他们往往用一句话就刺得君王喘不过气来。因此，当权者是不会用孔子做官，也不会用孟子做官。孔子的态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而孟子则学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孟从来没有“将建立功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孔子也没有“道德至上，教化万能”的思想，孔子只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还说过：“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至于你所说的“强权至上”，“个人专制”，“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都不是孔孟的东西，相反，《论语》也好，《孟子》也好，到处闪耀着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光芒。比如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以承祭祀”。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还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读了孔孟的书，不仅不会使你“奴性十足”，反倒会使你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文天祥是个儒者，他的《正气歌》读了令人慷慨激昂，荡气回肠，他的绝命辞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范仲淹是个儒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令许多人叹服。

古代的贪官，都是贼仁贼义之辈，他们根本不是儒家，儒字从人，是人需要的人。至于现代的贪官，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读过《四书》，他们根本不知道道德为何物。古人说“礼一失，则为夷狄，再一失，则为禽兽”。中国文化一失再失，又失，失到现在，有些人禽兽不如了。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下决心找回我们的文化，构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科技是好东西，民主也是好东西。但事实证明，科技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使道德水平也提高，自由和民主，并不能取代仁、义、礼、智、信。这两样东西，并不是水火不能相容。鱼不能代替熊掌，熊掌也不能代替鱼，二者不可兼得，只能取其一，二者可以兼得，何乐而不为呢？一般来说，具有仁、义、礼、智、信品格的人，其思想一定是民主，他不会独断专行，更不会触犯法律。一个具有仁、义、礼、智、信的社会，民主和自由也易实行。相反，丧德失义，不讲理，不守信的人，他们只要自己的民主自由，别人的民主和自由他是不肯给的。这个问题，很复杂，要给你说清楚，我的水平有限，说不清楚，我这里引用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先生《传统儒学现代化的一次努力——以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为个案的研究》一文中的一段话，请你仔细读读，或许有所补益。

“梁（漱溟）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由‘意欲’决定的三大文化系统：‘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这三种文化代表了人类要解决的三类问题：人对物的问题、人对人的问题和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西方是‘遇到问题对于前面的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国则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印度则是‘遇到问题他就要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梁认为，这三种不同的意欲反映方式，构成了西方、中国、印度三大文化体系的本质和心理基础。

“梁漱溟依据人类要解决的三种问题，提出了世界文化的三重现说，认为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实际上代表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第二阶段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印度文化为代表。人类文化的发展，按正常顺序，都要次第地经过这样三个阶段。西方文化是人类正常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第一阶段的道路没有充分走完，就‘中途拐弯到第二或第三路上来’，因而具有‘早熟’的特点。在梁的文化模式里，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世界意义上的文化，它们只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存在中、西两种文化绝对的不可沟通，不存在‘要学西方就必须抛弃中国’的二分模式。梁的‘意欲说’和‘阶梯观’的分析方法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有相似之处，是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抽象概括，并没有人类学、考古学的旁证，它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了 20 世纪初期流行的文化一元论观点，肯定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价值，从而把中西文化论战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依据文化‘早熟’说，梁认为，孔子在第一路向走完以前，就把中国文化引向了第二路向，中国的天才超越了他们所处的物质环境，跳过了人类社会必经的追求物质文明的阶段，而达到了比中国文化演进层次更高一层的人性方面的理解，即对人际关系的把握。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导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变成了一种不明爽的存在。孔子的学说，到了先秦荀子时代开始遭到曲解，荀子把儒学的发挥放到外在的约束和建立硬性的行为规范上，‘荀卿虽为儒家，但得于外面者多，得于内心者少’影响了对内在生命及超越性的理解。以后的历代学者，‘数千年间，盖鲜能采用孔子意思者。然即由其所遗的糟糠形式与呆板训条以成之文化，维系千年以迄于今加赐吾人者，固已大矣。’传统儒学成为从功利、政治、伦理与政治等方面进行硬性规定的‘死硬教条’。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进一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归纳为幼稚、老衰、不落实、落于消极再无前途、暧昧而不明爽五大病症。他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一样，激烈地批判了历史上的‘假儒学’。他对传统儒学的批评态度，不下于同时代任何人。

“梁漱溟判断，20 世纪的人类正处在由第一期文化向第二期文化转折的时期，对此时的人类来说，必须抛弃西方人‘理智’的生活方式，代之以中国人‘理性’的生活方式。他从科学和民主政治为西方社会带来的各种问题，从柏格森、罗素等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以及各种社会主义主张，来论证中国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文化的新趋向。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以物支配人的西方文明必将以人支配物的中国文明所取代。当然，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制度的复兴，而是以‘理性’为特征的中国人生态度的复兴。

“虽然世界文化的发展正处在由以西方代表的第一期文化向以中国代表的第二期文化的转变中，但在中国本土，仍要补上‘文化早熟’的课。中国虽为第二期文化的发源地，但当下的历史主题仍是完成第一期文化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的复兴要以中国社会的改造为历史前提，因而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必须以孔子的人生态度修改西方‘向外逐物’的人生态度。他认为此时中国人应持的态度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同时，‘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为此，他以佛学的某些概念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思想材料，并与王阳明的心学和泰州学派相揉合，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重新诠释和改造，试图找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使原始儒学的生命与智慧重新活转于现代社会。”

梁漱溟先生的“三期说”，是有道理的。就社会总体发展而言，大体应该是这么个次第，似乎不可逾越，然而就单个人来说，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老子也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孔子和老子时代的人是那个样子，现在的人也一样。

格非小同学，苏东坡说“书到今生读已迟”，这句话其中还有什么深意，我不得而知，至少他说了这么个意思，那就是说，用我们的一生去读书，都读不完。纪晓岚编完《四库全书》之后，慨叹道，古人把应该说的都说了，我们再说，那不是重复吗？因此，他有那么高的学问，没有出什么书，只留下一个《草堂笔记》。作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四库全书》应该去读，然而读过《四库全书》者就是古代也不多。不要说《四库全书》，就现代的读书人，读过《四书》的也很少。我以为作为当代的读书人，最起码应该读读《四书》、《老子》、《庄子》。不要怕有毒，这些书就像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盘水果：瓜、桃、梨、枣，你放心去吃。至于你的肠胃能吸收什么精华，或者会排出去什么糟粕，别去考虑。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也别指望会有个什么“能人”指点你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因人而异，能吸收什么，能排出什么，也不尽相同，而且精华和糟粕的区分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者见高，低者见低，牛粪者见牛粪，驴屎者见驴屎。

于丹也好，刘心武也好，他们说的确实好，但毕竟是一家之言，再好，也是“二手货”，是他们的感悟，不是我们自己的感悟。读原典，那才会探到“源头活水”，我们的心灵和源头活水会通了，笔下流出来的，口里吐出来的，那才是自己。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再谈。

附：格非的信

尊敬的韩海燕老师：

您愿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令晚辈敬仰有加。但是，您提倡的读儒家之学，我认为不妥之处颇多。我是苏州中学高一六班某一女生。我以学生的身分写此公开信，不揣冒昧，但请相信，我不是在浪费时间。

儒家学说讲究道德，把“仁义道德”作为人才评定的标准，单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国人就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此以至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使中国人的奴性年深日久，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是中国近代史屈辱的源头，是鲁迅先生内心最疼的创伤！

儒家主张入世为官。将“建立功名”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自儒家诞生以来，有几个人得明君施抱负？而又有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儒家这种道德至上、教化万能的思想导致强权至上，个人专制，是封建统治的需要，就这样使中国政治与民主政治一次次失之交臂，无法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提高写作的办法很多，例如读四大名著、《史记》等古代文学名著。其中《红楼梦》乃中国集大成之书，中国成立红学会，即可见得其博大精深，取之不完，用之不尽，以事实说话，比讲大道理的教育效果，多少要好一点。

所以，无论从科学，还是从文化，我都不主张“读儒家经典”。它实在是毒害当代青年。去之糟粕，取之精华，若是从民族文化传统上讲，我认为听于丹、刘心武之类名家心得，就足够了。您认为呢？

格非

2008年11月23日

给榆林市委书记的公开信

榆林市委书记：

我给你写了一封长信。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我信中的这些话，也曾说给过一些当官的听，可他们一笑了之，根本听不进去。一次，我在榆林遇上了熟知你的一位先生，他听完我的话，十分激动地说：“你何不把这些话说给市委书记听呢？他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于是，我才决定写这封信。

《中庸》中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要想建立一个和谐的榆林，必须弘扬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舍此，别无他途。人类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如何进步，国家如何发展，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和人，人和自然如何相处，已成了人们所面临的最重要、最难解决的问题。许多人把目光移到文化这一命题上来。西方一些哲学家预言，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文明的冲突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进程中的最后阶段。未来世界文明冲突将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然而在东方哲人的眼里，冲突和和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解决冲突的唯一正确选择。老子也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中国人一贯奉行着执两用中的哲学原则，驾驭着历史之舆，创造了几千年的文明史。执两用中的原则也是西方人可以接受的原则。周恩来总理，在 1954 年万隆会议上，讲了《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话，搏得了全世界与会人员的长时间的掌声，并以《中庸》的这个精神，制定了国与国之间至今都被世界各国所遵循的外交准则。温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讲演中向全世界大声疾呼：国与国之间要和平，人与人之间要和睦，人与自然之间要和谐。他说：“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是人类文明的前提”，温总理的这些闪耀着东方哲学光芒的讲话，同样受到现代西方人的赞赏。和而不同，才是世界交响乐中的主旋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内涵，化掉了不少外来文化，每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时，无不是想把中国文化化掉，取而代之，可事实上，都被中国文化所化。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太伟大了，而且那种文化根植在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中国人有着很强的免疫力。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媲美，不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所征服，但经不起来自自己人的毁灭。一百多年前，当西方文化席卷亚洲时，有些中国人错误地把中国的落后、清王朝的无能归罪于传统文化，打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帜，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戕害，连被世界公认的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中医，也要废除。不可否认，在“全盘西化”的进程中，西方科技文化，使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科技文化的取得，

难道就一定要以牺牲传统文化为代价吗？现在，我们把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了。在清末民初，我们缺少的只是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就在那时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把科技文化补上不就行了吗？可当时决定国策的人却执其一端，找了一些不太高明的“医生”，开了个“泻”的方子。而且一直在“泻”，直泻到非常虚弱了，还不知道“补”。一个没有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还能成其为民族吗？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就是那个民族的灵魂。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之所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决定因素就是中国人那种匹夫不可夺志的民族精神。

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较量，说到底精神的较量。很难想像一个文化上的弱国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强国，很难想像没有文化修养的子民会是一些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子民。现在，青少年犯罪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不只是青少年的犯罪率在上升，壮年、老年、国家机关干部、甚至高级干部群的犯罪率也在上升，为什么？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文化的失落。

文化失落到人不知道怎么做人了，连“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些起码的做人道理都不知道了。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人文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许有人会问：学校不是进行着文化教育吗？不是也在经常喊叫道德教育吗？是的，学校是进行着文化教育，但现在的学校进行的是科技文化的教育。人文文化的教育早在我们的教育中消失了。所谓教育，必须是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并重的教育，而且首先要进行人文文化的教育，不进行人文文化的教育就进行科技文化的教育，犹如一个人没有学会走就让他跑。犹如没有打地基就在上面盖楼，没有学会走就让他跑没有不摔跤的，没有打地基就在上面盖楼没有不倒塌的。现在，学校教育主要是科技教育。真正的教育，首先要给孩子们教做人的文化，教给了做人的文化才有希望从根本上建立起道德的基础，建立起完整的免疫系统。不然，即使是受过高等科技教育的人，也不知道如何为人处事，尤其遇上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不健康的东​​西就不知所措。缺乏免疫力的人们就像草一样，随便遇到什么风都会偃伏。不仅毁了他们自己，也危害了家庭和社会。

2004年3月31日，中宣部、国家教育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纲要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和争夺下一代的图谋；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面对日益开放的环境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在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不断增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然而，这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却没有人认真的去完成。为什么？纲要要求人们能以国家利益为利“以义为利”，可现在的学校却大都是“以利为利”。学校教育完全被市场化了，学校已变成了争利的场所。为了利，办学人不惜一切手段创造一些所谓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学生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个好的学校、好的班，便去花不应该花的钱。这个过程，就是腐败人的过程。连小学、幼儿园都有什么重点、非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学校在迅速萎缩，有好多农村没有了学校，即使有个学校也是非重点，为了追星似的追那个重点，那么小的孩子都得跑很远的路去别的村子上学。于是有些农民就想，与其在邻近村子上那个“重点”，还不如到镇子上去上，不如到县城去上，不如到榆林去上。如果稍注意一下农村的教育，就会发现，现在的农村教育和五十年代比都差远了。最无奈的是农民，他们为了孩子的前途，起窝动户，搬到镇子上，搬到县城，搬到榆林，租赁地方，把家里的庄稼丢了，把牲畜丢了，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这还是农村有一点能耐的人，没有能耐人家的孩子，只能上非重点学校，上非重点班，坐最不好的位置。上重点学校要花钱，上重点班要花钱，坐一个好的位置也要花钱。据说，有的学校调换一个好的位置都要花上好几百元，有人戏称为“法轮常转”，这就形成了教育的极大不公平，这对人文精神又是极大的伤害。就这样的教育还指望弘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吗？有一个小学校长告诉我：所谓素质教育都是虚的，分数才是实的，当然啦，素质教育喊还是要喊，而且要喊得响响的，应试教育却要抓得牢牢的，分数是一切，一切为了分数，分数上去了就有生源，有生源就有财源。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国家办教育的本意，原本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

教育改革已改了好多年了，可改来改去总跳不出“应试教育”的泥坑。由于人文文化的失落，淡泊名利，忧国忧民的人少了，“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人少了；即使有个别人，有那种情怀，也被周围的人视为“怪物”。有人说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其实失败就失败在人文文化的教育上，科技教育还是成功的，我们的宇宙飞船毕竟是上了天的。一百多年以来，人文文化的教育是一种很肤浅的教育。人文文化的教育是通过语文实施的，可我们的语文，已失去了提高人们人文修养的品格。我这一代人的父辈儿时读的书是“人有足，又有手，马有足，没有手”。我们这一辈人儿时读的书是“羊，大羊大，小羊小”。我的儿孙辈读的书无非也是小猫小狗之类的东西。这种没有人文文化的所谓启蒙教育，荒疏了我们多少人的少年时光啊！五谷养身体，五德养精神。而大多数人只注重养身，不知道养心，残缺的教育，培育出来的人必然也是残缺的，现在患心理病的人很多。原因就是儿时缺乏五德“营养”。儿时“营养不良”，上了大学许多人又多患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人一生中有了这两个不良，要想造就好的人材，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个别人有很好的天赋也很难，到头来

只能成为一个文化上的侏儒，再不，就成了如韩愈所说的“襟裾牛马”。

这样的教育，确确实实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有许多学者、教育家在研究探讨教育改革，但改来改去还没有把人文文化的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去考虑，这就是教育改革裹足不前的根本性原因。

其实，我们现在的教育，所缺的就是人文文化的教育，就如一百年前缺的是科技文化教育一样。现在，只要把人文文化教育补进去就是了。传统文化就是十全大补丸，有补中益气之效，有起死回生之能。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长达九年的时间，在这九年里，每天只要给孩子们 30 分钟读经的时间就够了。只要能坚持下去，每一个孩子小学毕业就可以把《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老子》、《庄子》、《孟子》、《周易》、《诗经》等人文文化经典全部收拾掉。果真能做到那个程度，不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乡村的孩子，即使只读过小学，也都打下了良好的人文基础。

每天 30 分钟时间，就解决了中国教育的一个大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我把这个方法叫做：中国教育改革软着陆。我认为这个软着陆的意义，不亚于经济软着陆的意义。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周易》上说：“蒙以养正”，“养正则吉”，“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与万民”。几千年来，世事不管怎么变幻，朝代不管怎么更迭，可中国的当政者从未敢离开过养正、养贤的教育。从而，造就了一批批正气凛然的良将能臣，造就了“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国）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中国人。可是，民国初年国民政府把这种教育废止了，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这就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人材匮乏，民风不正的局面。如果经典进了学生的课堂，学校教育马上就会改观。与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是构建和谐社会，造就栋梁之才，复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不如此，圣人复出，也不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我从 2001 年开始进行经典教育的实践，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一开始有些人是难以接受的，因为经典文化毕竟离开学校教育一百多年了，许多人还被笼罩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烟尘中，被笼罩在“破四旧”的历史迷雾里，更多的人则陷在“应试教育”的泥坑里不可自拔。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在实践的过程中，不仅学生受益，家长受益，老师也会受益。

可喜的是，党中央很重视民族文化的弘扬，民族精神的培育。可喜的是，有很多人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正在做着大量的工作。目前已有许多省、市的学校，把经典文化的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之中，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中国政府，又在世界各国建立了几百所孔子学院，这是中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这件事告诉人们，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在国内弘扬，而且要弘扬

到全世界。2005 年，联合国第一次用中国人的名字，设了一个最高级别的文化奖项——孔子文化奖。希望市委能率领榆林人把孔子文化奖拿下。果能把孔子文化奖拿下，就是榆林人民之幸、国家之幸。我说了这么多，一定有许多不妥之处，请多加批评。

韩海燕

2006 年 5 月 18 日

用事实说话

郭齐勇先生建议《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进入中学生的课堂，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四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把《四书》比作中国人的母乳文化，凡对中国文化有至深了解的人，都会赞成这样做的。

许多中国人已在这样做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四书》不仅应该进入中学生的课堂，而且，首先应该进入幼儿园、小学生的课堂，只《四书》进入还不够，《诗经》、《易经》、《礼记》（选）、《老子》也应该进入。

我上小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不仅我没有赶上读《四书》，就是我的父辈也没有赶上，读《四书》早在民国初年就被废除了。《四书》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教材，世代相传，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才逐渐形成，那里边有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啊！可是，说废除就废除了。一些没有文化内涵的东西随之充塞了中小学生的课本。比如我儿时读的“羊，大羊大，小羊小”，

比如我的父辈儿时读的“人有足,又有手,马有足,没有手”等等。这种肤浅的教材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能否认,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一直在变,但变来变去,文化内涵没有多大增加。没有文化内涵的教材,怎么可能教出来有文化的学生呢?

肤浅的教材不仅荒疏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青春年华,也荒疏了一茬又一茬的青年教师。一个小学教师即使十分努力地教上一辈子小学语文,也绝不会登上大学的讲坛。“教学相长”似乎和现代的教师没有了缘分,反倒令他们越教越没有了文化。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所教的教材,不具备那样的品格。

这就是中国学生素质越来越低下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教育质量越来越差的根本所在。我从我自己身上,从我的儿女身上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我的孙子、外孙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再也坐视不管了,我绝不能让我的孙子辈也成了文化的侏儒。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教育虽然还是老样子,可是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已经不是“禁区”了,我可以放心地给他们教了。

于是,我办起了义塾。寒来暑往,转眼就过去了六七个年头。在这些年里,孩子们利用双休日,寒暑假熟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等,还熟读了部分《诗经》、《易经》。我不敢说他们以后会怎么样,可至少他们比我辈要强。我有蔡元培先生编辑的一本《小学作文文库》,里边有一些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我请一些大学生读,他们读不下去,可我的孙子,还只上小学,就可以读懂。

古人的教学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古人编的启蒙教材更值得我们珍视,有一首诗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启蒙教育:

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

其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百家姓》、《千字文》、《神童》、《鉴略》等就是代代相传的启蒙教材。不仅在私塾里教,就是乡村里的冬书房也教这些教材。教的方法,只求熟背,不求甚解,就像唱一样,诵读久了就会烂熟于心。肉烂自香,书烂自通。这是成就人生的最好的教学方法。幼儿园、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最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年龄段让他们记熟最有用、可以陪伴他一生的好书,这是中国古人创造的最值得后人继承的东西。有人说人在十三岁之前记忆最好,我发现,十二三岁孩子的记忆力没有十来岁的好,十来岁的没有八九岁的好,八九岁的没有六七岁

的好。因此,让孩子们上了中学读《四书》,已经有点晚了。幼儿园读,小学读,上了中学继续读,才是最好的选择。

儿童启蒙教育,重在养正、养志上,立德、建业上。国民的教育贵在维风俗,正人心上。如果能让《四书》进入幼儿园、小学、中学生的课堂,就意味着这种文化就进入了整个社会。如能那样,中国的教育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光明日报》·国学版 2008 年 7 月 7 日)

秦岭岂可小泰山

“登秦岭而可小泰山”是国学大师文怀沙老先生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在《华商报》上发表的高论。报载,文老先生“激情满怀,开怀畅谈”,说,他就是喜欢美人,在恋爱问题上“一直朝秦暮楚”。文老先生暮而不垂,老当益壮,万中难选其一。然而“朝秦暮楚”则并没有什么可自豪的,因为“朝三暮四”者也大有人在。孔子早在几千年前就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文老先生 95 岁高龄尚能“一瓢一瓢饮”,真可称得上是一个“色圣”了。

然而“小泰山”,笔者实在不敢恭维。很难让人相信,一个号称国学大师、楚辞泰斗,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各所大学任教的一个著名学者,竟然没有认认真真读过《论语》,没有认认真真读过《老子》,我说此话,是有根据的。请看文老先生所说的话:“而我要说的是,登秦岭而小泰山,因为孔子的后台,正是周公,他的许多东西都是从周公那里学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哪,那是何等气派。道家始祖老子也曾说过:‘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因为在梦中周公要给他上课呀!几天不梦见周公他就慌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此话是孔子说的,(见《论语》述而第七)并非老子说的。老子给这个世界上只留下五千言,在他的五千言里,从未提到过周公,至于,梦见周公的事,到周公那里上课的事更是无稽之谈。文老先生怎么就把老子拉到周公门下呢?

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周公圣人也,孔子亦圣人也,此心同,此理亦同,怎么可以,以此小彼,以彼小此呢?倒是元朝铁木耳封孔子的“制诰”里说了一段公道话:“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泰山不可小,孔子不可小。子贡说的好:“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文老先生把孔子的帽子戴在老子的头上，也许是一时之口误，老人家毕竟老了，说错了话，是可以原谅的。不可原谅的是报社编辑，编辑怎么可以跟上文老先生胡说呢？但是，报社编辑我们又不得不原谅，因为中国的经典文化已经失落多年了，使一些所谓的文人，一遇上“之乎也者矣已哉”，就昏了头。由此看来，让孩子们从小读经是多么的必要，多么的紧迫啊！

秦也有材勿言惟楚

2009年5月间我收到冯燊均先生的一封邀请函，邀我于7月25日到桂林市参加“第二届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研讨会”，邀请函说“素仰先生在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敬请先生莅临会议，就中华义理（包括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生存智慧、民族精神）的研究、教育、推广、践行发表高见……”

这封邀请函令我诚恐诚惶，因为我早就知道冯先生是香港一个十分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为了祖国的富强，以一颗赤子之心，多次不遗余力资助内地贫困地区兴办教育、医疗事业，在湖北、湖南、甘肃、江西、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地投资兴建了二十余所学校和医院。近年又投巨资支持香港浸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在珠海创建联合国际学院。由于以上种种善举，于2002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中华儿童慈善家”的殊荣。2008年冯先生又担起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将平生辛劳所得捐出，成立“国学基金会”并出任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委员会主席之职。这么个人的邀请我能不去吗？但我自觉才疏学浅，加之又忙于筹建榆林市孔子文化研究会，根本抽不出时间考虑出席桂林会议的事。7月14日，榆林市孔子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这才开始准备论文，准备发言讲稿，但这种事是急不得的，越急越没有了头绪，后来只得在过去写的文章里选了一篇直奔桂林。

我见到了冯先生，长我八岁，是一位儒雅的老者，很谦和，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一位很有钱的阔佬，而是一个十分亲切的长兄。

会议安排得十分紧，有27个人发言，有的偏重于理论的研究，有的偏重于实践的探讨，个个十分精彩。26日下午3时，该我发言了，可我上台前几分钟还不知道讲什么，和我同行的韩教授看我有点紧张，就说：“你怎么做的就怎么说。”只得这样了，面对来自港、澳、台、大陆那么多学者、教授、专家，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说自己是怎么做的。在一片掌声中我走上了台，在那一刹那，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开口。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吃中饭时，我同一个来自山东学者的对话。他问我：“你这么大的年纪，这么远的路程，又是这么热的天，来参加这个会，一定会有什么背景？”我说：“我想凡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人人都有自己的背景，我也有，我们县有一个村子名叫韩弘道，那就是我家的老先人的名字，以人名命地名是当时的习俗，孔子说‘人能弘道’，葭州韩姓，虽没有名闻重位之人，然世世不改书香门户，清代知州曾赠匾韩家，‘盛世醇儒’，在县城通秦门外，门生们曾为我家老先人立过‘德教碑’……”

好，就从背景说起，真没料到，我的发言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冯先生握着我的手说：“你的讲演太精彩了，你做的很好，感谢你。”但我十分清楚自己是空虚的，不仅如此，我还强烈地感觉到我们榆林和桂林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差距。榆林市委提出“书香榆林”是一个多么合乎时宜的号召！但“书香榆林”如何做？还有待许多人在实践中探讨和总结。我以为，得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从诵读经典入手是最佳选择。

湖南岳麓书院门上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但我想，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天才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才是后天造就，是教育的结果。江南才子多，是江南重视经典教育的结果，现在桂林人是研究如何更好、更快地让桂林人接受经典教育，而我们榆林许多人还停留在经典能不能读的争论之中。这原本是一个认识的差距，但认识的差距就导致了文化的差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差距会越来越大，“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状况恐怕永远不可改变。

桂林会后，我感到肩上担子更加沉重，回到西安，我把桂林会议的情况向陕西省孔子学会刘学智会长做了汇报，刘会长说：你们看到了差距，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我们陕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努力赶上他们，一定能赶上他们。接着我们就陕西如何开展经典教育的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离开西安，我充满了信心，我们榆林人不比桂林人差，榆林也有有钱的人，可缺的是冯先生那种奉献精神，缺的是如冯先生那种卓有远见。但我相信，在榆林的富人中，也一定会出现如冯先生那样的人。文化建设是千千万万人的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去做，一定会做好，一定能让榆林人才济济，到那时，也许在某个地方会写上“秦也有材，勿言惟楚”的对联。（《榆林日报》文化陕北 2009 年 8 月 5 日）

一枝红杏出墙来

退休老干部屈恩思从 2008 年暑假开始组织村里的孩子们诵读古文经典，开学之后，任锦廷校长觉得很好，便把这种教育列入校本课，思想品德课。这个做法也得到村负责人屈正平的支持。每逢双休日，在屈家庄村的小学校里，便可以听到孩子们琅琅的书声。孩子们在文化的浸润下慢慢起着变化，于是家长也读，读着读着，整个村子也在起着变化。于是放了寒假继续读，直读到腊月尽，过了年，正月初二就又开始读。这是当今农村出现的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屈恩思邀我到他们村讲《论语》。说实话，我讲不了，但我不能拒绝。因为这样的邀请，我相信，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农村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心连心艺术团”可以深入到偏僻的山寨，让农民兄弟亲睹明星大腕的风采，可当今的国学大师们却不可能到黄土高原上的乡村来讲国学。于是，这个历史性的光荣任务就落在了像我这样的半桶子文化人的肩上了。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号召我们“大力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屈家庄现象就是对胡总书记号召的回应。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回应既不是来自行政的操作，也不是来自体制内的运筹，而是来自民众的一种自发。这种自发，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屈恩思对我说，

他们屈姓，在佳县是个望族，历史上曾出过不少文化名人，如果现在不给娃娃教古文经典，就接不上茬了。他的话令我很感动。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如都能像屈恩思那样有一份担当，复兴中国文化就会指日可待。为了备好这一课，我找了很多资料，在韩垠撰写的《葭州人物志》里果然看到几个了不起的屈氏人物：明代的屈惟亨，学问好，人品好，人称“长者”，与誉满京畿、书写“五凤楼”的柴牛山齐名。清代的屈而超有“明经济世之才”，被后人所追慕。屈而超之孙屈璋更是奇人，“十三岁以冠军入郡庠，好读奇书，网罗百家，人称弘博。”著有诗集，脍炙人口。韩垠说，屈璋是他非常敬畏的同学，“自幼无书不省览，酷嗜诗古文词，不假师傅，戛戛独造，实堪自成一家”，读他的诗“觉得语能惊人，字可泣鬼”，“其中一派奇气喷薄而起，叠嶂层峦，应接不暇，上可以干云汉而褰日星，下可以走山岳而泻江海”，可惜这些珍品早已失传，我辈无缘拜读。

明清两代屈家人物我没有见过，可近人屈志超我是见过的。屈志超自幼家寒，酷爱读书，专攻书法，成为一代书法大家，据传于佑任看到他的字，赞不绝口，说：“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现在还健在的尚爱仁先生，儿时在农村的冬书房读《论语》，使他受益终生，曾当过榆林市文化局局长，省歌舞剧院院长之职。屈家庄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有文化的村子。

正月初九，我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来到屈家庄。还未进村就听到了锣鼓声，不用问，这一定是闹起了秧歌。屈家庄的秧歌很有名气，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每年都要在县城举行秧歌大赛，屈家庄人由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秧歌常常不同凡响，不仅扭的好，尤其唱的好。

屈恩思已在村口等我，一见面我就说咱先讲课，可屈恩思说，听课的学生大部分在秧歌队里，讲课时间安排在第二天早上八点。于是我们就先看秧歌。屈恩思领着我下了一道坡，过了一道沟，气喘吁吁爬上了阳畔，只见秧歌队已进了一个农家大院。院主名叫屈恩海，大概是看见了我这么个生人，便乐呵呵地挤出人群硬拉着我到他家做客，我说不忙，不忙，先看秧歌。我好多年没有看农村闹秧歌了，觉得很有意思，窑码头土神之位处的桌子上放着红枣、花生、瓜子、香烟、糖果等，还有一碟凉菜。四只酒杯，斟满了酒，谁想喝，端起杯子一口灌了，主人立即又斟满。人人都喜眉乐笑，都被融化在十分祥和的气氛之中。院子比较大，大家扭的非常认真、投入、自然，扭了一会，锣鼓一停，伞头开口唱了：

开言我把恩海夸，

移民回来闹了个发。

父慈子孝齐奋斗，

致富路上第一家。

听了这首歌，使我想起我曾在乌镇听到的另一首歌：

走了一家又一家，

一走走在张正家。

张家墙上晾些豆腐渣，

来人待客乍就那。

两首秧歌，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那个饥饿的年月，我是经历过的，想起那个时代，就令人心怵。就在这时，伞头突然将伞朝我拜了三拜，即口唱道：

看见老韩我喜在心，

秧歌给你贺新春。

你讲经说法到乡下，

“五经四书”扎新根。

伞头名叫高录兴，已七十三岁，脑子很好使，即口为我唱了几首秧歌，令我非常感动，可惜我未能记下来，我真佩服这些农民兄弟真诚的情感和横溢的才华。

秧歌还没有离去，屈恩海硬留我们在他家做客。原来屈恩海有着不平凡的人生遭遇，1975年的一天夜里，忍受不了饥饿，举家逃出屈家庄，到山西的寿阳落了户，在那里整整苦遛了二十年，于1995年才返回故土。全家十一口人，虽然只有三个人的地，但两个儿子在榆林做了生意，几年功夫就发家致富了。因此伞头在秧歌里唱道：“移民回来闹了个发”。

谈话间，又是红枣，又是烧酒，又是香烟，摆下许多，他的老伴、儿子、儿媳、孙子挤了一窑，大家先回顾了那个可怕的饥饿岁月，然后畅谈着这些年可喜的变化，真是悲喜交加啊！就在这时，一对五岁双胞胎孙女从外面跑了进来，扑在妈妈的怀里，妈妈立即让孩子背《三字经》，开始两个小姑娘还有点害羞，妈妈说，不要怕，咱们一起背，于是一家人就和孩子一起背起了《三字经》。此时，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娃娃进来，说她的娃娃三岁，也能背《三字经》。我问她是谁教的，她说她教的。她说她虽然没有多念书，可汉语拼音她会。看到这种情景我高兴极了，因为在屈家庄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希望。

有人说“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其实在近一百年的历史中并没有看到任何复兴的迹象。既然是复兴，必然是因为历史上兴过什么东西，后来衰落了，后人才去复兴。然而“五·四”给人的印象是一场“全盘西化”的启蒙运动，在“五·四”先驱者看来，中国传统不仅不可复兴，而且统统得打倒。但是传统并不是一打就能倒的，长久以来，“西化”还是“化西”在理论上一直争论不休，虽然“西化”的舆论占着主导地位，可是，不管是主张美国式的“西化”，还是主

张苏联式的“西化”，到头来，都被中国化了，搞资本主义也是中国化了的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也是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衰落到极处，就会回归，每一次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现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复兴运动正在形成。这一场文化的复兴，之所以能兴起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它奠了基。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这一次中国文化的复兴。不管“五·四”先驱者的初衷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则表现为一场空前的识字运动。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汉字不废，中国传统文化就废不了。在“五·四”之前，中国传统文化是士大夫的专利，那时在农村要找一个识字的农民很难，可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现在，在农村中要找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反倒是很难的，这就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贡献。尤其 1958 年，汉语拼音的普及和推广，更为这次文化的复兴打下了极其广厚的群众基础。屈家庄的村民、学生，就连三岁小孩都可以背几段《三字经》，小学生和普通的农民就像每天吃小米吃白菜那样享受古文经典，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

不要以为孔子和农民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的东西都是从百姓心灵里来的。老百姓说：“袜有袜样子，鞋有鞋样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老百姓说“宁肯喝一碗展眉汤，不吃一碗皱眉饭”，孔子说“色难”。孔子的东西就是老百姓的东西，只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罢了。

历史走到今天，是关怀农村文化，农民精神家园建设的时候了。孔子“庶而后富之，富而后教之”，是孔子那个时代的急需，亦是我们今天的急需。

一枝报春花已在陕西榆林佳县的一个山村里绽放，它是二十一世纪东方文化伟大复兴的信号。我按捺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也编了一个秧歌，：

红杏一枝出墙来，
千桃万李竞相开。
待到秋实累累日，
神州处处是楚才

（《榆林日报》文化陕北 2009 年 2 月 15 日）

也说读书

古人说：“至乐无如读书”，但我以为能在书里读出乐的人是少数，能读出至乐的人更少。正如程子所说的那样，同是一本《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何以这样呢？人和人的心理结构不同所致也。程子是一代鸿儒，他说他“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程子尚且如此，何况别的人呢？读书必须把心收回来，潜心去读，才能玩出其味来，一旦玩出其味，也许就是什么快乐都比不上的快乐。信缰野马，浮躁如火，是万万读不出来乐的。

我提倡读古书，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繁荣今天，只有让青少年弄清古书里的要旨，才能通达当世之急务。现在的青少年，就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没有一点文化底蕴，要他们有担当，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需要五千年深厚的文化积淀来承载，就靠白话文那么一点点积淀，要承载一艘巨轮也是不可能的。时代要求我们现在的青少年必须有比前人更广阔的胸怀，不仅能容得下今，也要容得下古，不仅能容得下东方文化，也能容得下西方文化。能容乃大，海纳百川，才能构建起无愧于时代的大文化。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凡书都是人写出来的，不可迷信，我们应该做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敢于突破，但要想突破前人，必须清楚前人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就一般来说，读科技书，越前沿越好，现代科技瞬息万变，不掌握最前沿的，就会落后。读人文文化则宜溯根探源。读儒家，先读孔孟。读道家，先读老庄。源头上的东西最纯，根上的东西最真。比如榆溪河，到了源头，掬手可饮，到了下游，就成了一条污水。

现在，科技文化成了主流，这是对的，搞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重视科技文化。但对于人文也不可忽视。仁、义、礼、智四德，依然是人类道德中最高境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人都有此四端，能扩而充之，就是人，就足以保四海，不能就不是人，不足以事父母。这是当代青少年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好，就可以有担当，担当家事、国事、天下事，解决的不好，就会反成为社会的负担，家庭的负担。

打造书香榆林，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建设工程。心灵建设来不的一丝一毫的虚假，任何虚假都会对心灵造成新的伤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既是学习的方法，也是学习的过程，五者，废其一，非学也。学、问、思、辨的过程就是知的过程，知之深者，行之切。笃行才是根本。

再说读书

苏东坡说过一句令我十分震撼的话：“书到今生读已迟”。书到今生读已经迟了，可我还不知道好好读书，岂不太糊涂了吗？我曾写过一首诗自勉：“书到今生读已迟，今生何不倍惜时？纵然到老难了道，别让人笑我无知”。这自然是很低的境界了。

孔子的孙子子思写过一本叫《中庸》的书，我已不记是哪一个古人说的，他说：读《中庸》，必须以性为宗，以诚为要，以知行合一为功夫，以天人同归为究竟，才有可能读懂。

程子也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读《中庸》如能读到“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的水平，才称得上读懂了那本书。由此看来要读懂一本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键在于“知行合一”。“读书穷理，当体之与身，不可只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朱子语类》）。清代颜元说：“心中醒，口在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陆放翁给他的儿子写过一首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都说的是行。“知行合一”是一种功夫，必须拿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积功累德，才能达到“天人同归”的境界。“天人同归”是什么境界？用佛家的话说，就是成佛。用道家的话说，就是成道。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成圣。

那样的境界，人人都可以达到，但很少有人能达到。

曾国藩先生对于读书有独到的体验，他说读书如炖肉，先用紧火，后用慢火。所谓紧火就是博览经、史、子、集。所谓慢火就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择其一经、一史、一子、一集，数年如一日，精研细磨。肉烂自香，书烂自通，只需弄通一种，一通百通。在通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所创新。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认为是一个好的方法。如能如此读书，必成大器。

此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但很少有人能做到。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凡称得上“经书”的书，都是经过数千年文化长河的淘汰而淘汰不掉的东西。之所以淘汰不掉，是因为它们是些永远有用的东西。是超越时空的东西。读经可以启智，可以明德，可以强志，可以远怀，可以博厚，可以高明，可以穷则独善其身，可以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被中国历史上无数优秀读书人所证明过了的，因此被中国人一代一代传承不已。博学以读书为先，入德自通经而始，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这个基础打不好，要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读书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读书不能只限在读经典上，古今中外的一些好的杂书都可以读，故事传说，野史琐记，考辨评论，剧本曲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读之，足可以振奋人心，陶冶情操，开阔视野，启迪智慧。但杂书里不乏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尤其现代小说。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些作者，丧尽天良，费尽心机，写出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并且充塞了书市。面对如此的文化环境，现代人真需要“非礼勿视”的定力，方能抵挡得住诱惑。有良知的作家，著书讲“文以载道”，无良知的作家只认钱。因此，买书要格外的小心，千万别把“淫书”买回家。古人有相宅之说。“案头无淫书，架上无整齐书”就是吉宅。案头有淫书，架上有整齐书，就是凶宅。有些人喜读淫书，还要买一摞一摞的好书放在书架上，假装斯文。其实那些放在书架上的好书，他从来都不看一本。因此，永远整整齐齐地放着，他们过着极度奢糜的物质生活，同时过着极其贫乏的精神生活。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无论贫富，读好书比什么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用三十年搞政权建设，用三十年搞经济建设，用三十年搞文化建设。前两个三十年已经过去了，现在要开始文化建设的三十年了。我以为用三十年搞文化建设远远不够，也许得六十年、一百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大大伤了元气，恢复元气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尽管任重而道远，但我们毕竟开始了文化建设。好读书，读好书，存好心，做好事。文化建设其实没有别的，如此而已。

论“书香家庭”建设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课题。在解决不同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新不会常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才是孔子所倡导的新。因此，孔子被后人称之为“时圣”。

“书香家庭”，在古代叫“书香门第”。“书香家庭”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家庭所面临的一个时代课题。这个课题是由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物欲的膨胀，道德的衰落而引发的。自古“共难易、共利难”。同事、朋友之间如此，父子、兄弟、夫妇之间也如此。在困难的岁月，大家同舟共济，一旦富有就有了大麻烦。有许多有钱有势的家庭，或吸毒、赌博、包二奶，或因财产之争，父子相仇、夫妇反目、兄弟互残。过去还有“富不过三代”之说，现在两代都难以维系，往往当代就垮掉。

何以成了这个样子？原因就是不读书。这就怪了，现在办了多少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谁没有读过书？再说，书店到处有，报纸杂志天天出，怎么能说不读书呢？我所说的书不是学校里教的那种书，不是乱七八糟的杂书，更不是“黄书”，而是经几千年而不衰的经书。那些书是教人如何做人的书。中国之所以被世人称之为文明古国，就是读那些书读出来的。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备受列强的欺侮，中国必须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之路，因此把以做人文化为主的教学转向了以科技为主的教学。这个教学很成功，到现在，列强们终于不敢欺侮中国了。但是不该把教人做人的文化全部丢掉。其实，作为一个人，做人的学问才是最重要的学问。活一回人，不知道如何做人，就把亏吃大了。受害的

首先是自己，然后祸及家人，危害社会。因此古人总结出了“积金积玉不如读书教子，修屋修楼莫若明德亲民”、“贫而好学还有盼，富不读书绝无期”的至理名言。这些话不是古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来的。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正家。孔子说家政也是政。《易经》“家人”卦上也说“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国以家为基，“国也者积民而成”。用现代话说家是国家的细胞。人是家的分子。家是很脆弱的，贫富一样。一个家只要有一个不好的分子，这个家就会被毁掉，一个家出一个罪犯，一个吸毒者，一个赌徒，一个不孝之子，这个家就遭了殃。一样的道理，一个个家庭都很正派，国家岂不是安定和谐了吗？因此“书香家庭”不是小事，而是件既关系每一个家庭兴旺与否的大事，也关系国家太平安定与否的大事。

现在也有所谓的家庭教育，其实那种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的继续和重复。真正的家庭教育是养成教育，道德教育，高境界、大胸怀、有担当的教育。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子宜自胎教始”。胎教唯有母亲可以做，别的人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三岁养成老来性”，而三岁之前的教育也只有母亲充当，别的人也很难代替。鲁迅先生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也就是说，母亲的情形，便是儿女的情形。

母亲决定儿女的命运，而不是命运决定人的命运。母亲太重要了，母亲的素质太重要了，母亲的责任太重了。然而我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道理呢？我们这几代做父母的人从小大都没有受过胎教，出生之后又大都没有如孟母那样的母亲调教，到了上学的年龄，又接受的是科技方面的教育，也就是说压根没有接受如何做人的教育。到了做父母的时候，自然担当不起一个父母应当担负的责任。这几乎成了一种不良的循环。这种循环就为中国的教育种下了不良的种子。为什么上了大学还要强调素质教育？原因就在这里，“始不盛、终必衰”，如此而已。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建设“书香家庭”。如何建设？唯有读书。读什么书？在还没有找到比《四书五经》更好的书之前，读《四书五经》依然是最好的选择。就目前为止，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要找到比《四书五经》更完整、更系统、更科学的教人做人的学问都很难。

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孔子热、中国文化热，这是“物极必反”的必然。这个热首先从个别家庭开始，从此中国有了重视胎教的人家，产出了不少“读经宝宝”，儿童读经也相继在各地开始。那么小的孩子就把《四书五经》背的烂熟，有些家

长受其影响，也读，就变成了家庭读经热。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有别于过去“书香门第”的“书香家庭”。这些家庭又在影响着周围的家庭。这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这些年来读过经的孩子，到他们做父母的时候就知道如何胎教，如何从小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中国文化就会一代一代自然传承下去。这种传承是最真诚的传承，没有任何功利的传承。大家不必担心会复古，复古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发生，即使被史学界认为是复古的事，也不会和“古”一模一样。“信而好古”是孔子的一面，孔子还有一面就是“切问而近思”。“切问而近思”就是在创新。儒学也好，道学也好，佛学也好，西学也好，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有好的东西。凡好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世界上好的东西集于自己一身，结合时代所出现的新课题，找到一种解决的办法。

“书香榆林”一定是一个个“书香家庭”所组成的。从我做起，从自己家里做起，这就对了。

“书香家庭”是个新的课题，有待千千万万个家庭去实践、去解决。

（《榆林日报》星期天关注榆林 2010 年 9 月 26 日）

再论“书香家庭”建设

“书香家庭”建设是一个时代新课题，我并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考，发表点议论，只是想抛砖引玉罢了。人身上哪个部位有了毛病，哪个部位才会引起人的关注。社会亦然，强调什么就说明什么有了问题。“书香家庭”就是用读书来解决家庭出现的问题。

苏东坡说“书到今生读已迟”，苏东坡信“三世因果”，因此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认真读书，今生读也不迟，就是到老读也不为迟。我有一个朋友叫乔存利，退休之后，近几年才开始认真读书，人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们每一次会面，都令我对他“刮目相看”，并使我有自叹不如之感。过去的乔存利不善言谈，现在满腹经纶，滔滔不绝，真令人羡慕。

榆林世纪广场“暑期晨读”从 08 年开始，有一个学员名叫刘彩霞，她原是榆林农校教化学的教师，现已五十多岁，每天要做 8 个人的饭，还要带两个孙子，够忙的了。可她每天早上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到广场城墙下读书。到现在已熟读了《四书》、《老子》、《易

经》等书，也是满腹经纶，气度不凡。她不光自己读，还给俩个孙子教，如能持之以恒，有望成为当代的“书香家庭”。

由此可知，不管哪个年龄段的人，要想成为一个读书人，要想把自己的家庭建设成为一个“书香家庭”，并不是一件难事。范仲淹是我们一个熟知的历史人物，“出将入相”，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妇孺皆知。就这么个人，只下了五年的功夫就读通了六经要旨。据《宋名人言行》记载，范两岁就死了父亲，因无依靠，母亲不得不改嫁朱姓，范仲淹也姓了朱。稍大知其身世，哭别母亲，投靠一家亲戚读了书。五年中从未解衣睡过，读书读到深夜，瞌睡了，就用凉水沃面。常常忘了吃饭，“日昃而食”。就这样苦读了五年就弄通了六经要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如果范仲淹没有读通六经要旨，绝然不会“慨然有志于天下”。由此可知，读书确能改变一个人。张横渠年轻时找范仲淹投军，范仲淹送他一本《大学》，让他把它读通。张横渠听了范仲淹的话，弄通了儒家经典，成就了一代鸿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张横渠的名言，这句名言，激励了多少中国读书人啊！

读通一部书是成就人生的一个极好办法，可惜我们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办法，不用这个办法。清代有个叫梁章钜的人说：“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一部书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记俱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书就是根，可以触悟他书”。梁章钜为了让人明白他说的道理，以领兵交友作比喻，他说领兵十万，必须有几百亲兵死士；广交朋友，必须有一二义气肝胆。读书万卷，必须烂熟一部。不然，打起仗便不得一兵之力，遇危难事，便不得一友之助。书到用时，便没有一卷可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一定要选好书，什么是好书呢？有普世价值，有文化底蕴，经世代而不衰的书。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烂书太多，连写书的人都没有根，读他的书自然读不出根来。

一部好书，就是一个系统。读通一个系统，方能触类旁通别的系统。读书最怕零散，现代读书人为什么难出大师？原因就在没有弄通一部书，没有弄通一个系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虽然读了那么多语文书，都是点零散的东西，不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中国文化有儒、释、道三个大系统，凡中国文化的大师，都是三教融汇贯通的人。东方文化是一个很大的系统，西方文化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凡世界级的大师都是学贯中西的人。而我们有些学人，学佛的说佛高明，学道的说道高超，学儒的说儒有用。互不服气，互相排斥，以那么小的心眼，怎么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大师呢？至于世界级的大师更别想了。长久以来，有一些中国人以为把中国文化的根彻底拨掉，就可以把西方文化之树栽活在东土上。出心也许是好的，但这种出心却推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二十一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交流和融合必然会引发巨大的动荡、剧烈的疼痛。“寒极不生寒而生暑”。动荡和巨痛之后，我们将迎来的是新的曙光。中国“书香家庭”建设就是在这么个世界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如果用过去那种或者“全盘西化”，或者“文化复古”的心态去做，“书香家庭”建设是搞不好的。交流和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先弄通自己，弄通自己得从弄通一部书入手，弄通一部书就有了文根。一个家里只要一个人有了文根，他就会影响别的家人，“书香家庭”也就有了希望。

谈谈孝

孝是人人所必需的，孝也是人人可以做到的，然而不孝的事情屡见不鲜，又是人人非常忧虑的。曾子把孝分了三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能养是个底线，底线以下就是不孝。不孝有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这是孟子所说的世俗五不孝。两千多年过去了，此五不孝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可以找到，不过还可以加上几条，诸如腐败堕落，偷盗抢劫，吸毒赌博，不务正业等等。中国文化九流十家，它们中间虽然有许多不同，甚至分歧，但在讲孝道上是一致的。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道以孝为成真之基。“五四”先驱对孝进行过激烈的攻击，但他们攻击的是假孝。鲁迅先生说：“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是在一意提倡虚伪的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现在的提倡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更加缺少。但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在“一意提倡虚伪的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而是一度时期对孝的彻底否定，至今没有真正改正。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基，这个根基只能千方百计加强稳固，万万不可动摇削弱。然而，就在“十年浩劫”时把这个根基动摇了，轻而易举地动摇了。只举一例：就在破四旧最激烈之时，佳县山城里一家人家殁了老娘，出殡时子女悲痛欲绝，街坊邻里回忆起老人生前许多好处，不免也表示一点同情，掉出眼泪来。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万万没有想到招致了一场现场批斗。批斗的理由就是子女为死者戴了孝。自此，谁家死了老人都不敢戴孝了。更不敢摆灯、送怵、迎帐、立碑、悼念。中国有“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传统，打那以后，把什么都掀倒了。生，不事之以礼，无人笑话，死，不葬之以礼，不祭之以礼，也无人说三道四。甚至忤逆不孝也受不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久而久之，人们便视不孝为正常。这是一种价值的颠倒，这种颠倒，就为中国家庭，为中国社会种下了不和睦，不安定的祸根。

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既不能慎终，又不能追远，民德自然会趋薄。民德归厚，国之幸，民之福，民德趋薄，国之灾，民之祸。道、德、仁、义是维系社会的四大法宝。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当到单用礼维系社会的时候，道、德、仁、义已经丧失，道、德、仁、义一旦丧失，人就没了忠信。没了忠信就不得不加强法。当单用法维系社会的时候，犯法的人就更多，而且犯法的人往往是些知法的人。因此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觉得道德的问题已经成了家庭、社会十分严重的问题。孝子缺少，令人忧虑，逆子增多，更令人忧虑。过去弑父母的事多发生在宫廷、贵族，现在已向平民家庭发展。其原因又是什么？有人迁怒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人怪罪于传统文化的失落。都有些道理，但坐在那抱怨是没有用的。要紧的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行动起来，把我们失去的道、德、仁、义、礼、智、忠、信、廉、和找回来。从那儿入手，从孝的教育入手。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人说：“真道德从五伦做起，大文章自六经得来。”道德仁义忠信的根本是孝，“孝弟也者人之本与。”抓住了这个根本，德性才有可能扩而充之，大爱天下。

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的人，让他爱天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抓这个根本必须从自己做起，而不是说教，教别人。年轻的爸爸妈妈，你们若想享受天伦之乐，你若希望你的儿女孝你们，若想让你的儿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你们就去诚心诚意地孝敬你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让他们得到孝敬。只有那样，才能把孝的根植在孩子的心灵里。孝与不孝，其实大都是父母直接教出来的。俗话说：“捉猪看猪婆”，父母孝，一般来说，子女也走不了大样。父母不孝，亦然。因此，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比什么都重要。一定要真做，世上存在难辨认的假东西，可不存在难辨认的假孝敬。假孝敬连呆痴老人都能辨别，因此，至今流传着一句十分经典的俗语：“宁喝一碗展眉汤，不吃一碗皱眉饭。”

坟会

我韩姓在古葭州也算个望族，代有闻人。常听老年人说古葭州居住的人少，“四大家，八小家，七十二家毛毛家”。总共只有八十多家人家。四大家中就有我们韩家。古人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我韩家就是依照这个古训做的，虽没有名闻重位之人，但世世不改书香门户，代代祭祖十分的虔诚。可是后来，由于大势所趋，经书不读了，远祖也不祭了，祖宗的事迹也慢慢被后人遗忘了，同姓同宗的人也不相识不相亲了。

我们韩家有几处老坟，韩宏道老坟、韩家沟老坟、小榆圪老坟、官道原子老坟、吕家坪老坟，从前年年有坟会，后来就很少办坟会。我记得我只在吕家坪参加过一次坟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坟会，也是韩姓办的最后一次坟会。

爷爷当时是葭州县城的市长，所谓市政府就相当于现在街道办事处，文书是公派的，市长反倒是人民选举，不挣工资是业余的。爷爷一面织布，一面当市长，市政府就在我家东窑里，那时正在抗日时期，从山西前线抬来的伤兵特别多，就抬到我家院子。祖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上架织布，为了筹办那次坟会，爷爷就更忙了。夜里我在睡梦中被惊醒，原来爷爷正在砸纸钱，他用一个铁做的冲子，放在一摞纸上，狠劲地砸下去，纸上就出现了铜钱的形状。那时虽然用上了边币，但铜钱依然可以在市面流通，因此，鬼使用的钱还是铜钱的样子。在此期间，奶奶还蒸了面猪、面羊、枣卷之类的供品，爷爷见我醒了还给我讲了介子推“割股奉主”的故事。

要到吕家坪祖塋，必出西城门，一出西城门就看见了两座“德教碑”，一座是为张璣立的，一座是为韩际清立的。爷爷把这座碑看成是韩姓人的骄傲，他指着碑上的名字说，韩际清的父亲叫韩鉴，他们的坟在官道原子，那里去不了啦。就在碑前给他们烧点纸钱。爷爷十分的虔诚，行三拜九叩之礼，我跟在爷爷的背后，照爷爷的样子做。离开碑楼，爷爷就给我讲韩鉴的故事：韩鉴在雍正七年中举，因为家贫上京考过一回进士没有中，再没有去考，舌耕以度。乾隆初得授淳安县令，匹马南去，布袍纓冠至浙，下车首征衙蠹，次清案牘，有便民者，虽难必举，有防民者，虽细必止，淳安县的人民都称为慈母。但就是不善应酬，损民益上之事，有死不为。自然不被上面的贫官污吏所欢迎，恰巧有皇上特派使抵浙，是韩鉴同年友，劝韩鉴早归，说：“足下三代人以上人也，安能作三代以下吏？”于是韩鉴便辞官隐避。百姓攀辕请留，韩鉴执意不留，作诗以说明他的决心：“勉为父老留三日，莫向君王借一年”。回到家家无积产，篋无余资。狷洁之操愈老愈笃，州守重其品，举为孝廉方正。以复性至命为根蒂，淡泊宁静为功夫，设教授徒，量材造就，皆各有所成，因此门人为他立了德教碑。

爷爷为我讲故事一直讲到“滴水观鱼”处，所谓“滴水观鱼”是葭州八景之一。现在的葭芦河几乎没有水了，那时的葭芦河水很大，村民们在河床最窄处搭了两根檩子就是便桥，桥下涛声震天，水花飞溅，走到上面头昏目眩，胆小一点的人绝然不敢过桥。有些女孩闭着眼让大人背着过。我紧紧拉着爷爷的手，走到桥中吓得要命。过了河爬上一道坡，就到了吕家坪祖塋。

上坟的人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许多人平时在街上见过，可不知道是一个爷爷子孙，到了坟里才互相认识。见了我的前辈，爷爷就对我说，你要叫什么，叫什么。对方也是，如此这样，才知道我们韩家有这么多人。每到一座坟，爷爷就对我说，这是老门头第几门的，是我的多少代多少代祖宗，有墓碑的，爷爷为我念墓碑上的字，有墓表的，读读墓表，有许多我已忘记了，惟独有记忆的是韩檀。韩檀是韩际清的儿子，韩鉴的孙子，有神童之誉。每过书市，看过一本书，回到家里就能把看过的东西笔之于纸。屈璋家藏书多，韩檀常常借来读，屈璋也不以为然，整整一年下来，韩檀对人说他把屈璋架上的书全读了。屈璋冷笑，说：“老夫穷十年之力，案头书都未能读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要说读，就是数纸，也怕数不遍。”有一次致酒邀檀，酒阑故问：“《北齐书》曲宴群臣，我忘了同坐何人？你能不能回忆起来？”韩檀从容对答：“此事是载在《南齐书》，而不是《北齐书》。”随后把有谁有谁，说得一清二楚。屈璋愕然，复又问了几件事，韩檀指陈了了，没有一点疑义，叹曰：“真天才也，老夫不及岂止三十里哉！”

那一次坟会让我认识了许多韩姓人，以后见了面就倍感亲切，也让我听到了许多老祖宗的故事，使我对祖宗有了一种崇敬。

好多年没有坟会了，每到清明节只就在自己一支的坟上烧烧纸，渐渐地视同姓人和外人一样淡，祖宗的故事也没有人讲了，没人忆了。一切都淡了，忘了。可那一次坟会却牢牢记在我的心里，至今不能忘却。

追远厚德

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所谓慎终是葬父母；追远是祭祖宗。葬尽其礼，祭尽其诚。曾子还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清明节就是中国人年年要进行的一次追远。这一天国要在黄帝陵追祭一国人的始祖；族要追祭一族人的列祖，家要追祭一家人的宗亲。在追祭中祖德宗功得以张扬，嘉言懿行得以传承。不追远则德不厚，德不厚则国不和，族不亲，家不宁。人和人相处，视之如吴越，

甚而因一句闲话、一件小事，反目相仇、争斗随起。亲有难济之，族有急救之就更谈不上了。久而久之，十家九亲就变成了十家九仇。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一切正确的教育都是从孝道这个根本上生出来的，离开孝道这个根本的教育，都将是失败的教育。

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始终不敢离开这个根本性的教育，清明节追祭远祖就是充分展示孝道教育的一次活动。这种教育延续着一个伟大的民族，传承着一种伟大的文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孔子这段话，就是这种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孝道，不是孔子发明的，而是人类与生俱有的，孔子只是为我们说明了而已。孔子文化为什么能流传久远？为什么不被打倒，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其实，这也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西方文化是向外求，向上帝求，而中国文化是向内求，向祖宗求。向外求只能得到一些虚无的安慰，向内求则可以得到实在的经验。

有些西方人笑中国没有宗教、没有抽象的崇拜。有些中国人也跟着瞎嚷嚷、他们数典忘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孔子、指向孝道文化。硬说中国落后，而且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中国出了个孔子，就在中国人信仰了孔子。他们根本不懂中国文化，他们在以蠡测海，他们在坐井责天，他们无论说老子，还是说孔子，开口就错。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在那里怨天尤人，怪中国的老祖宗蠢，怪中国人蠢，说：“亲爱的同胞们，你们怎么就不去崇拜上帝呢？只有崇拜了上帝中国人才有救。”

中国人很务实，从古到今，崇拜的就是自己的祖宗。祖宗崇拜是从自性中发出的，本能的，自然的一种崇拜。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崇拜就永无休止。除过祖宗崇拜别的不论什么崇拜都是一时的崇拜。为什么世界上的几大文明相继消亡，唯独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人抓住了根本，而且把这个根本变成了一种教育，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这种传承所依赖的就是永无休止的祭祖活动。祭祖，其实是一种国史、地方史、家史教育。一个民族一旦忘了民族史，一个家族一旦忘了家史，事实上那个民族，那个家族已不复存在。因此，古人说：“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

“六经皆史”，读经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民族精神的教育，读志，读谱是最好的地方史、家史的教育。然而近一百多年以来经典教育中断了，县志没人修了，也没人读了，家谱没人续了，也没人读了。这是在中断中华五千年来的文明，长此以往，中华文明也将像

已经消亡了的那几个文明那样在世界上消亡。就现在这个世界上来说，中华文明虽然遭到了自己人的破坏，但依然是唯独至今没有消亡的一种文明。这是中国人为世界保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瑰宝。仅此，就最值得中国人在世人面前昂起头来。如果我们的文明也在世界上消亡，我们将成为世界的罪人。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家有家谱、墓有墓表。叙世系溯本源也，分支派别亲疏也，志坟墓崇祭祀也，载文艺表行述也，纪先贤又是以思齐之心，为后人示步趋也。修史者有褒有贬，修志者有褒无贬，修谱者无褒无贬。中国人就是以这样的原则，继续着中国人的文明史。这部文明史能延续至今，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幸的是中国人终于在破坏自己文明的恶梦中清醒了。中断了的黄陵祭典恢复了，中断了的孔子诞辰祭典恢复了，中断了的县志重修了，中断了的家谱重续了，打倒了的墓碑又立起来了。更让人高兴的是中断了的读经也恢复了，在大学校园，在城市公园，在乡村小学，在农家茅屋到处可以听到经典的诵读声，这是一种文化的复兴，文明的延续。追远可以厚德、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重温祖宗之德，温故可以知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德只能厚，不能薄，《易》曰：“厚德载物”。薄德不是中国人的传统，不是中国人的出路。（2010年3月31日发表于博客中国）

《燕翼堂义塾学报》发刊词

何为燕翼？善为子孙谋谓之燕翼。“燕翼贻谋，非财非物，养正则吉，家国之福。”

佳县虽然没有神府那样的煤田，定靖那样的气海，可天工在这里造化了一方奇伟的山河，巧匠在这里精雕了一座艺术的殿堂，历史在这里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宝藏。

生活在佳县的人是幸运的！

奇伟的山河，精美的艺术，深厚的文化再造着杰出的人才。人才，在这个世界上才堪称最宝贵的财富。古代，进士童宽以其黄河大峡谷养就的浩然之气，博学宏辞，殿试时令皇帝叹曰：“佳州才子压江南”。举人柴牛山应诏京都，挥毫疾书“五凤楼”，让天下书家望尘莫及。近代高景德以其儒雅的风采，高深的学问，荣任清华校长之职。张达志，阎揆要，文韬武略，驰骋疆场成为一代名将。通镇郭建都，两块银元闯天下，在民国年间成为富甲北方的商业巨子。农民歌手李有源，一歌《东方红》响彻寰宇，船工李思命一首《船夫曲》传遍天下。当今的佳县，亦是人才济济。李震、刘亚丽、薛九枝、贺鹏飞、党安荣、张小玲，勤奋学习，笔耕不辍成为文坛俊才，学界名流。尚志安、贺金龙、刘建均等，在经济改革大潮中，顶风破浪，再创伟业……

他们都是在这一块被人称作贫瘠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时代骄子，他们是这块土地的骄傲和光荣。

过去的辉煌，已成为过去，新的伟业等待着年轻人们去创造。燕翼堂义塾，合乎时代之节拍，顺乎世纪之潮流，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今天诞生了，学报亦同时创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燕翼堂义塾和《燕翼堂义塾学报》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幼儿启蒙。“问渠那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个勃勃生机的苗圃，这里有甘于奉献的义工们的辛勤浇灌，会使一株株幼苗茁壮成长。首任塾师韩海燕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我是侏儒慕鸿儒，
喜人学成胜自成。
此身愿化劝学鸟，
飞进千家万户门。

这是一种情怀，这是一种历史使命感的流露，这是一种文化责任心的表白。

《燕翼堂义塾学报》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是燕翼学子展翅的空间，也是燕翼堂和学界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

佳县文化馆曾办过一个小报《芦花》，也许许多人不知道她曾存在过，但是庞文梓、刘亚莲永远不会忘记。因为他们就是从《芦花》起步，走进了文学的殿堂。《燕翼堂义塾学报》是一个义塾的学报，她更小，可我们期待着有人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燕翼堂义塾学报》诚挚欢迎来自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支持、指导和批评。

女人不只半边天

高尔基说：“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冰心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事实上女人的作用远不止这些。《易·家人卦》曰：“女正位于内，男正位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义矣。家人有君，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家正而天下定矣。”

女主内，男主外，内为本，外为末。本固则枝繁，枝繁则叶茂，不论什么样的民族，之所以枝叶累累，皆出自女人也。

农耕时代，凡兴旺发达的大家族，无不是有一个正派的主妇操持。主妇的产生，不是排辈，而是论资。谁的资质好，品行端正，谁就被推上主妇的位置。主妇正，家道正，家道正，百业兴。国是由家组成的，因此，在古人眼里，家政也是国政。

现代的三口之家，虽然不能和古代的大家族相比，但多数家庭依然是女主内，男主外。一个男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其实是撑握在女人手里的。“天下之要，人才而已”。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首要的教育是爱的教育。世界上唯一没有污染的爱就是母爱，爱的传授是一种心领神会的传授，这种传授的最佳年龄是 0-3 岁。这个时期如果有一个胸怀博大、品德高尚、善良贤惠、意志坚强的母亲，母子日夜相伴，母亲就会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传授给她的儿女。相反，这个时期，如果有一个心胸狭小、品格低下、自私暴躁、意志脆弱的母亲，母子日夜相伴，母亲就会把这一切坏的东西传授给她的儿女。是，成亦母亲，败亦母亲。而这种教育又是一种无法选择，不可替代的教育。因此作为女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容易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都是以变坏为代价的。自己变坏，自作自受，影响了儿女，这个代价就太大了，儿女又影响儿女，子子孙孙无有穷尽，这个代价就更大。

印光大师说：“教子为治天下之根本，而教女更为切要”。世无贤女，焉有贤妻？世无贤妻，焉有贤母？世无贤母，焉有贤子贤女？伟大的母亲造就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母亲造就伟大的民族，中国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十分重视贤女的培养。

犹太人是世界上女性就业率最底的族群，然而就是这些没有职业的妇女拯救了一个民族。犹太人只占世界人口的 0.3%，可诺贝尔奖获得者却占取 25%。为什么？母教做得好。我们中国十几亿人口，差不多占世界总人口的 25%，可至今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母教做得不好。中国妇女在摆脱“三纲五常”束缚的同时，把“相夫教子”、“贤妻良母”

的美德丢掉了。这个东西一丢，孩子的养心、养性、养德、养志就成了问题，不仅很难使她们成为优秀的人才，而且很可能使她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女人不只是半边天。女人，尤其是女孩子，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使她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成为当今的贤女，因为她们是民族的希望、未来的希望、人类的希望。（《榆林日报》星期天 2010 年 3 月 7 日）

说年

即将过年，《星期天》约我说说年。据传，年本是一种很凶的怪物，每到岁尾岁首交替之时，就出来见牲畜吃牲畜，见人吃人。人对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不知谁发现了年最怕的两样东西，一是红色，二是炮声。只要门上贴上红纸，放一串鞭炮，年就吓得无影无踪。到后来就演变成了贴春联，放炮的习俗。现在的年纯粹就成了计算时间长度的一个单位。秒、分、时、日、月、年、世纪、元等等都是计时单位。年这种计时单位，在尧舜时称为载，夏时称为岁，殷时称为祀，到了周代才称为年。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个节气，三百六十五天。岁尾岁首交接之时连双岁，俗称过年。那一夜，许多人家团聚在一起，通宵不眠，名曰守岁……

有关年的话题很多，扯三天三夜都扯不完，今天专说《论语》中的年。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按孔子的说法，人是有天命的，天命是有定数的，但天命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天命不是神而是自己。因此孔子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就是另外加上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许多人不知天命，不敬畏天命，不是积善，而是积恶，余殃就自然找上了门。

其实，孔子所说的是一个因果律，自作自受，不可怨天，也不可尤人。孔子学《易》是为了自己无过，不再造恶因，只造善因，这是孔子学《易》的目的，而现代人学《易》多数是为了给别人算命，看风水。须知，现代人的命是很难算准的，因为自己制造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白云山有个元辰殿，许多人对属于自己的那个元神顶礼膜拜，很可笑。我便写了一首诗：“同时降下命无数，何缘无数命各殊？并非造化多能耐，自加自减自乘除。”表达了我对命的看法。算命，看风水可能有高手，我想那些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大德。至于市井所见那些阴阳算命者，大多在骗人，自古有言：“一德二命三风水”。说的也是善因结善果。天天做坏事，即使有个好命，也让自己给糟蹋了。人知天命比较难，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我们一般人就是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也不知能不能知天命，这就是孔子和我们的区别。

一个人的生命也就是几十年，逝如流水。如何使用自己这几十年，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生命的价值，不在索取，而在奉献。无论在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都应有所担当。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性德一般高。老子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通过观找到自己的位置，看到自己的不足。孔子“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踰矩，”如此这般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创造了辉煌的人生，所获得的余庆，自古及今，无人可比。“知天命”之年，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达到辉煌人生的新起点。然而许多人一到五十就觉得老了，以为步入了黄昏，去等死。我曾对一个五十岁的小学校长说了许多话，请他在他所领导的学校开始经典诵读，可他说他老了。其实他的身体很好，正是做事的年龄，可他说他老了。告别那位“老人”时我感慨万分，便送了他一句话：“人到五十已说老，我步七秩方正春”。一秩是十年，五十岁之后，还有几个秩的活法。在我们这个老龄化的社会里，精神至关重要。人就活一个精神。精神是很难老的一个东西。肉体不同精神，过一年老一年，这是自然规律。可精神不同肉体。三国曹操到了暮年还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胸怀。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这是一颗孝子之心啊！然而现在的年轻人不知父母之年的人太多。有一次我在一所学校讲演，我让知道父母之年的举手，偌大一礼堂人，举起手的只有几个。这不能怪这些孩子，怪我们大人。许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把孝的教育从我们的教育中开除了，没有人教他们这些，父母师长的言传身教也缺乏这方面的东西，久而久之，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只知道张口吃饭，伸胳膊穿衣，只知道让别人关心他们，不知道他们应该关心别人。其实，孔子的用心，不仅仅

是要孩子关心自己的父母，他是在培养一种价值观，培养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关心，还指望他关怀别的人吗？还指望他做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吗？

在许多年轻人眼里，过年没有别的，就是吃好、玩好。其实，我们把许多的礼忘掉了。忘掉的东西，往往是精神的东西。年，只是肉体的计时单位，过年和精神的成长似乎没有多大关系，有两个有年字的成语。一个叫“年富力强”，一个叫“年高德劭”，年富一定就力强，然而年高不见得就德劭。过年，一大家团聚在一起，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总结总结上一年的学习，规划规划下一年的学习，我想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绚丽之夕阳。如此便会年年好运，好运年年。

“佳城”小议

1964年，因“葭”字生僻，将“葭县”改为“佳县”。人们都以为改好了，不仅好认好写，而且意思也好。岂不知这里边有问题，问题还不是一般的问题，很严重。真可谓不说不知道，知道吓一跳。

佳县山城，依山借势修筑在黄河边上的一座石山顶上，其为山矣，雄浑奇伟，危岩峻岌，确有“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景象。且三面临水，一步隘喉，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城南又有西北名胜——白云观，隔河相峙，更有香炉寺、云岩寺、虎头峰、狮子崖等，名胜古迹连珠穿玉，争奇斗艳。因而引来不少游客，其中不乏骚人墨客，突然之间触景生情，诗兴大发，笔下生华，常常会留下或诗或联或画佳作。

问题就出在文人画家的笔下。

“佳县”两个字，原本也没有什么问题，“佳县城”，原本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作诗做联作画，“佳县”、“佳县城”很难入诗入联入画，入诗入联入画时，往往会变成“佳城”。问题就出在“佳城”两个字上。这就奇了，神木县城写成神木城没有问题，米脂县城写成米脂城也没有问题，偏偏佳县城写成“佳城”就出了问题。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别之处。

“佳城”者，墓地也。这在过去，凡读书人连幼儿都知道，因为在儿童启蒙教材《幼学琼林》上就有：“生坟曰寿藏，死墓曰佳城”。《博物志》上也有这样的记载：汉朝夏侯婴，字滕公，他死后，送葬的车子走出城门外，到了一处地方，驾车的马停步不前，一面悲鸣，一面用蹄刨地，家人就在地上挖，结果挖出一个石棺，上面刻有铭文：“佳城郁郁，三千年才得见天日，滕公居住此室。”于是就把滕公葬在这个地方。从此，“佳城”便成了墓地的通称。墓地石坊或墓碑上常常会出现佳城两个字。

如：吉人眠吉地

佳偶奠佳城

如：华表灵禽挹彩云于霄汉

丰碑石马壮宏制于佳城 （录于佳县城李府墓石坊）

如：和圣佳城在

柳风百世芳（见柳下惠墓）

还有写墓葬的诗词，在这儿也举二例：

薄宦甘三黜，高名百世芳。

佳城何处是，零落野烟荒。

蕴藻征耆硕，褒崇缺典章。

会须有忧孟，和圣德难忘。 （明·萧协中柳下惠墓诗）

浩浩愁，茫茫劫，

短歌终，明月缺。

郁郁佳城，中有碧血，

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

一缕香魂无断绝。

是耶？非耶？化为蝴蝶。《清代外史》

金庸小说《书剑》引用了这首词。电视剧《风流才子——纪晓岚》片尾曲也引用了这首词。

由此可知，“佳城”早已成了墓地的专用名词。可惜，由于文化的断层，连过去的幼儿都知道的东西，现在成人都不知道了。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曾经就写过这么两副对联：

佳城天上阙

古观水中宫

佳城尽览人间事

草舍能观世外天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文化侏儒会犯这样的错误，想不到佳县诗词楹联学会出的一期春联诗词专刊，也有两处错误：

佳城如铁阳光似血

县地飞歌黄水是琴

《佳城东岩观黄河》

千山万壑设关隘，

自信所向路必开。

每到乱石阻激处，

引出涛声动地来。

诗和对联都很好，只可惜用了“佳城”二字。

我还看到著名画家刘文西先生画的佳县山城的一幅画，题款《佳城东望》。以上诗、联、画都很好，但当我们明白了“佳城”是墓地时，再去读这些诗、联、画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吗？

这一切都是由于文化的失落造成的。我们的老先人给我们造了多少字，多少典故，多少美丽的词章，每一个字，每一个典故，每一个词都是一幅画，都是一个文化密码，都是一个文化符号，都是一个文化信息，都是一个文化因子。多么珍贵的文化遗产啊！可我们这些不孝子孙，只知道丢、丢、丢，直丢得闹出了许多笑话，自己还不知道，岂不悲哉！斧根文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他们只知道斧根灌叶，他们生怕中国的孩子们把文化之根扎在民族文化的厚土上，生怕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流淌在中国孩子们的心灵里。他们不把中国人全变成中国文化盲，是不甘心的。这些人可耻至极，他们崇洋媚外，他们骂祖宗，骂中国文化，骂

中国人，不骂他们好像就活不下去。其实他们就根本不懂得中国文化。南怀瑾先生说的好：“现在中国人，骂中国文化的人多了！真使人感慨万千，我们这个国家在五代那八九十年中，也是最乱的，是当时认为的外族侵略进来的时代，有许多中国人变成什么样子呢？很难看，也很坏，他们帮助外族侵略自己中国人，所以唐末司空图有一首感慨的诗：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音。汉人学得胡儿话，却向城头骂汉人。将来百把年以后，写我们现代的历史，可能有人会这样写：现在骂中国文化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自己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没有搞清楚。”中国人请注意，我们中国文化的失落是全方位的，现在还不知道抢救中国文化，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

一个县名的改变引出了我如此的感慨，这已是题外话了。其实我是提议，恢复“葭县”原名。但我知道，即使是恢复一个县名也是很困难的，何况要恢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呢？

（《榆林日报》文化陕北 2009 年 3 月 23 日）

“汉献帝”闹了一个小笑话

“於戏”是个叹词，读呜呼，不读“yú xì”。这是极普通的常识，不要说古人，就是现在读过经的小孩都不会读错。可是“汉献帝”读错了，建议编导改一改，不然实在讲不下去。因为献帝九岁就登基，在位几十年，“於戏”两个字，在圣旨、制诰中经常出现，怎么说都不应该错。

我很少看电视剧，一个朋友对我说：“有几个电视台在热播《三国》，拍得非常好，场面宏伟，有气魄，编剧一流，导演一流，演员一流，场景一流，值得一看。”于是我按朋友说的播放时间打开电视机，果然正在播《三国》，果然如朋友说的，此片不同凡响。不过剧情已到了“曹丕废帝篡炎刘”那一回。我后悔没有早点看。《三国演义》小说我看过，对于那一回中的事我已淡忘，唯曹丕登了帝位说的那句“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的话长久忘不了。那句话把尧禅舜，舜禅禹的事和曹丕篡位弑君的事等同起来，使我在很长时间把舜、禹看得和曹丕一样龌龊。后来书读多了，才知道，曹丕岂可和古圣相提并论。

我边看电视边回忆小说中的汉献帝。汉献帝演得也很好，一诏，曹丕辞，二诏又辞，直到三诏，筑起“受禅坛”，曹丕才登坛受禅。献帝真是受尽了委屈，我很同情他。我十分注意地听他的第三诏。听着听着，听出了问题，他居然把“於戏（呜呼）”读成了“於戏(yú xì)”，就这一下就把我看《三国》的兴趣全部打消了。

这能怪演员吗？不能。因为谁也没有告诉过他於戏的读法。这能怪编导吗？能怪审查节目的人吗？不能。因为谁也没有告诉他们於戏的读法。要怪，只能怪文脉的断裂，文化的失落。直到现在，有人还在反对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要说别的，就光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人也应该大力弘扬我们的文化。不然，只能於戏！於戏了。

“黑色大潮”的忧思

——读高建群、塞北《陕北是个好地方》

读高建群、塞北的《陕北是个好地方》，不由令我忧喜交加。神木黑色大潮是喜亦是忧，如影随形。二位作家用他们敏锐的笔，把喜写了个够，把忧说了个彻，令读者困绕于忧喜之间，莫衷一是。而我看到的则是更多的忧。

“特殊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使神木成为中外投资者施展才华的风水宝地，被誉为西北煤都，塞上明珠。”“正如著名作家路遥说的那样，成千上万的外路人涌向陕北之北，其势头有点像当年的北美人涌向阿拉斯加，那时的北美人做的是黄金梦，现在的人做的是黑金梦。”“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崛起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一的现代化矿井、洗煤厂等大型企业，奏响了雄壮的富裕之歌，使神木成了华夏重要的能源基地，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县……”

以上文字确实令人鼓舞。神府煤田的开发，不仅使神木富了，而且使整个陕北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时期。谁能不为之高兴？谁能不为之振奋？但是，作者后面几段描写，却透露出了内心深处的忧虑和不安。

“随着开采速度的加快，人们的心情也日益沉重，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开采技术越高，力度越大，离资源枯竭的日子越近。神府煤田虽然巨大，但总有挖空的时候，如果按现在的开采挖掘速度计算，大约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神府煤田就将枯竭。”

“不到一百年”，就算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百年只是一瞬间。《易》曰：“履霜 坚冰至”。也许现在的中老年人看不到枯竭的那一天，可他们的子孙定然能看得到。尽管人们是多么不愿意看到那一天，可那一天却以惊人的速度向人们逼来。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能源大消耗的非常时期。这是一个饱了今天，不管明天的时代。有科学家早就发出警告：不可再生的能源都在经受着一场劫难，都在面临枯竭。处在这么一个时代，人类为了各自今天的生存，不惜进行异常激烈的能源大战。不管什么地方发现了能源，全世界的目光就会马上聚集在那里，就像一群秃鹫，在荒漠里发现了可食的东西，一齐扑向那里，用尖锐的咀将皮肉撕裂干净，然后义无反顾地飞走。不管是用战争的手段，还是用和平的方式，总而言之，千方百计要在地球生命体中切开一根大动脉。能源就像血，不分昼夜流向了那些发达的国家，直至流不出来，才肯罢休。其开采手段，其运输工具，无所不用其极，真叫人惊心动魄。

神府地下正在进行着一场人为的煤海大迁徙。经过 3000 万年形成的煤层，拥有 1700 亿吨储量的大煤田，就这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要永远地消失。

在未来的日子里，开采设备，运输工具还会更新，真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为人们为了多得到一点煤，都是在高度竞争状态下作业的，即人千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十之。他们都在拼着命做，恨不能一口把煤田全吞在自己的肚子里。因此，神府煤田枯竭的日子会大大提前，哪里还用得了一百年，有人说五十年，有人说二十年。不管怎么说，枯竭的日子，屈指可数。这不仅是作家的忧虑，不仅是神木人的忧虑，而且也是陕北人的忧虑，整个人类的忧虑。待到煤炭挖尽时，陕北还会是一个好地方吗？有人说，陕北过去穷，现在穷，将来还是个穷。过去是穷了经济，现在是穷了精神，将来是经济、精神都穷。这个说法太悲观，但它警告着陕北人必须科学地认识黑色大潮。必须科学地对待黑色大潮。

我不知道神木人对时时报出年产多少多少亿吨煤的喜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更不知道神木人送走最后一辆运煤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不知道那些当年做黑金梦的外路人会不会像来时那样如潮水般地离去。但可以肯定地说，喧闹了几十年的煤都会慢慢平静下来。亚洲第一、世界第一的现代化采煤设备会因没有用场而变成废铁，电力、电化、焦化三位一体，互为市场的产业链条将会停止传动，总之，凡依赖于煤炭生存的产业都将会因煤

炭的枯竭而倒闭。如果科技进步待到煤炭枯竭的那一天，还找不到可以取代煤炭能源的能源，黑色大潮潮落之后，只能给神木留下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

这不是杞人忧天，杞人忧天倾，天终没有倾下来，而神府煤炭的枯竭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这是陕北人面临的严峻挑战。

丰富的资源，往往会招致不幸，这已被许多历史事实所证明。据有关统计，联合国难民署近半个世纪以来，救助的难民多数因为战争流离失所，而那些难民的家园，往往是资源丰富的地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喊的是为了伊拉克的民主、自由的口号，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掠夺石油资源。日本当年发动侵华战争，打的是东亚共荣的旗帜，其真正的目的也是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

在神木历史上也有过因为富有招致屠城的血案。史料记载：神木风俗，男尚修饰，女尚奢华，盈实之家无论已，即家道小康，每娶一妇，其妆奁犹需数百金，而亲朋宴会，酒必甘醴，饔必珍错，奢糜为边上所仅见焉。溯自前清道咸年间，户口盈繁，人民丰富，东连晋直，百货流通；北界蒙旗，万商麇集，兼之茶马之市，畜牧之场，盐碱之利，皮毛之产，行商坐贾，数以万计，土人呼之曰：小北京。职是之故，讫于同治初年，匪盗猖獗，窜入北山，先攻破所属高家堡，神邑以次失陷，城中房屋财产，焚烧一空，人民老少男女死伤逃亡者约逾十万之数，於戏，残矣！官斯土者，或全节义于署内，或罹锋镝于阵前，视死如归，临难不避，皆为国为民致其身者也，壮哉！悲哉！

那一次屠城劫难，使神木大伤元气。史料又称：嗣后，生聚休养，越五十年之久，始复其旧。神木人，居住饮食衣服之华丽，较前诸往，有以过之无不及也。鱼鳞比屋，焕然一新，市场阗阗金碧交辉，米珠薪桂，民无菜色，修屋筑室者，无巷无之，高楼大厦伦奐巍然……

对此，套匪芦占魁早已馋涎欲滴，于民国五年春，率众南下，又一次攻破神邑，城内人民死者一百三十余人，伤者十余人，财帛损失十余万，院落焚毁十一所，区长李树棠战死……

两次劫难都是因为富有所招致，正如白居易一首诗里写的那样：“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今天，神木人因煤炭的开发，迎来了一次巨富的历史机遇。由于国家的强大，他们不会因为丰富的资源沦落为难民，也不会因为富有招致屠城的劫难，此神木人之所幸也。但是富而骄，富而奢，富而淫逸，富而堕落，则是富有者防不胜防的灾星。经济的航船，必须由文化导航。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孔子也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经济的发展或衰

落，都是一个文化的过程，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都在这个过程中沉浮。可人们往往把它误认为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那些猛然间发了财的人们，大多为文化跟不上而发愁。钱用簸箕促，拿麻袋装。这么多钱，不知如何个花法，就知道润屋，就知道养二奶，就知道买房，一栋楼一栋楼买，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买。这也许是现代人聚积财富的较好选择，但绝对不是为子孙谋下的真正福田。庄子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有余补不足，是个永恒的规律，是谁都逃不过去的法则。因此，中国有“得道则昌，失道则亡”的千古名言。道家主张自损，儒家主张克己，佛家主张利他，这都是从人生的感悟中总结出来的。

这只是从人生的层面上引发出来对黑色大潮的忧喜说，如果从生态环境，从宇宙学角度思考黑色大潮，那就得老老实实去学习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观了。人类对煤炭的认识，就目前还只停留在它是一种能源的层面，煤炭在地球结构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宇宙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现代科学尚未探明。就如热带雨林，人类当初对它的认识，只知道它可当作木材用，可万万没有想到热带雨林起着调节气候的作用。美国人把自己国土上的森林保护起来，去砍伐热带雨林，在当时没有人会说那不是美国人的明智之举。直到后来，飓风一次又一次光顾美国的时候，科学家才发现，飓风的频繁出现，与热带雨林的锐减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哲人，早就告诫人类，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可人们总是不相信，这样就做了许许多多的蠢事来。人类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加快速度透支着属于人类共有的有限资源，同时制造着有损全人类的物质，于是，出现了诸如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四季无常，等等怪异现象。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永远是那么的无知和可笑。但愿煤炭只是一种能源的存在，即使神府煤田枯竭了，陕北，依旧平平安安，地球依旧平平安安，风雨以时，万物萋萋。

黄河大警示

暴雪、暴雨、洪水、干旱、冰雹、台风等极端气候近些年异常频繁地光顾地球，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因而有了“京都议定书”，有了一次又一次气候变化大会。然而我忧的却是黄河，因为我亲睹了黄河近些年惊人的变化，仅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

浑不见了，“万里流黄黄不断”的纯美消失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线昏暗污浊的流水。面对母亲河，我再也有不了《黄河颂》的激情。《黄河忧》、《忧黄河》却时时涌上我的心头。

黄河忧

清清澈澈出涧丘，

万里奔腾注海流。

斗水七沙犹可虑，

百川纳垢更堪忧。

忧黄河

峡谷气势今犹在，

不见黄河天际雄。

劝君珍惜点滴水，

留于子孙润干唇。

记得1990年之前黄河依旧还有万古不衰的气象。从河口镇到禹门口晋陕峡谷725公里，黄河像一条巨龙，惊天动地，穿峡而过。佳县境内73公里，我曾坐着下水木船从武家砭出发，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螭镇，真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现在，黄河上已看不到船了。黄河衰竭了，她已无力载舟。如果就这样衰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干涸。多少年来我们盼望的是黄河清，谁能想到它会干？导致黄河变化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从来没有把黄河的变化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然而我错了，气候变化是宇宙大格局的变化，这个变化像一个巨大的魔网，笼罩着一切，改变着一切，黄河也不例外。这使我想起了古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千古名言。换句话说，就是，天变，道亦变。

农谚云：“小雪流凌，定流凌”。每到“小雪”，黄河上一下就会出现满河的冰凌，争先恐后在浪涛中竞流，成为千里峡谷一大景观。2010年“小雪”没有流凌，直到“大雪”才零星有冰凌流动，整整错了一个“节令”！“节令”就是天道。天道无他，信而已矣。如果气候成了一种混乱状态，无信可言，人何以存之哉！万物何以生之哉！

五日一候，三候一气，一年之内二十四气，七十二候，候有候的秩序，气有气的定数。从夏朝到现在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使用的还是夏历。年年岁岁，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节气，年复一年，循环往复，运转不穷，万物依之生生不息，万民赖之代代相继。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由于气候有常，“节令”无差，因而产生了许多关于气候“节令”的谚语。如：“冬至一阳生”，“霜降杀百草，立冬地不消”，“秋分糜子，寒露谷”，“小雪

“流凌一月冬，四十五天定打春”，“惊蛰不耕地，就像蒸馍跑了气”，“种地无命，节令抓定”，“清明早，立夏迟，谷雨种棉最适时”，“清明麻，谷雨花，立夏点豆种芝麻”，“小满前，乱种田，小满后，光种糜谷不种豆”等等，这些农谚都是老农根据年复一年亘古不变的气候规律，总结出来的经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拥有了影响气候的能力，拥有了加速地球升温的破坏力，只一百多年的时间，就使气候发生了变化，就使地球的温度升高。人类为了生存得更好，反弄了个生存危机的结果出来，这是现代人万万没想到的，也是难以接受的。但古人想到了，梁漱溟先生也想到了，他以严峻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圣人畏因，凡夫畏果”，然而竞争昏了头的现代人，既不畏因，也不畏果。对于科学家的警告，诸如：“喜马拉雅冰川消化，人类水源告急！”“气候开始朝着 6—7℃ 严酷升温发展，大大超过地球生态警戒线，几乎宣告了生态系统的死刑，世界处于毁灭性的气候混乱状态边缘”等等，他们有目不睹，有耳不闻。一次一次气候会议无果而终就是证明。最近在墨西哥坎昆会议上，勉强达成了两项决议，但要把“减排”落实到实处，还不知在牛年还是马年。而且就在墨西哥气候大会召开的同时，美日韩不是在东海搞大规模的军演吗？滚滚二氧化碳不断从海面上升起，然后消失在茫茫宇宙中。美日韩军演结束之后，韩国继续在二十七处的海域进行火炮射击演练。气候能不变化吗？气候变化是由二氧化碳温室效应造成的，奥巴马能想到军演会改变气候吗？想不到。菅直人、李明博能想到吗？想不到。参加气候大会的政要能想到吗？也想不到。要是想到了，怎么就对美日韩军演不说一个不字呢？怎么就对美国近年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那么严重的“战争排放”没有说一个不字呢？

如果人类真有了气候危机意识，不要说汽车排放、工厂排放应毅然决然减下来。军演、战争、核试验都应毅然决然禁止。就连燃放烟花、吸食香烟也要毅然决然禁止。全世界有多少人吸烟？假如把每天吸的烟集中起来燃烧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把一年，十年，百年吸的烟集中起来燃烧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然而减排能减下来吗？禁排能禁止得了吗？减不下来，禁止不了。减不下来，禁止不了能行吗？不行。据有关报道：就目前全球变暖的趋势，不到三十年，80%面积的喜马拉雅冰川将消融殆尽。全球冰川正在以有记录以来最大的速度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融化。冰川是天道形成的淡水库，一旦融化，淡水就被大海吞没。干旱、暴雪、暴雨也会接踵而至。而黄河的警示令我们更是忧之又忧。但愿今年的气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是一个不再有的现象。要是天道真的变了，就意味着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成了一种混乱状态，不再是有规律的循环往复。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为严重的生存挑战，面对这样的挑战，人类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讲任何条件，立即携起手来，同心同德应对气候变化。否则，全人类就会真的走上“天诛地灭”的地步。上一届气候会议上，有人

就警告：这是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然而有谁在意那个机会呢？又有谁去抓住那个机会呢？

我作为地球人，一介草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不抽烟，二尽可能的省水，仅此而已。我看着日渐衰竭的黄河，不得不叹曰：

不废江河万古流，

谎言一句几度秋。

何故惊涛永不在，

浓烟深锁夏时候。

好好呵护我们的陕北

蛰伏了数千年的一条巨龙在陕北高原上腾空而起，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三十年，只就一瞬间，变化之大简直让人无法相信。现在，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三十年前。别说神府，别说定靖，就说佳县。下面是我于1987年5月16日发表在《榆林报》上的一篇题目为“一个女人”的短文，全文如下：

原告：三个月前她突然出走了。床头一溜儿摆着十二双新做的鞋，一双比一双大。好奇怪，她什么时候做了这么多鞋呢？我喊她，喊不应，屋里屋外找，不见人影。孩子哇哇哭，我抱起来，发现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线绳，绳上挽着个纸卷儿，打开一看，是钱。纸上写着：我走了。鞋是给孩子做的，一年穿一双，可以穿到十二岁。钱是给孩子的，日后有了媳妇，买件衣服。看了她的留言，我的脑子都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纸上浸透着泪，湿湿的，可以断定她还没有走远，我就到处找，可没有找上。我知道关中地没有她的一个亲人，她的父亲在陕北，是她唯一的亲人，可去年已经死了。我总以为她会回来。我待她很好，孩子更是她的心肝，是她的命。她没有理由出走，我家里什么都有，新盖的瓦房，新做的家什，电视机，洗衣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她的。我相信她会回来的。可是，三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要知道，一个农民没有屋里的不行啊！孩子，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不能没有娘啊！我决心把她找回来，我荒弃了土地，背着孩子，从关中到陕北，一个村一个村地找，终于在陕北一个小村庄找上了她，多狠心的女人啊！她竟然和人家非法同居了。

被告：我和他结婚是被迫的。我高中还没有毕业，父亲就让我退了学嫁给了他。当时，我那可怜的妈妈刚刚死去，坟上的土还没有干啊！我不愿离开这块土地，我不愿嫁他，我已经有了心爱的人儿。可是，父亲说什么都不依我。我不答应，父亲给我下跪了，他哭着说：“孩子，听话，不挑好女婿，就挑秦川地，咱们要不生在这苦地皮上，你妈能死了吗？她硬是给饿的啊！孩子，我一个孤老头子，就你这么个女儿，我愿意离开你吗？没有办法啊！难道你忍心让我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时，关中人的几袋白面，在父亲眼里就是命啊！为了我那可怜的父亲，我不得不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得不离别我心爱的人儿。我发誓，一辈子不再回陕北，我没脸去见父老乡亲，我更怕看见我那心爱的人儿。我常常祈祷老天爷，让家乡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常常祈祷老天爷，让我那心爱的人儿把我忘了，找一个更称心的女人。去年，父亲死了，我不得不回来发葬他。天啊！家乡开始变了！可我

那心爱的人儿还没有结婚，他忘不了我啊！他疯了！他连我都认不出来了，我，伤了他的心！我对不起他，我就是伺候他一辈子，也赎不了我的罪啊！……

法官：别哭，你别，别哭，请安静，请，请安静，大家，都别，别，别哭……

几百字的文章令许多读者流了泪，有一位叫马兰的读者撰文说：“许多人流着泪看完了那篇短文。”是因为艺术感染力吗？不，是因为它的真实。是我帮那个关中人找到了他的妻子，是我替他写了诉状，是我目睹了那一次令人撕心裂肺的审判。今天，让三十岁以下的人读这篇短文，他们会相信这是真事吗？

当时的陕北穷啊！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穷陕北，全中国都知道陕北有个穷佳县。老县委书记王彦诚站在东城头上，望着这穷乡避壤，叹曰：“东临黄河水，西靠石头崖，国家不救济，粮从何处来？”然而，国家无论如何救济，佳县人依然活不下去，于是一批一批组织移民。离乡背井，无异生离死别，原本是令人无比伤感的事，可佳县人却怀着感激的心情加入了移民队伍。他们唱着《移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们的歌声悲壮、凄惨，如泣如嚎……

移出去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依然要厮守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过不下去就讨饭，坑镇乡关口村五十户人家，没有讨过饭的人家数不出三五户。人家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羞于说出自己的真实籍贯，戏称：“我是用粮地区、缺粮县、救济公社、供应村人”。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回答，又包涵了佳县人的几多辛酸，几多无奈啊！

现在，佳县人终于走出了贫穷。1988年，当时还年轻的许浚县长，作出了一个十分简单易行的决定，那就是在黄河沿岸营造红枣林带。他说：“咱没有地下的，就发展地上的，地下资源有竭日，地上物产无尽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沿黄长73公里、宽40公里的黄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条红色的富民“神果”林带。

关中人几袋白面就能换走一个佳县姑娘的历史已被沉积在人们的记忆之中。看啊！山山峁峁，沟沟岔岔，到处都是摇钱树，到了收获的季节，随便在哪棵树上摇摇，掉下来的都是钱。真可谓“九月九，家家有，红天红地红笆头，顾客盈门车船快，有吃有穿不发愁”。

“不挑好女婿，就挑秦川地”已成了过去，反倒是佳县的山沟沟里常常能见到操着关中西音的漂亮姑娘。

佳县尚且如此，何况乌金滚滚的神木呢？何况油海滔滔的定靖呢？

陕北，飞龙在天了，到处生气蓬勃，日新月异。陕北——成了中国的科威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陕北富了，富得流油，这是好事，陕北人从贫穷走过来，经受住了贫困的考验，但不能经受住富裕的考验，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

“满了口袋，空了脑袋，毁了后代。”——神木民谣

“男人有钱才学坏，女人学坏才有钱。”——三边民谣

“不吃白面没吃的，不打麻将没做的。”——佳县民谣

民谣，反应出来的是民风，民俗。孔子说天下有五不祥，其中“老不教，幼不学，俗之不祥”。孔子还说：庶而后富之，富而后教之。不教就会无道。国有道贵德，国无道贵耻。

《易》曰：“飞龙在天，上治也。”所谓“上治”，不仅是经济的繁荣，还有精神的富有。陕北人要有清醒的头脑，得好好呵护这块富有的土地，好好呵护陕北淳朴的民风，好好呵护我们的子孙。贫不失义，富而知礼，是陕北人老祖宗的遗传。为富不仁，吮痈舐痔，不是陕北人的种。（《榆林日报》2008年6月5日）

心系黄陵

早上六时半，我如约提着一百本“燕翼堂义塾”选编的传习教材赶到榆林学院，几十名历史系的学生已分别坐在两辆大轿车里待发。吕波老师让班长立即把书分发下去，然后领我上车要我给同学们讲讲话。

吕老师是教历史的，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深感有某种缺失，于是就组织了这次延安之行。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而是一次寻根之旅。中华文化血脉的断裂，延安精神的淡忘已经使我们深受其害，我们一定要接续上我们的文脉，一定要找回我们的延安精神，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我说：同学们，我们今天要拜谒我们的人文始祖，重温淡忘了的延安精神，是很有意义的一次活动。所谓文化无非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技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而人文文化则是一个民族得以凝聚的坚强纽带。民族的认同说到底人文文化的认同。一个民族如果忘掉了自己民族的人文文化，就会沦为物种意义上的族群，那样的族群就成了韩愈所谓的“襟裾牛马”。我们中国之所以历经大灾难而不解体，凭的就是源远流长的人文文化。你们是学历史的，古人说“六经皆史”，不读《六经》，就无法透彻了解中国的历史。要读懂《六经》，先得读懂《四书》。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四书》中的《大学》和《中庸》……

我的这些话一下就激发了同学们读《四书》的热情，于是车厢里响起了琅琅书声。“书能香我我香人，人我相香香更浓。幼学老教移风气，常平百姓成儒珍。”这是我在佳县屈家庄听到小学生读《大学》时有感而发的一首诗。今天听到大学生读《大学》的声音使我更为欣慰了。一路上大家读一会书，唱一会歌，非常活跃。我不善唱，只得讲笑话：高双成将军

去南京开会，蒋介石问：“榆林黎庶何如？”高说：“陕北梨树不多，枣树不少。”蒋哈哈大笑：“黎庶者，小民也。”高说：“委员长问我小名，我的小名双娃。”我的话音刚落，车厢里爆笑了。笑过之后我又讲了一个：一次我去太原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看见会议厅前放着一个宣传牌，围着许多人看。只见牌上写着孔子的一段话：“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参加会的人不是学者就是教授，大家只看不说话，大概因为这句话里有“独子”两个字的缘故，有人便说：“走走走是搞计划生育宣传的。”我的话音一落又是一阵笑声。就这样，我们在书声、歌声、笑声中不知不觉就到了黄陵。

郁郁桥山紫气凝，渊渊沮水潦雾蒸。

人文始祖居其上，代代华人竞嗣承。

这是我到黄陵后的第一感觉。自从“黄帝崩，葬桥山”以来，每逢清明节国家就要在这里举行国祭。平时祭拜的人们川流不息、纷至沓来。黄陵土著居民则世代代在此守陵。这是一种祖宗崇拜，中国人就是在“慎终追远”的祖宗崇拜中繁衍着自己的后代，继承着自己的文化。

现在，我和榆林学院的师生一起来到了黄陵，真真切切融入到“寻根赤子八方至，祭祖华裔四海归”的人流里面，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激动。

因为当天还要返回延安，拜谒黄陵只限两个小时。这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浓缩，八万亿中华儿女智慧的典籍。两天，两月，两年都读不完。潜意识告诉我只能看重点之中的重点。

首选古碑。一个长廊里竖立着一通一通历经沧桑的石碑。从清代起，明代、宋代、元代、唐代，越往上数碑越少。看着这些刻着不同年号的古碑，就会使人联想到各个朝代的盛衰和兴亡。由于风雨剥落，有的碑只剩下只言片语，但在这只言片语里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人留下的信息，依然可以触摸到历史脉搏的跳动。我原以为这里应该有更多的古碑，一饱我的眼福，万万没有想到始祖圣地保存下来的碑却是这么的少。是古人原本就没有留下呢？还是在“文革”时被破坏了呢？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看罢古碑直上轩辕殿。这是一座纯用花岗岩石料构建的宏伟建筑。顶上开着天井，圆形的，可以看见日月星辰，白云蓝天，像天；地下筑有硕大的平台，方方的，用青白红黑黄五色石铺成，法地，形成“天圆地方”的视觉效果。殿的正面屹立着轩辕帝石刻画像，南面天下，恩被万邦。殿的四方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朝拱。前面有印台、印池两器错落相呈。日月星宿、山川丘壑，时时交感，人文景观、花草林木，物物相应，不愧为天下第一风水宝地。人文始祖葬于此山，坐于此穴，真是炎黄子孙之幸也。

有学生对“天圆地方”说提出质疑。连小学生都知道地球是圆的，怎么成方呢？这个讨论很有意思。我以为方圆是几何图形中最基本的图形。孟子说：“方圆，规矩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无方圆不成规矩，圆没有棱角柔和圆通，方有棱角工整方正，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内方外圆”的深刻内涵。不仅如此，就这大殿的设计把诸如“六合”、“五德”、“四大”、“三才”等中国文化的要素都囊括其中。这是“天人合一”的象征，“万物一体”的注释。

轩辕殿出来，乘车直上“桥山龙驭”处。从“文武官下马石”往上走还有好一节路，我的脚力到底不能和年轻人相比，很快就殿了后。到了黄帝墓前，早已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我给黄帝行了三拜九叩之礼后，环视龙穴所在，只见周围全是茂盛的苍松翠柏，旺像四起，灵气十足。松柏有粗有细，粗者数人合抱，细者参天插云，随便哪一棵树都在此陪伴黄帝千年之久。据说，这些树都是一代一代谒黄人亲手所植，每一株树都系着一个心灵，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也将见证未来。我未能植柏，但我要留下我的心声，成为永久的回响：

白须皓首谒黄陵，步履蹒跚殿后登。

祭祖来迟思有愧，寻根未果恨无能。

连结坠绪心宜定，救起遗豪志要恒。

荐血何分年老少，登堂照样作交承。

鲁迅先生二十一岁时写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表现了他救民于水火中的决心。在今天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我辈亦当有鲁迅精神。

这次黄陵之行使我认识了榆林学院的不少学子，他们风华正茂，是中国的希望与未来。在返回途中，听到有同学还在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感到非常非常欣慰。（《榆林日报》2010年5月30日）

一座古城的背影

——探秘波罗古城堡

十几年前，我认识了一位僧人，他说他出家前曾在西安一所大学教书。出家后一直想找一个静修之所。他在佳县云岩寺呆了几日，觉得不太合适，想到别处看看。我一口气给他点了好些寺院的名称，当提到横山的波罗时，他显得异常兴奋，说：“就到波罗寺！就到波罗寺！”我说是波罗镇，波罗镇有个接引寺。他说波罗是梵语，是“菠萝蜜”的简称，也叫“波罗伽多”，译成中文就是到彼岸。他打着手势比划着，此岸就是“生死岸”，彼岸就是“无生死岸”。接下来还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有一个笨人出了家，老和尚教他念“南无般若菠萝蜜多心经”，教了好多天教不会，老和尚急了，说你怎就这么笨，好多天就会念两个字“波罗”，

怎成正果啊？走走走！他离开寺院走啊走，边走边念着波罗，天黑了就钻进一个岩洞盘腿一坐又念起了波罗，渴了洞里有泉水，饿了身边有吃不完的“薯头”，就这样念了吃，吃了念。过了很久他被寺里打柴的小和尚发现了，小和尚告诉了老和尚，老和尚就来到岩洞。笨人见师傅来了，非常高兴，不知用什么招待他的师父，师傅说你平时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只见笨人随便捡了几个“薯头”，在火上烤了一会儿便拿给师傅吃。这哪是什么“薯头”，全是些石头蛋儿！可同样是石头蛋，徒儿却吃得有滋有味。老和尚这才知道他的徒儿得了正果，倒地便拜，要徒儿度他。徒儿扶起师傅说：“我没什么正果，只是会念波罗两个字。师傅说：“其实念经何须多，咬定波罗到波罗。”之后人们就把这岩洞叫波罗岩，还修了寺院，也叫波罗寺，把笨人尊之为“波罗祖师”。后来他云游四方度了很多，所到之处人们又为他修了寺院，比如西藏江达县波罗乡的波罗寺，福建长汀聚峰波罗寺，宁波九峰山波罗寺……

这么说波罗祖师也到过横山，我问。他说有这种可能，不然不会叫波罗寺的。我查找波罗祖师到过横山的证据，没有找到，可意外发现在《读史方輿纪要》中有如下一段话：“州西有土门，响水，麻河，大兔鹑，波罗寺五寨。今响水，波罗寨俱改榆林卫”。从这段文字看，波罗镇确有过波罗寺，接引寺也许只是波罗寺残留下来的一部分。

这引起了我的考查波罗寺的兴趣。于是我和那个僧人一起来到波罗。波罗寺建于何年已无可考，只能从残缺的遗存中去感受一点古老文化的信息。这是我的感觉。僧人却像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尽管很破旧，但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那么的熟悉，那么的亲切。“二天门”已不成其门，只是门的一个残骸，但门头匾“二天门”三个字很清晰。既有二天门，一定有头天门，三天门，四天门，可那些门早已荡然无存。佛塔还在，佛塔也是天门，因此古人留下了“上到天门最高处，不能容物只能身”的诗句。僧人看到塔就像看见了佛祖，他张开双臂跑过去就像拥抱久别的母亲似的把塔抱住。此时，我的眼睛已经湿了。塔十分的古老，是隋塔？还是唐塔？没有碑。僧人念叨着波罗波罗绕塔几周，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佛教既是一种信仰，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就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成了中国佛教，这是文化交流之后的必然产物。这里有过古建、碑刻、绘画、石雕、木雕，也一定有过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赋、匾额、楹联，一切都无不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光芒。然而，那一切有形的东西都随着历史消亡了。现在只能看到摇摇欲坠的屋檐、东倒西歪的垣墙、饱经风雨的佛塔、凹凸不平的老街以及长满荒草的院落。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们只能说这里曾经很繁华，银匠铺都有十几家。至于波罗寺、波罗祖师早已从波罗人的记忆中消失了。我们去访接引寺的和尚，他们只知接引寺，不知波罗寺。这是一种文化的消失、集体的失忆。记忆也是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精神财富，不管

是哪一代人都有责任把他们的记忆传给下一代，用现代的话说，那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我们许多人只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和传承，任意让精神财富流失。波罗寺的消失就是一个例证。

我们登上一个最高处，这里可以俯瞰波罗的全貌。看着这么一座宏伟的波罗寺遗址，不难想象当年弘法的盛况。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文化引发的。这里一定有过高僧大德，虔诚的信众从四面八方赶来，开始临时搭起帐篷供人们休息，临时垒起锅灶供人们饮食，后来人越聚越多便有了客栈，有了饭铺，有了商店，有了银匠铺，有了当铺。财富的积累往往会引来盗贼，于是就有了坚固的寨堡，坚实的城墙。波罗由一个信仰中心，变成了商贸中心，当然其中也有文化的成份。但和当初的波罗相比，已经变了味。当初来波罗的人是向往着“彼岸”，是被度，后来来的人却追求的是“此岸”，是被染。这就是波罗由盛到衰的根本所在。

文化的复兴，是信仰的复兴，人心的复兴，这就是我们访波罗所得出的结论。

僧人没有留下来的意愿，他说，一切随缘。他还说，波罗寺还会复兴。说完我们就分手了，他没有坐车，唱着他新编的一首偈“早波罗，晚波罗，唱着波罗六合和，你波罗，我波罗，白马金盘到波罗”走了。

十几年过去了，波罗寺一直在我心里萦绕。波罗是尘封很久的一本史册，里边不乏光辉的页码，但机缘不到，无人把它打开。复兴波罗的历史机缘应该到了。榆林有很多寺院，然只有一个波罗寺，但愿波罗寺恢复如初，成为一方净土。（《榆林日报》星期天精彩博客 2010年5月16日）

佳县佳景佳秋

能看见的，除过山峁还是山峁。太阳从山峁里爬出来，又从山峁里钻进去，周而复始，终古如斯。

黄河像一把利剑，在山岭中间霹开一道千里长峡，这就是晋陕峡谷。峡谷西岸，凸起一座山峰，其状酷似一只巨蝎，俗称“蝎子山”。古人依山就势，在山顶上修了一座古寨似的山城，这就是佳县山城。遶城壁垒，蜿蜒曲折，三面临水，一步咽喉。在冷兵器时代，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现在，在军事上已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可观赏价值，却与日俱增，成了一方旅游圣地。可惜，古代文人很少到此一游，自然没有留下多少可吟诵的诗词和可观赏的墨迹。我仰望着千仞绝壁，叹曰：

黄河空霹摩天壁，过客如云少名题。

梦里依稀鸿鹄至，苍苔丹崖踏雪泥。

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著名画家刘文西，登上山城一看，惊讶不已：黄山！黄山！从那时起，刘文西先生年年要到佳县写生，常常还要画上一幅长卷。他万分激动地告诉同行：佳县简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刘文西先生以自然为大宗师，拜倒在佳县山水人物的脚下，成就了他艺术大师的事业。之后，画家、摄影家、书法家、作家、影视编导、接踵而至。他们空手而来，满载而归。不久，便有惊世脱俗之作面世。于是，佳县便名闻于世了。

秋天是最好的季节。黄河滩头，群山岭上，沟沟岔岔到处都是红枣。从红眼眼，红盖盖，半红红，通红红，一路红下来，整个佳县都被红色染透了。红色象征着富贵，敦厚、悠远。可是，在二三十年前，山岭沟岔都光溜溜的，那时，人都很穷，关中人几袋白面就可以换走一个姑娘。不挑好女婿，只挑秦川地，秦川地招引了多少个佳县的好姑娘！现在，山岭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摇钱树，随便在那棵树一摇，掉下来的都是钱。真是：“九月九家家有，红枣上篮似山丘。顾客盈门车船快，穿呀吃呀不发愁。”现在，倒是秦川地的姑娘往这里跑，事情就是这样，物及必反。

佳县没有神府那样的煤田，也没有三边那样的气海，可大自然给佳县人恩赐了一种神果，给佳县人浑然天成了一方艺术的天地。什么龙虎湾、狮子崖、虎头峰、人面石、蛤蟆石、飞来石、奇文石、比比皆是。伫立城头，瞻其前，白云观白云飘渺，顾其后，香炉寺紫气飞凝。待到秋水烂漫时，悠游在葭山芦水之间，一面随便举手摘一个红枣品尝，一面领略峦生其后，涛涌其前，势吞万象，气夺五岳的峡谷奇观，那真是一种享受。如有兴致，结几个伴，慢步在古寺仙景之中，结山中缘，寻世外味，吟几首诗，作几笔画，那更是人生之乐！

佳县佳景佳秋，早晨，红红的太阳从红红的枣林中冉冉升起；晚上，红红的太阳又从红红的枣林中慢慢落下。在暖融融的一片红色之中，佳县就显得更美。

香炉寺记

尝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此言差矣。龙潜于渊，仙隐于山，古籍多载焉，后世寡闻焉。若信此说，天下则无名山可言矣。予观巍巍山系，浩浩水域，无不彰显天地之博奥；涓涓溪流，岌岌危岩，无不充溢山川之灵气。山之名，水之灵，绝非由仙而名，因龙而灵，实本固然者也。且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天下若无仁人智士，纵有五岳之峻，四海之阔，亦无名山灵水可言也！

香炉寺名之于天下久矣。所名者何？天地造化之，工匠美化之，仁义内涵之。美乎哉！千里峡谷。奇石垂万象，美景不胜收。香炉石，乃奇中之奇也！然，设若无古人，因山之势，借石之形，度地之宜，在其上修一袖珍小庙，岂可成一方之胜？小庙既成，美则美矣，然人犹有所憾。于是千思万虑，构一小亭于北侧。宜山、宜水、宜天、宜人，不亦至矣乎？此亭既不塑神灵之像，又非寺僧之所居，专为文人雅士论道言志而设。且名之曰：寄傲亭。此诚天下庙宇独一无二之举也。或问，所寄者何？傲骨也，正气也，鸿鹄之志也。在上不陵下，博爱之，仁也；在下不援上，行而宜之，义也。仁义不离其身，则近道也。至此，香炉寺外在之美，内在之美，集之于一体，达尽善尽美之境矣。

丁亥秋，毛泽东有幸到此一游，无言无书，惜乎？否矣。此处无声胜有声。一身系天下安危之伟躯，能以百姓心为心，钻城门小破洞，步悬天朽木桥，欣喜若狂，临风揽胜，足矣。（《榆林日报》信天游副刊 2008 年 10 月 14 日）

峡谷小敦煌云岩寺

寺院是传播佛教文化的场所。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就是佛。

唐宋年间，佳县境内不仅修建了如普照寺、大佛寺、金明寺等大量的砖木结构的寺院，而且开凿了如佛堂寺、云化寺、玉泉寺、惠元寺等不少石窟寺院。

云岩寺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代远年湮，风雨剥蚀，云岩寺的古碑，到清代已辨认不清。因此，石窟开凿于何朝何代，何年何月，已无法考证。就以石雕造型风格而论，多数专家断代为中唐。

《葭州志》有关云岩寺的记载只有数行字：同治三年，有人在寺内披荆，土中发现一枚古钱。钱的正面为女子头像，背面是一首诗：“为种蟠桃树，千年一颗生。是谁来窃去，唯问董双成。”这几句话出土在云岩寺，是佛偈？还是禅语？抑或是神灵的某种预示？无人破译，时间久了，也被人们遗忘。直到一九四二年，云岩寺佛窟顶上修起了一座瑶池金母殿，人们才有了一些领悟。董双成是西王母的侍女，因炼丹成功而得道。若不是董仙显圣，谁敢在佛窟顶上动土？其实在众生眼里，佛也罢，仙也罢，若能救苦救难，就是好神，正神。因此，每到初一、十五，香客盈门，佛道节日，香火就更旺。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各地的道观寺院，无不是多元文化的大杂院。中国宗教甚多，而最著者，释道儒。三教一炉，万类同根，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

域，各个层面，云岩寺也不例外。云岩寺虽然不大，可佛道儒齐全。释迦牟尼是佛教的代表，瑶池金母是道教的代表，禹王则是儒教的代表。孔子在《论语》中把大禹推崇备至，说：“禹，吾无间然也。”意思是说，大禹这个人好得就实在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由此看来，云岩寺不仅是古代石雕艺术的殿堂，也是释道儒中国三大主流文化的结合处。当然，云岩寺传递的主要文化信息，还是佛教，但有各种信仰的人士，在云岩寺都可以找到自己心灵的依托，这是云岩寺香火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云岩寺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别美。“古寺云岩畔，登临览八垓，河声动天地，岚气扑楼台。”这是古人游览云岩寺留下的名句。的确如此，云岩寺开凿在虎头峰的石壁上，在它的下面就是黄河葭芦河的交汇之处。峡谷气势十分壮观，前面又与白云观结伴，后面则和香炉寺相邻，胜景奇观，穿珠连玉，仙阁佛殿争妍斗绝。有谁有幸到此一游，乐山乐水，悟佛悟道，那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山缘、水缘、佛缘、仙缘、儒缘。

步入石窟，就会有一种佛光照彻心灵的感觉。释迦牟尼和中国的孔子是同时代人，他出生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二十几岁时放弃了王宫舒适的生活到雪山修炼，苦行六年未果，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释迦牟尼用“缘起说”解释世界，提出“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这是佛教对佛门弟子的告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谁能逃脱“因果律”呢？谁也逃不脱，连天体，都是在因果律中运行着。天地万物，无不在因果关系中，反反复复。《大学》中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就是儒家对释迦牟尼“因果不虚”的最好的注释。孔子“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把因果关系表述得再明白不过了。慎能避祸，恭可远耻，贪财者财上死，贪色者色上亡，贪官者官上败的实例在现实生活中，俯仰即是。可是有几个人在因果面前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呢？圣人畏因，凡夫畏果。圣人和凡夫之间的差别，仅此一念而已。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也是非常小的。圣人千方百计让人能保持住那一点点和动物的差别。这就产生了宗教。其实，所有宗教的出发点，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

释迦牟尼不可思议的智慧，全部保存在卷帙浩瀚的大藏经里。马克思曾说过：“辩证法在佛教中已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恩格斯也说：“人类到释迦牟尼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由此可见，佛教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释迦牟尼和孔子一样，有很多弟子，迦叶、阿难、文殊、普贤，还有十六罗汉，都是释迦传道时的常随弟子，他们都被雕刻在云岩寺的内室里。弥勒佛、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雕刻在外室里。弥勒佛和释迦牟尼佛是同一地方、同一时代人，因遇释迦牟尼而得度。据传，

我国奉化出现过一布袋和尚，临死时说：“弥勒弥勒，分身十万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因此，人们便以为他就是弥勒化身。从那以后，无论是泥塑还是石雕，都以布袋和尚的形象而雕塑，这就是大肚弥勒佛的来由。至于观世音菩萨就更为中国人所熟知。观世音悲心不尽，闻声救苦救难，如有急难之事，求告观音，无不灵应。观世音“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和老子“有生于无，无生于有”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地藏王菩萨“众生度尽，方正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和老子“圣人善救人，故无弃人，善救物，故无弃物”又如出一辙。如果脱掉宗教的外衣，除去迷信的色彩，人们就会发现，释道儒，殊途而归，一致而百虑。释迦牟尼也好，老子也好，孔子也好，都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一个永恒不变的法则——因果法则。

因果法则，就是云岩寺及所有道观寺院告诉人们的哲学内涵。

云岩寺的石雕是中国石雕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有人赞誉它为黄河古道小敦煌是有道理的。日本入侵华期间，不惜重金，收买华人中的败类，进行过盗窃；之后，云岩寺又遭到我们自己人的破坏，住寺道人刘慕邦被迁居乡下，和牲畜为伍，饿病而死，寺内的佛像、碑碣无一幸免。

陆有时洋，海有时桑，不灭者文化，不崩者佛堂。现在，云岩寺终于又得到了恢复。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绝不能把佛教文化的圣地，搞成迷信的场所。

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是佛教以及所有宗教的灵魂，如果失去灵魂，所有的宗教都将面临着死亡。人亦然。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是人类一切灾难的源泉。但愿人们谨之！慎之！

《东方红》故乡的怀念

“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在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佳县儿女站在陕北高原，遥望首都北京，高唱《东方红》，更加激起了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响彻世界的伟大颂歌，是我县劳动人民的歌手李有源唱出来的。它凝聚了佳县儿女对毛主席的如海深情，表达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共同心声。

佳县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唱《东方红》。几十年来，全县人民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唱。过去我们唱着这首歌，就好像心中升起了红太阳，就好像站在毛主席身旁；今天，每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就会引起对毛主席转战陕北时，在我们佳县度过的那些峥嵘岁月的回忆。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六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风尘仆仆，来到《东方红》颂歌的故乡。

在我军暂时撤离延安，同蒋匪军进行艰苦斗争的日子里，佳县人民一想到毛主席还在陕北，就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再大的困难能克服，再大的牺牲敢承担。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来到佳县指挥我们战斗，全县人民信心更足，意志更坚。

我们怎能忘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为了迅速夺取西北战场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一个个英明的指示，一个个重大的部署，就从我们佳县这小小的山沟沟里，飞向前方，飞向全国各地。

在梁家岔，毛主席亲自指挥了著名的沙家店战役。给蒋介石匪帮以致命的打击，扭转了西北战局。在朱官寨，毛主席制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领导全国军民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在神泉堡，毛主席起草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双十宣言》，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吹响了埋藏蒋家王朝的进军号，迎来了全国解放的新曙光。

毛主席在佳县走过十三个村镇，度过了九十八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佳县的山山岭岭，留下了毛主席的足迹；这里的一草一木，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同毛主席一起生活和战斗过的佳县人民，那些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老贫农、老房东，怎能忘记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朝夕相处的珍贵年月，怎能忘记毛主席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那时，由于蒋介石匪帮的蹂躏和天灾，给全县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也和当地群众一样吃高粱糠糊糊。许多老乡说：“咱佳县再苦、再穷，也不能叫毛主席他老人家受委屈啊。”一天，当年的县委书记张俊贤，代表全县人民的心意，带了两只羊的肉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说：不要这样做，老百姓很苦，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毛主席随手写了一个条子，叫人把羊肉送给伤病员，并一再嘱咐：要安排好群众生活，组织好生产。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我军准备再战。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把张俊贤同志找去，问他：再打一仗，能不能支持下来？张俊贤同志说：胡宗南把我们佳县人民害苦了。佳县人民决心支援前线，消灭这群野兽。眼下就是再困难，佳县人民也能支持住。接着，他就把我们还有多少粮食，多少羊，多少干草，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最后，他代表全县人民表决心说：“把这些粮食、羊吃了，我们全县还有几百头驴、牛，就是把驴和牛杀吃完了，也要把战争支援下来。”毛主席听到这里，说：把驴和牛杀了，明年人民群众怎么搞生产？张俊贤同志回答说：“解放前，我们穷人哪有驴和牛，种地就靠一把老镢头。只要把胡匪消灭了，佳县人民保证拿老镢头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主席听了这些话，满意地笑了。可是，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部队再困难，也绝不能杀一头驴、一头牛。毛主席真是时刻关心着人民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啊！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在朱官寨住了整整一个月，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朱官寨有个庄稼人叫朱文军，毛主席来的那阵，他正患病。毛主席知道了，就派医生给他看病；每当

他家缺粮，就派人给他送粮食；知道他下不了地，就派人给他家送粪、翻地、种麦子。朱文军一家连自己的地边边也没去过，麦子已经种好了，他们一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在朱官寨，毛主席关心的何止朱文军一家！那个时候，朱官寨有三十来户人家，眼看就要断粮了，毛主席就派人组织大家互济互借，一户一户地解决问题。朱官寨人民每当回忆起那些日子，就深情地说：“我们一村的老老小小，都在怀念毛主席啊！”

在毛主席生活战斗过五十多天的神泉堡，至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红天红地红霞飞，咱神泉来了九支队，多少代来多少辈，没见过这样的好军队。刚放下背包去担水，天不明又上山去把庄稼背。快让亲人炕上坐，热汤热水喝一杯。扯烂衣袖留不住，又上场院把连枷挥。提上筐筐红枣表表心，几回回送去又送回。”那时，刮了几天几夜西北风，接着又下了一场霜，庄稼还没收割。正当大家十分发愁的时候，毛主席来到了神泉堡。他老人家一落脚就四处查看，见了庄稼人便问：冻得碍事不碍事？第二天，毛主席动员九支队的全部人手，帮助群众抢收庄稼。敬爱的周副主席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我们要做好拥政爱民工作。现在正是秋收的时候，要积极帮助农民收秋。这里的人民经过敌人的抢劫、烧杀，生活很苦，大家要爱惜他们的一草一木。比如一个枣子，是很小，可是要经过一年才能长成，你如果摘下来吃了，就会影响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誉。一个人做一千件一万件好事，别人认为是应该的，但要是做了一件坏事，很快就传开了。你们要为群众多做好事，不要做一件坏事。周副主席这些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的耳边。九支队出动了大批人马，和我们一样起早摸黑地干，没几天功夫，就把庄稼收回来，场也打完了。到秋种的时候，毛主席又叫人把机关灶上节省下来的麦子，送给缺麦种的十几户烈军属和贫下中农。毛主席还叫九支队派出百十个人、几十匹马，帮助老乡种麦子。毛主席在佳县撒下的是幸福的种子，革命的种子啊！

在南河底居住期间，有一天战士们正在帮助老乡打场，毛主席笑盈盈地走进场院，也拿起连枷打起来。他一边打，一边和老乡谈话。打了场，毛主席又去帮助老乡推碾子、摘豆角。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却象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毛主席在佳县住过十三个村庄，每次临走前，他总要和同志们一起，把窑里、院子、庄上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借的东西一一还清，哪怕是一块拴马的石头，也要搬到原来的地方。损坏的东西，哪怕是一个碗，也要照价赔偿。

毛主席在佳县期间，曾健步登上白云山，游览了“白云胜景”观赏了“香炉晚照”。他指示陪同的张俊贤同志说：这些都是文化遗产，除了牛头马面，都不要毁坏了。你不信神，我不信神，可是后人不知道这就是神，你明天出个布告，要保护。随后，毛主席还风趣地讲了一些没有神鬼的故事。

那年秋天，毛主席还观看了我县群众剧团的演出。他站在人群里和老乡一起看戏，县委的同志给他搬来一条凳子，他没有坐，却把身边的一个小孩抱在凳子上。站在前面的老乡，见自己的领袖也来看戏，就自动让开来，毛主席亲切地说：你们就在那里看吧。看完戏以后，毛主席指示有关同志以“亚洲部”的名义，给我县剧团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与时俱进”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一九四七年秋季的一天，我们县委正在佳县县城召开区干部会议，毛主席专程前来看望大家。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提议，请毛主席给佳县人民题个词。毛主席连声说：好，好，好！接着，就挥笔为我们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光辉题词。

毛主席到我们佳县，至今三十年过去了。毛主席在佳县的伟大革命实践，对佳县人民的亲切关怀，将永远珍藏在佳县人民的心里。毛主席留给佳县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佳县儿女世世代代取不尽、用不竭！我们决心带领全县人民，最紧密地团结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深揭猛批“四人帮”，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用道道坝坎、层层梯田，把毛主席当年走过的山山水水装点，让大寨红旗在《东方红》故乡高高飘扬。（原载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三《人民日报》）

人民歌手李有源

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李有源出生在离佳县城七里地的一个小村庄——张家庄。

李有源的祖父名叫李燕斌。据说在李燕斌手里只靠租种地，打短工过活，没挣下一铧地，也没有个能安身的地方。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兴田，次子叫兴旺，三子叫兴玉。李燕斌老汉一辈子盼田地，盼兴旺，可一直到他六十岁死的时候，还没有兴旺过一天，还没有一块能埋葬自己的坟地。他把希望寄托在他的孙辈手里。二子兴旺又生三子：有财、有奇、有源。有源排行第三，村里人叫他李老三。

李燕斌死的时候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家产，可债务倒留下了一屁股两喇叭。兴旺父子决

心改变他家的经济状况，为了在地主那儿熬一个好佃户的名誉，交租的时候把米碾了又碾，不能叫有一颗谷子、一片糠。地主当然高兴，因此他家的租地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达几十垧。那样，渡命的汤水，在平常年头总算能喝上了，但一家人没有住处那怎行呢！于是在种地之余，打好石头，又一块块背到山上，修了几孔接口土窑洞。窑洞刚修好不久，李兴旺就吐血而死，时年仅四十岁。从此，他家的生活更加苦了。

有钱人家的孩子穿好、吃好，李有源不眼红，可有钱人家的孩子能念书，这可把李有源爱扎了。有一天，有源对妈妈说：“妈！我要念书。”

“憨娃娃，咱连口也糊不住，那有钱供你念书。”

李有源难受得哭了。妈妈心想：既然孩子这么爱念书，就让他试试吧。她口里俭，肚里挪，给儿子凑了一斗谷米，一升绿豆，一斤麻油，一包洋火，打发他到刘家沟外婆村里一个冬书房念书去了。李有源非常刻苦，就那一个冬天，他读了《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书，学会了不少字。当时，他只有十三岁。过了年，冬书房不办了，他也就不念书了。后来，他天天到城里掏大粪。城里有所县立小学，他进城挑粪，听到学校朗朗读书声时，心里十分羡慕。他主动给学校做些杂务活，烧水、扫院，筛炉灰等等，终于争取了个旁听生的机会。李有源十分好学，碰上有字的纸，就捡起来看，要是有不认的字，就先写会，再去求教老师。他还爱画画儿，拉板胡，弹三弦，尤其爱唱民歌，编民歌。稍大了点，连旁听的时间也没有了，他担当起了繁重的田间劳动，于是就自学。炕头、地边都成了他学习的课堂，别人念过的书、说本、唱词成了他的课本。有时吃饭、走路还看着书，他成了书迷。看上劲了，就饭也不顾吃了。村东有个黑龙沟，沟里有水有草，还有庙宇，他放羊的时候，把羊打在沟里吃草，自己就在庙里看书、写字。经过这么一段刻苦学习，他成了张家庄唯一的念书人。

一九三三年，李有源弟兄分了家，可分家不久，有财得病死了。为了把哥哥留下的孩子拉扯大，有源又和他们同了家。当时，他的侄儿李增正才十三岁。两家九口人，就靠李有源一个养活。有一年遭了年馑，眼看一家人就要饿死了，他赶了个小毛驴去山西临县贩盐。在通镇装上盐，渡过黄河，到临县贩一回盐，能挣几升米。在路上，他不歇店，不进饭铺，走到那儿歇到那儿，饿了就弄点水拌些用草籽、谷糠、树皮推成的炒面充饥。就这样勉强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可是有一回实在倒霉，本来上了税，也有税票，可盐警把税票撕碎，硬说是私盐。他辩驳了几句，就惹出了祸，不仅把盐没收了，驴也叫人拉走了。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家人贫病交加，睡倒一炕。他痛恨盐警，痛恨地主，痛恨旧社会，他多么希望翻身得解放啊！

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到陕北。李有源听到这个消息，高

兴地说：“毛主席到了咱陕北，咱们有救了，有指望了。”那时候虽然一片白色恐怖，可李有源却从那时开始编起民歌来了。

不久，李有源亲眼看见红军队伍浩浩荡荡开上来，路过佳县城，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他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回到家里，就编了一首歌：

蒋介石，大坏蛋，

不打日本打内战，

祸国殃民卖祖宗，

做尽坏事罪滔天。

毛主席，大救星，

爬山涉水走长征，

救国救民打东洋，

天下百姓齐称颂。

接着，党的民运干部也下了乡，村里谁家穷，他们就进谁家的门。所以，李有源的烂窑洞成了党的干部经常住的地方。这就使李有源有了更多接受党的教育的机会。白天，他们一起扛上老镢头开荒，晚上开会，拉谈抗日的意义，讲革命的道理。李有源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深了。从他的一些歌词里可以看出这一点：

三山低，五岳高，

毛主席治国有功劳，

边区办得呱呱叫，

老百姓齐声颂唐尧。

毛主席他一来，枯树把花开，

旧社会的受苦人因此把头抬，

经过减租和减息，

我们彻底站起来。

叫老乡，仔细听，

咱们都是边区人，

要保卫咱边区，

先要交公粮。

为什么交公粮？

老乡想一想，

几年来打日本，
全靠八路军，
我们老百姓在后方，
才能过着火好时光。

他编了不少的歌，可总觉得没有把自己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特别有一回，他到城里去看秧歌，听见有一个农民唱秧歌时，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他想，把毛主席、共产党比做一盏灯还不够，比做太阳星才最恰当。于是，他在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在编《移民歌》时，就把毛主席比作太阳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的谋生存，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山川秀，天地平，
毛主席领导陕甘宁，
迎接移民开山林，
咱们的边区满地红。
佳县移民走延安，
一定要开南老山，
不过几年再来看，
尽是一片米粮川。

他侄子李增正当了移民队的副队长，随着移民队，这支歌从佳县、米脂、绥德……一直唱歌到延安，后来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就成了后来的《东方红》。

这首歌，唱出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因此，不仅很快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开了，而且有些外国朋友也唱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日本西官市“虹之会”合唱团的黑泽正之方等十九人，给李有源寄来一张他们正在演唱《东方红》时的照片，并联合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遥远的日本，能将你的优秀歌曲，作为我们劳苦大众的来演唱，这真是我们非常欢喜的事。‘东方红，太阳升’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歌曲，我们想，这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歌曲……”

就在编《东方红》那年，他的妻子病亡了，丢下一堆娃娃没有照看，他就当婆姨就当汉，可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创作。他不仅编歌，还编剧，如《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

等，都是那个时期编的，可惜那些东西，被后来采访他的记者他们拿走了，失散了，现在有些老年人只能依稀记得那些小戏里的一些情节，说个大概。

一九四七年，胡匪进犯陕北，李有源积极投身到了消灭胡匪的斗争中。大儿子增堂身体壮，打发得抬担架去了；儿媳妇针线好，他让她天天做军鞋；二儿子增光还小，他让他挽草站羊，对二儿子说：“你把这只羊站得肥肥的，慰劳慰劳解放军。”

当时个别群众看不开敌人快要完蛋的形势，有些灰气，他又编了歌让大家唱：

胡宗南，马鸿逵，
杀害人民真土匪，
别看现在逞凶狂，
过不了几天就倒霉。
子弹飞，枪炮响，
子弟兵赤脚片子上战场，
人民的军队人民爱，
快做军鞋送前方。
你做底子我纳帮，
军鞋做得硬棒棒，
亲人穿上跑得快，
定把胡匪消灭光。

党对李有源创作上的成就，给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一九五一年，李有源第一次以一个农民作者的身份，参加了绥德专区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一九五二年又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创作者代表会议，在那次会上，他获得了奖旗、奖章和奖金，首长们亲切鼓励他，记者们热情地访问他，人们尊敬地称他为“人民歌手”。

在那次会上，大家邀请李有源唱歌，他心里十分激动，即口唱道：

人民高，人民贵，
人民参加文代会，
人民的意见最宝贵，
人民的江山万万岁。

歌声落地，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一口气就唱了好几首歌。从那以后，他编歌的热情就更高了。

从省上开会回来，政府给他安排了工作，先后当川寺、马家沟和郭家圪崂乡担任文书工

作。他虽然当了乡干部，但还和过去没有两样，穿的还是大襟袄，提的还是粪筐子，还是走到处编着歌。在他工作过的地方，他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年仅五十三岁的人民歌手——李有源因病魔的摧残，心脏停止了跳动……

光辉题词六十一年祭

61年前的10月18日，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为中共佳县委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光辉题词。毛泽东一生不知题过多少词，可为一个县委题词还是唯一的一次。

几十年来，中共佳县委把这个题词当作传家贵宝，竖碑于街头，刻石于县委大院，悬挂于会议厅，张贴于办公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县委一班人，提醒各级党委，党支部以及广大党员能牢牢记住这个伟大的教诲，并能时时见诸于行动。

历史反复证明，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自天子以至于公、侯、卿、大夫，无论职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统统应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普世法则。古人用“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对这个法则作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陕北战争又为这个法则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从当时军事力量的对比看，国民党处于绝对的优势，共产党在如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简直不堪一击。但事实却转向它的

反面，国民党反倒不堪一击。为什么？原因就是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人民，它的二十三万现代化装备的军队进入陕北的群山沟里，就像一头瞎驴，到处碰壁，而共产党不足三万小米加步枪的兵力，在同样的群山沟里，却是如鱼得水。共产党和人民已融为了一体，国民党和共产党敌对，其实是在和他的主人——人民敌对。因此，转战陕北的胜利说到底还是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在这一次战争中又一次深深体会到人民力量的伟大。因此，他要告诫中共佳县委，告诫广大共产党员一定要“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关键字是一个站字，“站”必须是主动的，积极的，满腔热情的，毫不利己的，全心全意的，否则，永远和人民是融不成一体的。为政之道，在得民心，人心至愚而神，明鉴如镜。谁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来不得半点虚假。

革命战争年月是这样，经济建设时期更是这样。遗憾的是，在经济建设时期，一些人却忘记了毛主席“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教导，腐败了，变质了，手中只要有尺寸的一点权力，就只知道给自己敛财。他们在和人民共患难的时刻也许可以做到舍生取义，可是在和人民共利的时候，就很难做到舍利求义。如果人人都在那里争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这句话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的，孟子所说的国都是诸侯国，有万乘，千乘，百乘，百乘之国也许还没有现在一个乡的范围大，孟子之前的曾子也告诫人们“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他还告诫人们“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意思是说，为官做了损害国家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是必然要受到严厉惩罚的。

毛泽东“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其深刻的内涵和古圣古贤振聋发聩的语言如出一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对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考验，鲁迅先生说，我们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我们现在依然要生存，要发展。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已经和鲁迅时代大不一样，我们面临的是环境恶化所带给人类的生存危机。由于某些发展不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使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以致成了很难化解的危机。《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个道就是自然规律，就是胡主席所说的科学发展观。弄不清本末，不明白先后，盲目发展，只能给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当前是第一要务。另外，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我们的共同精神家园，亦是至关重要的强国之策。西方人的精神家园是宗教，东方人的精神家园是文化，构建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和谐社会，拯救我们的生存环境，必须从文化、教育入手，这已成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人类走到今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能不能化解这场危机，已成了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人的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早已变成了“物竞天灭，无有适者”，让万物生存的是人类，不让万物生存的也是人类，让人生存的是人，不让人生存的也是人。没有天择，只有人择。这个历史事实不仅教育了西方人，也教育东方人，人们不得不在东方哲人那里寻找人类生存的出路。“万物一体，天地同根”“赞天地之化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东方哲人的思想，这些思想足已化解人类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危机。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具体内容，在当下就是，一要科学发展，二要社会和谐，不以科学发展，必然会破坏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会损伤人民的精神家园。背离了这两点，就背离了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榆林日报》2008年10月22日）

毛 主 席 之 教 子

为了写《毛主席转战陕北》那本书，我们写作组的几个同志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下旬从榆林出发，到外面去采访。四月十三日我同另外一个同志到北京军事科学院去找阎揆要同志。老阎的老婆告诉我们，老阎病了，住院治疗，连她也不让去。我们很失望。在闲谈中得知毛

岸英的爱人刘松林也在军事科学院，这意外的线索使我们很是高兴，因为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很多老同志谈到过毛主席和毛岸英的一些事情，很感人。于是我们立即去找刘松林同志。

刘松林和毛岸英结婚不久，毛岸英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感情很好。岸英牺牲后，刘松林就不准备再婚，为了这件事毛主席给她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刘松林同志至今深切地怀念着岸英同志，她给我们谈的时候，特别是拿出了岸英同志的一些遗物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种非常沉痛的表情。她珍藏着毛主席给岸英的许多亲笔信，其中有两封是在转战陕北时写的，我把它抄录下来。

第一封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写的，那时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著名的沙家店战役已胜利结束，毛主席、党中央进驻佳县的朱官寨。信是这样写的：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信写的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清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的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

第二封信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写的，那时毛主席已经搬迁到佳县神泉堡了。信中有这么段话：告诉你，永寿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从这两封信里看出，毛主席对他的儿子是十分关心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这使我想起一些老同志谈起的有关毛岸英的许多事情来。

一九四六年二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延安。毛主席十分高兴，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后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送你去好吗？毛岸英说：好。于是毛岸英下乡劳动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临走时候毛主席把他自己穿的一套补了补丁的衣服给他穿上。警卫战士备了一匹马去送他，可他不骑，一路上背着行李和干粮，一直步行到吴家枣园。岸英到了农村老老实实拜农民为师，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陕北娃，头上扎着羊肚子手巾，脸晒的黑黑的，手上磨起了茧子，和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深了。毛主席为儿子的这些进步十分高兴。从农村劳动锻炼回来以后，毛主席又让他到清洁大队干活，每天扫院子、掏厕所。岸英不嫌脏不怕累，干得很出色。当时延安生活水

平不高，有的首长叫岸英上小灶，岸英不肯，坚持在大灶上吃饭。还有的首长提出叫岸英干别的工作，毛主席总是说，叫他锻炼锻炼。

岸英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终于锻炼成了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他就毅然离开了祖国，赴朝作战，不幸牺牲。那些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一提到毛岸英就表现出一种深切的怀念之情。原子能研究所延永生同志和毛岸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说，在转战途中，毛岸英白天和他们一起帮助老乡搞坚壁清野工作，晚上和警卫战士一起站岗。后来岸英要到山西去，岸英见他的鞋破了，就把自己的一双翻毛皮鞋送给他，并给了他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了列宁的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岸英是毛主席的儿子，又是大学毕业，俄语学的特好，可没一点架子，就是普通一兵。这与毛主席平时对他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

毛主席在教育子女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可“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邓小平文选《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今天在纪念毛主席的时候，我们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教育子女的，我想是很有意义的。（说明：当时为了安全，岸英改名叫永福，岸青叫永寿。）

俭朴人之美德

一九七八年，中共榆林地委宣传部组织我们几个，撰写《毛主席转战陕北》那本书。我是佳县人，负责写佳县那一段。

四月初我们到北京采访。在军事博物馆看到了毛主席亲笔拟的一份电报文稿。那份电报是毛主席于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六日十二时在佳县朱官寨发给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的，电文如下：

刘邓：

你们全军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给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十二月、一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

电报是以军委的名义发的，毛主席在电文稿上还批了：加发、陈粟、陈谢的字样。

从这份电报里可以想象，我军是在何等困难的情况下作战的。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为前线战士的冬衣问题是如何的焦虑。看着这份电报，在我的脑海立即闪现出了毛主席在转战陕北途中那些传为佳话的俭朴故事。

毛主席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始终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最低水平。他的外衣、内衣、鞋袜总是补了又补，补丁摞补丁。有的单衣成了夹衣，有的穿用的时间过长，不吃针，一插针就是个窟窿。即使成了那个样子毛主席还不肯换新的。毛主席小孩的保姆韩桂馨从山西过来，在佳县吕家坪看到毛主席穿的那样破旧，心想，工作人员都换上了新军装，为什么不给主席换呢？她问老同志。老同志说：“你初来，不了解情况。主席俭朴惯了，不领新的。发了也不穿。”一天，主席拿了一件衣服请她补。她借这个机会说：“主席，你的衣服太破了，都补过好多次了，领套新的吧。”主席笑笑说：“还是请你费心补一补吧，衣服破些没有关系，能多穿一天，就多穿一天。现在是战争年代，我们节约一点，省下来的衣服给前线战士穿。”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号召。主席作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时，穿的还是韩桂馨补的衣服。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在太行地区补充来六百多名新战士，团部在佳县阎家岭住着，在那里开了一次欢迎新战士大会。会前团长刘辉山同志给任弼时同志报告过，任弼时又将这件事告诉了主席。主席说：“我也去参加他们的欢迎会。”于是，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

陆定一同志从神泉堡出发，步行十几里山路到了阎家岭。当毛主席出现在阎家岭的山头上的时候，老战士向新战士说：“毛主席来了。”那些新战士离开太行家乡，带着亲人的嘱托和期望到陕北来，就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他们看到了毛主席，怎么能不激动呢？毛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教导大家努力学习革命道理，熟练掌握手中武器，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优秀分子。战士们边听边仔细的端详着主席：黑黑的头发，浓浓的眉毛，两只大眼睛闪烁着智慧、和霭的光彩，脸上浮现起亲切的笑容；高大的身子穿着一套半灰半兰的旧棉衣，在讲话中不时伸出右臂作手势，胳膊肘上。袖子破着一个口，露着棉花，一只旧棉鞋上开着一个窟窿。有些新战士看到眼前的毛主席和想象中的毛主席完全不同。心想：战士都换上了新棉衣，连他们这些新战士都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毛主席怎么穿的这么破旧？他是毛主席吗？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是不是正确，他们从衣袋里掏出毛主席的像片，从头发、眼睛、脸型直至黑痣等特征都详细地对照了一遍，不禁裂开咀笑着，互相传看着象片说：“啊！一点也不差，这个袖子露棉花，鞋上开窟窿的朴素人，真是毛主席！”

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了一个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听了主席激动人心的报告，同志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第二天正好又是毛主席的生日。同志们觉得主席转战陕北辛苦，现在战局有了好转，应该庆祝一下主席的生日。毛主席知道了同志们的这个建意，说：“很多同志们在前方打仗牺牲了，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一个人祝寿不合理，现在粮食困难，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经毛主席这么一说，大家只好取消了原来的安排，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仅仅多做了一个素菜，表示了一下同志们的心情。

在采访的过程中，每听到毛主席节衣缩食的事迹，我就想，毛主席当时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的生活应该好一点。当时是战争环境，毛主席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工作，穿不好、吃不好、休息不好，那怎么行呢？他对自己那样的苛刻，似乎有点过分。

看了这份电报我明白了，在主席的胸怀里装着千千万万前线的战士，那个时期我军主力已打到国民党区域，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而我们的后方又不能按时供给他们衣服和粮食。因此，毛主席每吃一顿饭，每穿一寸布首先想到的是前线的战士。

战争年代毛主席俭朴，进了中南海毛主席依然俭朴。俭朴是毛主席的持身之符，陪伴了他的一生。他这种品德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现在富了，有钱了，有些人忘乎所以，不知道俭朴的可贵，造成极大的浪费，是很危险

的。浪费事小，败德事大。奢华者，富也觉者不足；俭朴者，贫也常能有余。

俭朴永远是人之美德，还是俭朴好！

毛主席在白云山没有抽签

有一天我打开电视，凤凰台王鲁湘先生正和一位《周易》大师说卦，王先生说他到过陕北佳县白云山，那是一个有名的道观，签很灵。毛主席 1947 年转战陕北到白云山抽了个下下签，周恩来吓得脸色都变了，毛主席却哈哈大笑，说他抽了个好签，理由是转战陕北是最困难的时刻，否极泰来，我们从此要走上坡路了。王先生把毛主席抽签的事说得活灵活现，不得不让人们相信那是真事。

其实，毛主席在白云山根本就没有抽签，周恩来到过白云山但不是和毛主席一起去的，说毛主席在白云山抽签纯属谣传。说毛主席抽签还有另一种说法，也说得有鼻子有眼，在电影、电视节目里广为流传，仿佛也是个事实，只是说毛主席抽了个上上签。说当时刘戡率领二十三万大军，近在咫尺，毛主席处在非常危难的境地。白云山就在黄河边上，一过黄河就转危为安，不过黄河就大难临头，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在神灵前抽了个上上签：日出扶桑，好钱，于是就决定不过黄河了。

这也是个谣传。

毛主席撤离延安前就向全世界宣布，决不离开陕北。当时从表面看蒋介石不仅兵力多，武器装备也很精良，处绝对优势。而毛主席只不到三万兵力，武器装备又那么的差，处于绝对的劣势。但从本质上看，那时的共产党、毛泽东，代表着人民，尤其是陕北人民像保卫自己的生命一样，保卫毛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主席又处于绝对的优势，而蒋介石则是处于绝对的劣势。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在陕北的群山之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牵着敌人的鼻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毛主席主动放弃了延安，刘戡把延安得手之后，不可

一世，长驱直入，很快就走进了毛主席设下的陷阱，可刘戡却一点都不知道，直到青化砭、洋马河、蟠龙三大战役过后，蒋介石才知道上了毛主席的当。毛主席到佳县境内，已为敌人设下了第四个陷阱，那就是沙家店战役。毛主席星夜赶路，不畏暴雨浇头，不怕山洪阻路，终于在沙家店战役前赶到了前东元村，在那么一个不起眼的村子，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战前军事会议。沙家店战役之后，就彻底的扭转了西北战局，不仅在陕北，就是在全国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入了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陕北又成了毛主席的天下，于是毛主席在朱官寨安安静静住了一个月，然后搬到了离佳县城只有十五里地的神泉堡住了下来。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对毛主席已构不成任何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抽了点时间，一方面把江青送过黄河去接李纳，另一方面在佳县城、在香炉寺、在白云山转游转游了几日。毛主席一共到白云山去过两次，一次是览胜，一次是看戏。毛主席于 8 月 16 日进入佳县境内，那时确实危险，8 月 19 日打的沙家店战役。沙家店战役之后就转危为安了。毛主席上白云山已到了 10 月 18 日，那时已不存在过黄河就安全，不过黄河就危险的问题。抽签问神自然也就是无稽之谈了。

我为什么能十分肯定地说毛主席没有在白云山抽签呢？因为我做过十分详细的采访和调查。在毛主席逝世前，我已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毛主席到佳县城时，我虽然年岁还小，但有些情节至今还能记得。毛主席逝世之后，我就有意识地收集资料。毛主席 1976 年 9 月 9 日逝世，同年 11 月 16 日，中共佳县委就把当时的县委书记张俊贤从宁夏请回来，第二日就在人民影剧院作了一次报告，我作了详细的记录，之后张俊贤又在毛主席的旧址，一处一处的回忆，我寸步不离。毛主席第一次上白云山有张俊贤和李德玉（当是县委统战部长）陪同，除过几个警卫战士，没有别的领导同志一同前往，更没有什么道长陪同。第二次是去看戏，那时正好是九月九庙会期间，毛主席从南河底出发，上了山直接就进入戏场，看了一会戏就走了，没有到任何庙宇去过。

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前夕，中共佳县县委宣传部柴汝范部长要我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在写之前我又到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进行采访，老房东、老干部、老道士，只要能找到的线索一个都没有放过。那时，白云山的老道士曹明节、张明孝、康至功等都还健在，从未说毛主席抽过签。1977 年 9 月 13 日我写的《东方红故乡的怀念》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由于这个缘故，榆林地委组织《毛主席转战陕北》写作班子时，就把我选上了，给了我一个全面了解毛主席转战陕北的极好机会。先是在当时的文化局长尚爱仁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八人直达延安，然后沿着毛主席转战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进行采访。78 年 3 月份又转入了外线采访，历时 70 多天，在京、津、吉、鲁、沪、闽、湘、陕、甘等十几个省市，采

访了四十多位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也从未听说过毛主席抽过签。《毛主席转战陕北》那本书搞完成之后，我就被调到佳县文化馆，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毛主席旧居，在这期间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神泉旧居、朱官寨旧居、南河底旧居、题词窑洞等都就行了原貌的恢复。在此期间县委第二次把张俊贤请回来。后来，文化馆派崔仲芳和我专程到兰州采访陪同毛主席上白云山的李德玉，在以上所有的活动中从未听说毛主席在白云山抽过签。

可是，后来有关毛主席抽签的事在电影、电视上频频出现。对此我感到很震惊，这样的事怎么能随便说呢？我原以为一定是白云山的道士为了白云山的知名度而造的谣，于是我就找到白云山的张明贵道长问。张道长说，把无说成有，把非说成是，连普通人都觉得可耻，何况道士呢？不打妄语，是出家人的戒律，这个谣传不是出自道士之口。他说他还听到更离奇的谣传，说毛主席在白云山遇到一个飘飘若仙的道人，毛主席卜问自己的前程，那老道只说了 **8341** 四个数字，便闭上了眼睛再也没有说话，毛主席始终不解其意，便把他的警卫部队叫了个 **8341**，直到毛主席逝世之后人们才破解了那个迷。那个谣言也传得很远，甚至传到国外，有一次他到上海就有人问他那件事。他说白云山根本就没有过那样的老道。

说毛主席在白云山抽签也许是处于一种良好的愿望，作为一种传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作为正史是万万不可的。

晋剧在陕北的流布

晋剧，即山西中路梆子。因兴起于晋中祁县、太谷一带而得名。以后流传于外地，称为山西梆子。

据考，晋剧形成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晋中票号兴旺，商业繁荣。那些富商大贾为了招引顾客，争夺市场，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戏班，借以扩大影响，于是中路梆子迅速发展起来。一些著名演员也就应运而生，到了清代晚期，商业衰败，市场萧条，有许多商号破产，一些戏班也遂之而解散。可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晋剧艺术已经深深植根于人民心中，它脱离了对于商贾的依赖关系也可以独立存在发展，由此，晋剧在山西省就成了经久不衰的一朵艺术之花。

陕北的神、府、佳、吴、清等县，和晋中地区一河之隔，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沿河两岸人民之间的男婚女嫁，非常频繁，而且沿河一带的有些县，如佳县，就曾设过晋宁军（属晋的辖地）。由于上述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为晋剧传入陕北就创造了客观上的条件。陕北，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交通又闭塞，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地方戏。据说，“赛赛”就是陕北流布最广的一个剧种，那种戏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话剧。没有轻乐器，只有打击乐器和唢呐，演说一些很枯燥的历史故事，群众称“老龟子说鑑”。至于清涧一代的道情戏，神府一代的二人合，只是一种地方小戏，它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山西一些潦倒艺人便组成了一些“烂戏”班子，到陕北来唱庙会戏，所谓“烂戏班”就是那些“春夏演、秋冬散，脱帽除须就要饭”的一些临时戏班，即便是那样的戏，也深受陕北人民的喜爱，因为那种戏比“赛戏”高级多了。但是那些著名戏班的戏，陕北人民是无缘见到的。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占领了山西晋中，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投奔陕北——这块抗日根据地来。其中也有不少晋剧名角，如狮子黑、太谷三子、辫子红、元宝黑、十三红、芦头红、明亮子、虎头生、曼庆旦、圈牛旦、金狗旦、小二保旦，还有女角双辫子郭玉兰、肖桂兰等。他们到了陕北就聚集在高九胜的名下，组成了新的戏班子，这些戏班，大都是一些名角，他们的演出立即在陕北这块土地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给陕北人民以艺术上的享受和熏陶。后来，高九胜投降了日本，并企图将戏班和盘端给侵略者。可是，那些艺术家们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他们在抗日根据地演出，受到了人民的热爱，革命的启迪，边区政府的关怀，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又纷纷离开了高九胜戏班，各奔前程。当时，陕北有几个晋剧酷爱分子：佳县大会坪的钞老五、沙坪上的李杰候、绥德雷家坪的雷礼峰和其子雷近生、清涧的黄学富等，先后将那些晋剧演员召集起来组成了新的戏班。这些戏班的演出人员依然是山西人，可是班主已经是陕北人了。人们称那些戏班为“钞老五的戏”、“雷礼峰的戏”，从此不再称山西的戏班了。这些戏班，还排演了许多新剧目，而且在艺术上也有了新的提高。

一九四三年，晋剧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将几个私人的戏班收编为两个晋剧团，即“绥德一团、二团”。从那时起，晋剧在陕北的发展就不仅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了政治基础。那些演员也随之而参加了革命，开始了他们新的艺术生涯。于是，晋剧在陕北这块土地上就深深扎下根来。

陕北地域广阔，只靠一两个剧团很难满足人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陕北人开始酝酿成立自己的剧团了。佳县木头峪村，地处黄河之滨，又是一个文化较发达的村子。几个晋戏艺术爱好者，曹加尤、曹锦凯、苗守先等在自己村里成立了一个晋剧团。

一九四七年，这个剧团有幸给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受到毛主席的赞扬，任弼时代表党中央亚洲部写下了“与时俱进”的题词。以后还有些县也成立了晋剧团，如神木县。

现在，晋剧在陕北已成了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群众最欣赏的一个剧种。

在陕北流布的剧目有 200 余部，经常演出的剧目有：《满床笏》、《美人图》、《五狱图》、《八义图》、《天河配》、《大报仇》、《忠报国》、《金沙滩》、《七星庙》、《九件衣》、《六月雪》、《四进士》、《二渡梅》、《双玉镯》。

折子戏有：《斩子》、《教子》、《牧羊圈》、《空城计》、《断桥》、《双锁山》、《四哭殿》、《二进宫》、《盗玉马》等。

在陕北人民心目中，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演员有太谷三子、辫子红、十三红、曼庆旦、小二保、虎头生、十七生、明亮子、高宝成、元宝黑、二五则、铜锁子、二百五、圈牛、金狗旦、奴则生、俊梅、肖桂云、郭玉兰、双辫子、牛则、三女子、秃巴子、死蒿红等。

现在，陕北不仅有好几个县有晋剧团，而且有了许多业余晋剧团，这些晋剧团不光在陕北演出，还在内蒙、宁夏演出。在近一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中，在唱腔、音乐、锣鼓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全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稿根据佳县晋剧团团长张书成口述整理而成）

中国作家该从那个“死胡同”里走出来了

至今，说起中国小说，言必称“四大名著”。“四大名著”不仅在读书人中有很影响，就是在民间口头也有很广泛的流传。在我那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里，有个叫申世昌的老人，他天天坐在街上讲《三国》，说《水浒》，聊《聊斋》，讲得有声有色，如身临其境，娓娓不倦，年年如此，天天如此，常常聚集了许多人听。我也夹在人群里听，常常忘记去吃饭。上小学是在一个叫店头的小镇，奇怪，那里也有个说古朝的老人，名叫张士孝，此人有

一把银白的胡须，儿时读过《四书五经》，做过私塾教师，中将张达志就是他的徒儿。他讲故事比申世昌斯文一些，讲《红楼梦》，讲《三国》，讲《聊斋》，讲得也是声情并茂。我们这些孩子，是他最忠实的听众，常常让我们忘了去学校。

中国的小说，就有如此神奇的魅力，有如此着迷的说者，如此着迷的听众。就这样，在许多人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热爱小说的种子，到自己能阅读的时候，小说就成了人生必不可少的伴侣。人生在这个世上，知心朋友不可多得，即使有一两个较知心的，也不能经常在一起叙谈。而且朋友中难免一些齷齪之辈，而书则可以择伴而处，圣贤之书说的是道德，学者的书说的是科学，读圣贤的书可以入德，读学者的书可以益智，好的小说，则是把二者融为一体的。读好的小说可以使人感受到几千年来流淌在中国人心里的那股源头活水，可以使人找到精神的家园。可以明理，可以知世，可以养心，可以养性，可以生美感，可以破烦闷，可以长精神，可以奋志气。

因此，人的生活里不可没有小说。新小说里也有好的小说，可总体而言，新小说和旧小说相比就差远了，差就差在文化底蕴上。近代、现代产生了那么多的小说家，可至今还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和“四大名著”相媲美的小说，求其次，能比得上《聊斋》的也没有。从来没有听说中国近代、现代的作家中哪一位作家可以和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相匹，就是仿佛达到上述几位的也没有。仿佛了自己祖宗的没有，可仿佛了别人的倒是看到过这样的评价。中国的作家多如牛毛，可仿佛了拉美或欧洲作家作品的人并不多见。能获此殊荣的中国当代作家，就是中国当今最好的作家了，很可惜，他们仿佛了人家。偌大一个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具有博大精深文化的国度里产生的作家，其作品仿佛了人家。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中国作家很尴尬的赞誉，无异俗话所说，张家生的孩子像了李家。

不知哪一个哲人说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的旧小说，那才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小说，中国的样式，中国的内容，中国的表现手法，中国的语言结构，彻里彻外全是中国的，越是中国的，越有世界性。新小说，是西化了的东西，是失去中国特色的东西。失去了自我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没有尊严的，不会有地位的，难怪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中国人的份，原来，中国的小说，一直在步人家的后尘，步人家后尘的文学，怎么可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呢？中国的小说家，应该早就认识到步人家后尘的文学是没有希望的，那是一个“死胡同”，走到底也没有出路。最好的结果，达到“仿佛”就很不错了。走出那个“死胡同”是中国小说的唯一选择。

中国现代小说和外国小说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可中国的旧小说和外国小说相比就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文学最可贵的就是和人家有不同的地方，如果我们都仿佛了人家，中国

就没有中国小说了。百花园中万紫千红，每一种花都有其特别的姿色和品格，不同的姿色和品格，就是它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上如果成了一种花，那还有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小说，是中国人在自己文化的厚土上创造出来的一种十分奇特的小说品种，这种品种的小说，只有在中国才能产生。因此，也就最有世界意义。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其意是指琐碎的话。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中有九流十家之说，最末一家便是小说。班固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小说虽然是十家之末，孔子却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事实上中国的小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它的可观性，由十家之末一下子跃居十家之首，无论是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还是宋人的短篇小说、明清以来的长篇小说，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以其深厚的古文化底功，虽然写的是白话文，依然是人们最为尊重的文化人，人们十分亲切地称赞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后来的白话小说，慢慢变得没有什么可观的了，原因很简单，后来的小说家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底蕴，高雅不来，只得低俗，越是低俗，越没有可观的东西，越是没有可观的东西，越是往低俗里走，这是当代作家无可奈何的选择，不选择低俗，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悲哀，这不是作家的过错，这是时代的过错，是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这个时代多么需要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中国小说，多么需要自己的文化大师，然而引领时代的文化大师呼之难出。“仿佛”人家，毕竟不是中国作家的追求。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现代小说家写出和“四大名著”一模一样的作品，我是希望能看到在“四大名著”基础上脱颖而出的、区别于外国小说的中国小说。

在中国要作一个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很不容易，因为老子、孔子的高度很难超越，在中国作一个小说家也不容易，因为“四大名著”的高度很难超越。要超越古人，必须要像古人那样，博古通今，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星相医卜，诗词歌赋，文韬武略，人情世故，无所不能，无所不通。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也许可以创造出中国小说来。

中国的作家，该好好去读中国书，下决心从那个西化的“死胡同”走出来，去找回我们的文化之根，找回我们的灵魂，找回我们的尊严。“书读不到精髓处，翰染难达性灵区”。只知今，不知古，只有生活的源泉，缺少文化的源泉，即使是个天才，也很难写出惊世骇俗之作。

关怀道德荒漠

——读刘亚莲文集《我酷我容易吗我》

我曾烧过一本书，那位作家在出版那本书之前就很著名了，那本书出版之后，更加著名，再版了几次，还是买不到书。我是托书店里的一个熟人才买到那本书，可我没有看完就把它给烧了。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孙叔敖埋葬双头蛇的故事。据说，看到双头蛇的人必死。因此孙叔敖把蛇给埋了。孙叔敖把蛇给埋了是怕再有人看见那蛇。我烧书则是怕我的儿女子孙看到那本书。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多么神圣的称号。其实，工程师就是匠人，俗语说，匠人心短，圣人情长。历来就有短心的匠人，否则古人不会造出禁书的词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短匠人造出的“双头蛇”多的是，为了钱什么坏东西都能写的出来。

一月前，刘亚莲就将她出的书名带有一个很前卫的“酷”字的书送我一本，我没读，也不准备推荐给别人读。酷，能酷个什么呢？

有一天，她找上了我问：“老师，你大概没有读我那本书？”我有点尴尬，因为她毕竟叫了我几十年的老师，不读她的书确实有点过不去。还在她十几岁上中学的时候，因为文学的缘故，我们就已相识，在我当时主编的《芦花》上发表过她的一篇散文《枣树的品格》。

好苗子！如果真能有枣树的品格，她会成为一个好样的作家。可在前些年里，我常常见她忙于生意，我便以为她早已不在做文学了。苗而不秀固然可惜，秀而不实，则令人伤感。

丁玲先生有个“一本书主义”，其意在让人静下心来十年磨一剑，甚至用一生的心血写出一本传世之作。如果是那样，理所当然应该受到人们的尊敬。现在出书容易，只要有钱，赖蛤蟆死老鼠，都可以摆在曾经是很神圣的书架上。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酷者就可想而知了。临告别的时候，她又说：“老师，如果有时间……”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我读，我读。古代有洗耳的故事，那个洗耳的人听了不洁的话就到河边去洗耳，正巧下游有个人准备饮牛，得知洗耳的原委后，他便牵着牛走了，怕污染了他的牛嘴。这一回，就是冒着洗眼洗脑的险，也要读那本带有“酷”字的书了。

真出乎意料！

短短几句自序已看出，出手不凡。我几乎是一口气就读完了《我酷我容易吗我》。

好书，难得的好书！真的。

我不敢说她已读过万卷书，可在这本书里，没有一点尘是肯定的。“诚于中而形于外”心里无尘，笔下才能无尘。她所写的正是这些年来，我想写而没有能力写出来的东西。

“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平”（《孟子》），这个人之本，天下平之本，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不行者久也”。我总以为，孔子在《礼运篇》里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人类永远不可企及的理想。真的没有想到，刘亚莲用她非常优美、工巧、抒情的文笔为我们演绎了父母、公婆、妯娌、兄弟、夫妻、儿女之间的一场场孝悌为本的人生正剧。我很感谢刘亚莲为我们写出了这么好的书。

昔时，人们流离迁徙，父不能恤其子，夫不能恤其妇；困苦颠连，内不能顾其身，外不能顾其家，多属战乱时期的天灾人祸，往往不可抗御。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难得的和平年代里，而且经济在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本应该和和睦睦地相处，快快乐乐地生活。可是，子不顾其父，夫不怜其妻，内不能和其家，外不能睦其邻的悲剧时有发生。这些悲剧不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和牛羊，而是文化的失落，道德的沦丧。

当年日本鬼子的屠刀杀了我们的同胞，会引起我们全民族的愤慨，那么，最近看了发生在乾县的儿子杀死父母，在父亲身上留下五十多处刀伤，在母亲身上留下十几处伤痕并抛尸井内的凶杀案，难道还引不起我们全民族的深思吗？

这不是临时性的感冒，恐怕是一种难缠的疾病。

土地的荒漠化是地球的癌症，道德的荒漠化则是人性的泯灭。榆林人在土地荒漠化的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在道德荒漠化的面前，难道我们就束手待毙？

刘亚莲用她的心血，为我们培育了绿色的种子，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家像刘亚莲那样，关怀道德的田园，不要为了几个臭钱，不惜制造出一条条的双头蛇来。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国家干部、士兵都应该成为绿色心田的守护者。在那里遇上了双头蛇，就在那里把它埋葬。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刘亚莲的散文，她的散文更像小说，小说则更像散文，小说中的人物，我没有太深的印象，可散文中的人物，如《叶哨儿》中的男孩和女孩，还有那只叫做“黑子”的狗，栩栩如生，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作者笔下的爸爸、妈妈、婆婆、姐姐、以及第一个姐夫、第二个姐夫、还有那个怀着报复心理只接待科级以上干部的妓女、妈妈的情敌——那个不择手段破坏她们家庭丧心病狂逼害姐姐的坏女人“金牙”等，不管笔墨多少，都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以博大的胸怀给了那个妓女，给了那个“金牙”莫大的同情

和宽容，唯独不能宽恕那些出入妓院大腹便便的贪官，正如她说：“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腐败分子比妓女更无耻可卑，妓女出卖的是自己的身体，而腐败分子出卖的却是他的灵魂与党和人民给予他的神圣权力。”

观其书而知其志。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都和他的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关系。

刘亚莲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贫穷的小村庄——谭家坪村。人们都把黄河比做母亲河，可是在晋陕峡谷，黄河却是暴虐的象征，它横冲直闯，咆哮如雷，将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股脑儿地冲向大海，给谭家坪村留下了一个石头的世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省里的一位高官来到这里访贫问苦，得知这里的劳动力辛苦干上一年，到头来只能分得一升糜子二升谷时，惊呼：此乃世界级的贫困村也！

刘亚莲就是在这个世界级的贫困村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因此，在杨槐花盛开的时节竟然能使她非常地高兴，“生槐花虽然有点涩，但很甜。在那个很少能够填饱肚子的年代里，甜甜的槐花曾一度做过我们难以割舍的乳娘。有槐花的季节，我们的脸上竟然会泛起难得的淡淡的红润来。”

其实，苦难也是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千金难买的财富，刘亚莲从小就和她的父辈积累着财富。大学毕业后总算有了一份工作，总算有能力为辛苦了一辈子的父母敬一点孝心，让她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一个浪头打来，把她刚刚端上的铁饭碗又给打翻了，她不得不下海谋生，商战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暖又给她创造了一个体验世态炎凉、人生百味的极好机会，使她与她笔下的那些人物生死与共，同喜同悲。因此，她才有了“当一个人战胜了苦难，苦难就是你的财富，”“任何不幸与挫折都能成为我们意想不到的一笔财富”的深切感悟。

刘亚莲为什么能坦然地面对苦难？主要得益于她的母亲，因此她才感叹：“民族之间的较量，其实是母亲之间的较量，”人与人的较量何尝不是母亲之间的较量？她有一个十分贤惠的母亲，母亲不仅给了她乳汁的滋养，而且还给了她道德的滋养。

人们往往更多地注意有形的资产，却忽略了无形的资产。那位高官在惊呼世界级的贫困村时，绝对不会想到，这也是一个精神上极富有的村庄，在公路铁路还没有开通之前，运河是中国经济交通的大动脉，在那个时代，北起河口镇，南到禹门口的千里峡谷里，百舸争流，驼群塞道。谭家坪村有过它辉煌的历史。经济的兴旺必定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当经济衰落之后，文化则固守在人们的心灵迟迟不肯离去。更幸运的是谭家坪村奇迹般地保存下了一座稀有的建筑堂皇的天主教堂。开创教堂的神父是西班牙人，学问渊博，道德高尚，他用外来的

宗教教化村民积德从善。刘亚莲虽然没有赶上神父传道的年月，但她从小穿行于教堂的树林，出入教堂的殿门，聆听《圣经》里的故事，领悟宗教哲学。

近年来，随着宗教文化的再次兴起，谭家坪村每年有神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来这里修身养性，传播宗教文化。每周六村里的教徒们都会去教堂诵经做弥撒，刘亚莲不是天主教徒，但她喜欢坐在教堂的一角感受那份宗教特有的庄严和神圣。于是她每每回家，总喜欢到离家不远的教堂去，不是去做礼拜而是为了读书，为了和神学院来的学生探讨学问。因此，在她的作品里，随处可以看到古代哲人的思想火花。

我十分庆幸在佳县这块贫脊的土地上又出现了一位作家，是苦难成就了他。在苦水里泡大的作家，更知甘甜的来之不易，因此，他们捧献给世界的果实也一定是甘甜的。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有人称庞文梓是西北荒漠中长出的一根绿苗。其实，在《高天流云》发表之前他已经成

了一棵树了。只是没有柳青、路遥那么根深叶茂。但他毕竟跻身于中国作家的行列，亦是可喜可贺的。

庞文梓比较幸运。因为他赶上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大潮。断了层的中国古老文化，近些年来慢慢开始复兴了。“木铎”之声不绝于耳，尘封了多年的经典到处都可以看到，甚至佳县山城也办起了国学书院。一些小小年纪的孩子，可以把古书背得滚瓜烂熟，中国文化复兴的春天终于到来了！他十分兴奋，牢牢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把自己的根，拼命地往深扎，终于将自己的根须扎到了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厚土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宋代大儒朱熹《观书有感》里的名句。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根扎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厚土上，如果没有“源头活水”在自己心灵里流淌，即使是一个天才，也休想写出传世之作。他的艺术生命必然是短暂的，作品必然是没有品位的。尤其在中国，十分注重“文以载道”的中国。文不载道、章不彰德的文章，是很难融入中国文化长河的。因此，《高天流云》不管别人评价多么的高，可庞文梓却没有一点成就感。相反，他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为他的这部作品“诚惶诚恐”。如一些评论家说，《高天流云》在榆林是一个里程碑。它其实不是庞文梓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因为这部作品，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时代的浓缩，这部作品和许多“无根作家”的作品一样，很难让人感受到东方文化载华岳、震河海、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气魄和无穷的魅力；很难让人感受到一个作家应有的那种“渊泉如渊”的深沉，那种“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的高远。说到底，也是一部很难融入文化长河的作品。自然界的长河，可以净物，也能自净。文化的长河亦然。可以洗涤心灵的作品，必然会被文化的长河所接纳，否则必然会被淘汰。

真正意义上的里程碑作品，庞文梓正在酝酿之中。我相信，庞文梓在民族文化厚土上汲取了充分的“营养”之后，接受了“源头活水”的滋润之后，他这棵树会更加繁盛。根之深，叶之茂，定会撑起属于庞文梓自己的一片蓝天。

这是历史赋予庞文梓的重任。也是中国作家面临的一次历史性的挑战。庞文梓会挑起这个重任的，因为他是一个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人，又是一个敏而好学、勤奋耕耘的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次小小的机遇，降临在佳县文学青年的面前。别的人没有抓住那次机遇，庞文梓抓住了。刚刚高中毕业，做着文学美梦的庞文梓，有一天来到佳县文化馆。当时我正在组稿，准备复刊《芦花》。庞文梓得到这个信息之后，很快就创作了一篇小小说——《两块小石头》。立意很好，文笔也不错。后来虽然《芦花》又一次枯萎了，可在《芦花》这块土地上破土而出的幼苗，没有停止生长，他们在风雨飘摇中顽强地生长着，如庞文梓、刘亚莲……

是《芦花》使庞文梓走上了文学之路，是《芦花》使庞文梓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出身贫苦，步履艰难，可他从不怨天尤人。他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和屈辱，不怕打击，不畏挫折，十分执着地寻着他的作家梦。经过十几年的辛勤耕耘，终于从《两块小石头》登上了《高天流云》。

“犁牛之子，骅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几千年来，孔子这句话，激励了多少贫家子弟走上了成功之路。庞文梓就是一个犁牛之子，他的成功，定会激励更多的青年人走上成功之路。佳县人也许很少有人记得《芦花》的存在。可是庞文梓不会忘了《芦花》，刘亚莲不会忘了《芦花》，还有那些许许多多热心于文学事业的青年也不会忘了《芦花》。倘若《芦花》能办到现在，一直办下去，点点乍露初锋的芦笋，也许早以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我每每想到《芦花》，便想起萧伯纳的格言，可我很惭愧，我无力把自己的火炬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更谈不到把自己的火炬交给下一代的人们。我只有叹息和期待：黄河空劈摩天壁，过客如云少名题。梦里依稀鸿鹄顾，苍苔丹崖踏雪泥。

去而益咏

2007年4月12日，诗人曹谷溪专程从延安来到绥德义合，参加如璧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好几年不见谷溪先生了，怎么就胖得和吹起来似的，尤其是脸，简直就脱了原来的样子。他说因为病，吃药吃的。我们相互紧紧握着手，好长时间，谁都说不出口来。

谷溪说：“我们都老了，见一面少一面。如璧兄先走了一步，现在，我们来和他告别，不久，我们也将和这个世界告别。人生就是这样，迎来一个个新的生命，送走一个个老了的朋友。迎来，送走，如此而已。莫悲，莫憾。”话虽这样说，可老泪不由夺眶而出。

第二天，我到榆林宾馆拜访他。早上八点钟我就敲他的门，他应声穿着睡衣就开了门，我有点歉意地说：“打扰你了。”

他边穿衣服边说：“没有，没有，这是什么话。”

他为我泡了一杯茶，说是好茶。

本来，我不想再说起老霍的话题，可是一开口就又不由的扯到令人伤感的话题上来。曹谷溪是延安的一面旗帜，霍如璧是榆林的一面旗帜，他们的价值，不只是他们出了几本文集、诗集，更重要的贡献是他们两个影响了这两个地区整整一个时代。延安没有谷溪，也许

就没有路遥，榆林没有牧笛也就出不了庞文梓。他们俩都是那种“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的人。孔子说：“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贫而不可得也；贵而能贵人者，欲贱而不可得也；达而能达人者，欲穷而不可得也。”

他们俩总是那么热心地帮助别人，“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见人有善若己有之的人”，因此，霍如璧的逝世，使多少文学爱好者陷入了悲痛之中。

谷溪说：“我是纳着老命来的，我的老伴走了不久，受了很大的刺激，前不久，我的一个嫡亲去世，我都不敢去，可老霍我不能不和他告别。”说着，他又抑制不住了他的感情。于是我拿出了两副为老霍写的挽联，请他指正。第一副：

如璧无瑕，同日光同月光同星光，光照大漠；

牧笛有韵，似天籁似地籁似人籁，籁绕榆阳。

第二副：

为文崇载道字里行间有正气；

会友贵有德人前面后无虚情。

他接过去看了一会，说，第二副一般，第一副很好，有文化内涵，对仗亦工稳，“榆阳”这两个字得改，不如改成“长河”好，牧笛不只属于榆林，而且属于咱整个陕北，属于黄河流域。于是这副对联就变成了“如璧无瑕，同日光同月光同星光，光照大漠；牧笛有韵，似天籁似地籁似人籁，籁绕长河。”谷溪毕竟比我高了一筹，这两个字简直是点睛之笔，一下就使这副对联到了更高的境界。谷溪说，一个作家，所贵之处不在作品多，贵在精，贵在能传世。搞一辈子创作，哪怕是一首诗可以传世，一副对联可以传世，一篇文章可以传世就够了。然而，可传世的作品太难得了。

如果这副对联真的可以传世，全凭了谷溪的点睛之笔。古时，有一字师之说，而你给我说了两个字，自然是我的两字师了。

谷溪要我请个书法家写好，挂在牧笛先生的书房，用以激励后人。我遵他嘱，请我们县书法家姜继成写好，送给了老霍家。

过了几天，谷溪从延安给我打来电话，问我“鸠首”的鸠是哪一个字，我告诉了。他问什么是那个字？我说，鸠是聚集的意思。他就把电话挂了，事后，我一老在想，谷溪为什么要问我一个字呢？后来我才明白了，他是在还我称他两字师的账”。

二十世纪葭州最后一个儒者

禀山川之灵气，务孔门之真学，古葭州城历朝历代出现过不少儒者。自古“儒为席上珍”，在儒者的影响下，葭州城乡形成了尚诚、尚真、尚善的民风民俗。清代有一个知州在他的诗中写道：

坐卧古洞中， 习静无喧闹。

检点勤簿书， 首举重学校。

其次省刑罚， 幸喜无狗盗。

词讼亦甚简， 十日不一到。

图圉生宿草， 不宪贼趯逃。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盗贼遍及城乡，可葭州虽然地瘠民贫，却没有狗盗之事，狱中也很少关押犯罪之徒，这与葭州儒者长久的教化有直接的关系。葭州的儒者，向来“不为浊富，甘为清贫。毁园就方，去伪存真。成己成物，教泽常新。永矢弗谖，乐道津津。”至今，外地的游客到了山城，还可以感受到葭州人质朴敦厚的民风。

张南轩先生是上个世纪山城最后一个儒者。1942年冬，与世长辞，“从此葭山无儒者，往后芦水少席珍。”从民国年到现在上几十年的时间，读书人很多，可再没有出一个如南轩先生那样有影响的儒者。至今，提起读书人，葭州人言必称南轩。

南轩先生，姓张名应午，号卓亭，南轩其字也。18岁中秀才，20岁赴省乡试，恰逢科举废止，不得已考入西安一个新学堂就读，未过几日，教师就发现南轩之学问在他们之上，不在他们之下，于是就介绍他找了一分工作。干了数月，不甘媚上，回到山城，当上了相当于现在公安局长的官，可他又不忍看官场的腐败，更不愿同流合污，便辞了官，干上了教书育人的事。诗言志，以下几首诗，就可以看出南轩先生儒者的品格：

乡居

深居陋巷乐箴瓢，奋读诗书慰寂寥。

劲松傲雪凭气节，不为斗米去折腰。

自咏

傲骨生成已有年，侯门奔走让人先。

敢云由退求须退，宁唤王前（斤蜀）不前。

抱道亦曾甘淡泊，吟诗徒自苦颠连。

老夫耄矣诚无用，垂钓宜寻渭水边。

有感

白发丝丝一老儒，年年设帐授门徒。

舌耕半世终须敝，口授常时未易糊。

敌手相逢勤博弈，知音未遇懒吹竽。

苟图衣食媚当道，堪笑庸奴不丈夫。

咏雪

朔风吹面雪飘飘，东舞西飞片片凋。

难逢道韞吟柳絮，怎遇摩诘画芭蕉。

归来扫雪迎高士，踏雪寻梅过小桥。

举国黎民遭蹂躏，美丽河山逊妖娆。

南轩先生先后在葭县、山西、神木设帐授徒。山西有一县官，请他教那家的子弟，因他有钱有势，个个子弟都养成了坏习惯。老先生教了一段时间，看看没有一个可造之材，便想辞去。恰巧县官来询问教学的情况，南轩先生没有回答什么，提笔写了一首题为《西宾即事》的诗：

桃李联翩入彀中，呕尽心血却无功。

青藜照读夸刘向，绛帐留芳识马融。

刺目终嫌苍耳子，吹须几叹白头翁。

吾徒不受师儒训，枉费栽培负敝东。

县官看了先生的诗，泪流满面，说：“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我之罪，我之罪！”

后来，南轩先生终于在神木贺家川找到了几个可造之材，在那里一教就是数年，寒暑不归，说：“集天下之英才而教之，我之幸也！”

在教书之余，他喜写诗，集诗成册，名曰《笔墨衣钵》，可惜在文革期间失传。诗集的序是他的弟子贺万选、薛立中所撰。据南轩先生的儿子回忆，序中有如下的话语：“古代文化崇尚儒学，民国初年废除古文，竞尚白话，常此下去，必然断数千年之文脉，毁万代广厚之德基。世人皆随波，惟我南轩先生力矫其弊，教我等以古文。”“其诗其对，对仗之工稳，押韵之巧妙，无人出其右者。”“可惜，一生之心血，大多散失。”先生的弟子中有做了大陆南海舰队司令的，有做了台湾政务院高级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的，也有做了儒商巨子的。

南轩先生晚年在本县泥河沟教书，学校在黄河边上，是一所比较大的学校。当时的小学课本已全部白话化了，先生觉得没有他的用武之地了，郁郁不乐。负责教师武世忠，看出了张先生的心思，说，我知道这浅水养不住大船，你别教学生，就教我们教师。先生觉得武世忠诚恳而又好学，就留下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将自己所学教给武世忠。不久，武世忠就被人们认为是很有学问的教师了。可是中国的启蒙教育，由博大精深变为肤浅狭隘，令先生无比忧虑，终郁郁成疾，怀着莫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现在，葭县白云山白云观的道长张明贵就是南轩先生的儿子。张道长只在小学念了个二册。可他在上小学前，母亲就教会他《千字文》、《三字经》。因为她外爷是个举人，由于家庭的影响，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可有很好的儒家文化基础。8岁时，父亲在玉家洼教书，把他带到那里，用一年的时间，教他《幼学须知》。父亲不仅教他背书，还把里边的典故一个一个讲给他听。那一次学习就打下了他一生的基础。1958年，他居然考上了大学。可他没有去读，依然在白云山做道士。现在张道长已被人们认为是很有学问的大家，常常有国内外的学者、教授来访。1996年6月27日，应英国道教协会邀请，张道长代表中国道教协会率团出访英国，他讲经说法，深受英国同道的好评，被誉为“东方神仙”。可张道长却说，他的基础文化还是儒家文化。每每谈及他的父亲，他就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真儒，其学问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集他一生所学，不及父亲十分之一。

然而追溯更早的葭州儒者，在南轩先生之上者，多的是，不说别的，就清代康熙年间的“葭州八俊”，以及韩鑑、张尔德、张璐，就使南轩先生自叹不如。“莫言陋巷无王道，自古草泽藏圣贤”。就葭州这么一个边远小县城，在古代，也是席珍济济啊！

现在，有些读书人，只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道德，没有人格，更没有创造精神，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儿时没有在经、史、子、集里汲取精神营养。而如南轩先生那样的读书人，无须上大学，无须名师指点，就在私塾里“三更五更，独对青灯影。志向唐虞，学宗孔孟，收拾尽帝典三坟。”就可以满腹经纶，就可以为人师表，就可以有那么高尚的人格，写出那样的好诗来。

中国的孩子在儿时必须读中国书，读中国书不会有错。他们在读中国书的过程中，自然会有博大的胸怀，高尚的品格，自强不息的精神。可惜，中国文化断层多年，要在高等学府外找一个如南轩先生那样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儒者是不可能的事了，现在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让孩子们读原典，悟性好一点的孩子，可以悟出中国文化的真谛。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努力，中国文化的元气也许可以恢复。如南轩先生那样的儒者，也许会在二十

一世纪那些从小开始读经的孩子中间产生出来。（《榆林日报》·信天游副刊 2009 年 6 月 30 日）

葭州才俊李泰业

葭州人李泰业，博学雄才，襟怀磊落，有山水癖。常常携带酒壶，遨游于白云山、香炉峰之间，行歌坐答，吟诗作词，有时醉眠石上，甚而数日不归。为文则笔情奥衍，近柳王之风，更工韵语，词学尤称独绝。康熙年间就以明经闻名，上面屡次让他外出做官，可他就是不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性情疏放，受不了官场，礼仪之束缚，簪绂之拘挛。”数年后，上面通知他到华阴做司训，他欣然答应，恨不能插翅飞去。有人问他又为什么去呢？他说：“三峰名胜，神往多年，今得坐游其地，是天假之年，以消吾烟霞之癖也。”

到任后，公事之余，信步登山，或呵松下，或啸峰头，或谈经于野寺，或瀹茗于僧房，诗作信手拈来，好不快哉！有一天来到了玉泉院，听到那么多孩子的琅琅书声，深受感动，欣然命笔写下了《朝元歌四阙》：

云影月影，都是春云径。山形水形，造就蓬莱境。三峰耸翠，万壑连声，那件非读书趣兴？任吾纵横黄卷青灯莫暂停。五车蕴胸中，祥云笔下生。万里鹏程，才不负少年光景。

俗离世离，才是读书致。山奇水奇，生就图南地。眼底烟霞，空中云石，尽都是文章奥义。放开一腔漫收拾斗斛珠玑。笔高天柱低，砚吸凤凰池。包天罗地，莫辜负三峰灵气。

山清水清，莫负韶光景。三更五更，独对清灯影。志向唐虞，学宗孔孟，收拾尽帝典邱坟。穷通有命人心肯为天地从。日进广寒宫，云程不暂停。奎聚东井，急早攀一枝红杏。

笔光砚光，直射云霄上。心忙意忙，难了读书账。虎啸龙吟，鸾翔凤翔，这才是苦中景象。紫绶金章方显得男儿志量。君德也要襄，国事也要襄，勋猷无量，直勒在凌烟阁上。

四阙歌词，龙飞凤舞，落于纸上，锦心绣口，铁画银钩。令寺僧惊叹不已，以上等墨宝宝之，并将《朝元歌》和他别的诗作一并镌刻在石壁上。后有学使冯翊游西岳，看到李泰业的诗词，喟然曰：“此当世之陆放翁矣。”

可惜，他的诗作没有留传下来，成为葭州人的千古之憾。

李泰业最要好的朋友，一个叫张金佩，一个叫刘珏，此二人皆葭州才俊。康熙十九年，一代大贤叶华岩，督学陕西，不遗余力，搜罗名士。在葭州喜得八士：张金佩、张中光、张奇猷、屈自超、申大策、张显周、刘珏、曹恒泰。叶华岩得了这八俊非常高兴，刊布全省，从此，此八俊名震关陇。正如《八俊碑记》说的那样“豫樟之才，不自言其良；荆山之璞，不自鸣其宝。一旦郢石采之，卞和珍之，有一知己即可千秋无恨矣。”

然李泰业之才又在八俊之上，不在八俊之下，却未成国家之栋梁，成为千古之恨。李泰业歿后，刘珏痛哭灵前，挥笔写下一首诗：“一朝竟作修文公，五浊长辞入梦中。门外纸灰蝴蝶白，柩前血泪杜鹃红。从今尘世无长吉，此后云山失放翁。平地遽将黄卷掷，教人徒感白杨风。”张金佩在他的《思旧篇》中亦写道：“李君古人风，昔余忘年交。道貌肃可钦，正学端无偶，世儒轻论文，入眼辨妍丑。经史为资粮，宝玩絀琼玖。朝去登君堂，清谈日过酉。扃虱旁无人，骂座或使酒。诗成自拈须，一字一俯首。穷饿数十年，从不窥户牖。亦蒙国士知，振铎太华右。地当山水选，人与土风厚。曠眈徐为醒，大小从所扣。有暇便著书，藏副名山久。借此乐余年，岂曰干升斗。岁月曾几何？人琴忽乌有。试问莲花掌，笙鹤宵游否？太息典型亡，谁继斯文后？

有谁如果到了西岳华山，请在石壁上留心搜索，看能否找到他的诗作。李泰业，字金铉，也叫李金铉。（《榆林日报》2009年12月18日）

去思碑

在河南开封府，府城东街曾立过一块碑，其名曰“去思碑”。碑文写的好，字写的好，碑文中写的那个人更好。有人把那块碑和“岷山碑”相比。过往的人看着那碑文，想着碑中人无不为之挥泪。

碑中有一段话，现在读起来也十分的感人：“毓秀于葭山芦水，拔帜于鹿苑鸡坛。大智若愚，长材短驭，鸾凤棲乎枳棘，膏雨注于嘉禾。救涸辙之鲋鱼，活沈波之蝼蚁。冰心不为例染，铁面不以势移。”毓者，育也。其大意是这么一个优秀的人物，是葭山芦水培育出来

的啊！一旦做了河南判，就把邪恶势力铲除，树立了正义的旗帜。此人大智若愚，就是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官也是大材小用啊！好比鸾凤落到了灌木丛中，大雨降到了广袤的禾田里。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如车辙积水中的鲋鱼，就像水波淹没的蝼蚁，多么渴望有人能解救啊！然而一任一任官的良心让利污染，一任一任官的脊骨被豪权所屈折。唯有从葭州来的这么一个官“冰心不为利染，铁面不以势移”，解民于倒悬。

这么好的一个官是谁？就是高宁远。此人哪里人？陕西榆林葭州人。他是明代一个选贡。选贡在当时就是第一流的人才，几年才选一次而且名额特少，一个州只选一两名，必须德才兼备，选上之后还要经过乡试殿试，真是万中选一！一旦被选上之后就可以做京官，也可以到府衙做官。高宁远从小不凡，被人们誉之为“德器”，文章又做的大气，“淳雅汪洋”，在那个时代高宁远在葭州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物。然而此人很谦卑，真正有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的品德，从不张扬、狂傲，处人接物“循循如处女”。自从选贡之后，宁远就没有安宁的日子过了，上面经常来函让他出去做官，可他就是不去，每每以孝养父母为由，“屡却征聘”。双亲歿后，依然无意出去做官，但上面催的更急，加上亲戚朋友轮番的劝说，真可谓“外逼于简书，内恤于人言”，这才出任河南判。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高等法院的院长之职。子路片言可以折狱，高宁远立时就可以断案。在他上任前，府衙积案如山，怨声载道。高宁远做了河南判不久，就将许多积案处理完毕，不仅得到上面的器重，而且也得到民众的爱戴，一时高宁远就在河南出了大名，都以狄公相比。于是别的州邑有了疑难大案也来求助于他，邻邑有一大案，株连了不少人，由于这个案子，弄的被牵连进去的两邦人“械击数年”，事态越来越严重，上面就派高宁远去处理。高宁远接了案之后“立雪其冤”。

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到他解任之后，人民还在思念着他，于是就在街头立了“去思碑”，以表河南人的怀念之情。就因为高宁远在河南德淳名立、行端表正，使葭州人在河南人心目中享有盛誉。直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有不少河南人挑着货郎担，在葭州的城乡做生意，有的还在葭州成了家落了户。

当时有人就把“去思碑”比作“峴山碑”。“峴山碑”也叫“坠泪碑”、“峴首碑”。晋时的羊祜任襄阳太守，因为官做的好，离任之后人民还一直在怀念他，于是就在羊祜经常游憩的地方——峴山建碑立庙，每逢节日，就有不少人去飨祭，人们看到那碑无不落泪。唐代诗人李陟诗里就有“歇马独来访故事，逢人唯说峴山碑”的句子。李商隐也留下了“湘江竹上痕无限，峴首碑前洒几多”的名句。

“去思碑”立在了街头，咏诵的人一定更多，可惜无法找到有关记载。

“去思碑”表达了人民的一种深切的怀念，也是一种热切的期盼，怀念那样的好官，期盼能有那样的好官。这种怀念和期盼可以追溯得更远。《千字文》里有“学优登仕，摄职从政，存以甘棠，去而益咏。”说的是周代的召公，在甘棠树下，不辞劳苦，断案理政。召公虽然离开了那里，可老百姓一看到那甘棠树就想起了召公，就感到格外的思念。于是就把那甘棠树保护起来，不仅人不能砍伐，牲口也不能侵害，充分表达了“去而益咏”的情怀。

古葭州曾有过两个古怪的地名，一个叫“八个碑”，一个叫“三个碑”，那里原本没有地名，立起碑之后，就以碑的数命了名。

据老年人回忆，“三个碑”是葭州李府的族碑，而“八个碑”是葭州人的公碑。那八个公碑都是历代葭州人在外地居官，有很好的政绩，当地人给他们立了碑，葭州人就把那些碑文移回来刻石立碑，以励后人。“去思碑”就是其中之一，可惜现在看不到那碑了，作为地名，依然存在，但用不了很久，地名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消失的东西往往是很珍贵的，因为当时的人不认为它珍贵，就让它随意的消失了。《尚书》中有“人唯求旧，器唯求新”的话。在我们求新的时候，往往把旧的东西推倒了，旧的东西不一定都坏。今天新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就成了旧，其实，有些东西是没有时空的，因为我们人类有时空的概念，才分成了新旧，这就给人类造成了许多的遗憾，有些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就如“去思碑”中“冰心不为利染，铁面不以势移”，不仅今天没有旧，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旧。

张梧岗及其自寿古风六十四韵

张梧岗名凤翼，梧岗其字也。明嘉靖二年出生于葭县木头峪村，享寿八十又五。此人是葭州一代奇才，由于不拘时代风气，七次乡试皆名落孙山。第七试不得不揣度世风，阿时应试。试毕自信必中，然而榜发却没有他的名字。按惯例，发榜的第二日，监考官要把考卷发给诸考生，让考生知道自己试卷的瑕疵。奇怪的是居然找不到张梧岗的试卷。他百思不得其解，总想弄个明白。有一天，正好主考官去拜谒宾客，张梧岗突然扑上去扳住车舆大喊大叫，问他的试卷落于何处？主考官以为是一个疯癫之人，勃然甩袖一呼，让手下将此人拿下！就在他甩袖之时，有一物从袖袂间飞出。拾起一看，正是张梧岗的试卷。原来，此卷他早就看了，觉得非常好，爱不释手，便装入袖中，准备推荐让别人欣赏。明代服装衣袖甚宽，半口缝着如一袋囊，换了衣服时，却没有把试卷取出，后来他到处找，怎么也想不起放什么地方了，几日来为此也大伤脑筋。今天试卷突然从袖中飞出，这才追悔莫及。主考官觉得可惜，对不住张梧岗，但皇榜已发，他也没有回天之力，只得向张梧岗道歉。张梧岗赫然归家，从此再不去应试。那一次落榜使张梧岗十分的气愤。气伤肝，肝主目，从此使他的双瞳有了翳障，视力大减。然而与此同时张梧岗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葭州郡守，进士出身，自恃有才，

便想试一试张梧岗，于是就把张请在郡署。时值盛夏，张梧岗视力更差。郡守让差役拿题给张梧岗看，梧岗还没看清就把题撤了。题只有三个字，他只看清一个“而”字，别的两字不知是什么。但他揣度郡守心理，推断应是《论语》中的“恭而安”三个字。梧岗不假三思，拈毫立就。郡守阅毕，佩服得五体投地，惶然曰：“有才如此，何为困耶？”梧岗曰：“此诚前身之罪孽乎。”郡守平时很暴虐，荼毒绅庶，不择手段，牢狱里关了很多，叫苦连天。因有感于梧岗的话，把牢里不该关的人都放了，一时传为佳话。张梧岗的作品很多，可惜流传下来的很少。他的事迹被收在《隐逸传》里，声名远播。

此六十四韵自寿古风大概是张梧岗八十岁以后的生日所作，敬录于下，供同道欣赏：

虚度浮生七十春，行藏窃慕古希英。

而今杖国经一载，瓚承宏业荷世勋。

正是八九应芳节，茅屋呈祥衍琇璫。

三寅又添增岁月，遐筹重经器宇新。

论文羞拟金玉客，视履常逢把钓翁。

拊缶静夜消疲憊，长歌采薇嗣好音。

进取尼山三益训，退学陋巷四非箴。

拭目云飞怆感切，举头旭日慕渊深。

显赫功名竟未就，丰满雨露不沾恩。

鹿豕追随挨暮景，林泉偃蹇听猿吟。

盘桓华嶽胸襟阔，突兀高岗契晤真。

闷来呼得儿孙戏，兴到须研赋一通。

僻渠隘谷绝尘扰，课子诒孙宪祖宗。

人皆闹市趋奔走，我独邱园守大旬。

试看轰隆逐末态，茫然一点曜晴空。

特立嵩巔回首顾，常情罕与岁暮争。

余今七十四甫过，贺庆蟠桃垒盘盈。

争羨余年七十五，山童野叟拥柴门。

幽居元洞仍还数，七十频旋又六龄。

历叙攸躋七十七，洪图好增年岁新。

文心回还凝造化，真机不断守元根。

瑶阶早祝音容盛，屡添海筹劲节雄。

荆室瓶开捧菽酿，童郎粧彩戏银屏。
仰瞻星回玊玉转，对闋兰阶桂成林。
眼前铺锦随时尚，腹里经纶祇自怜。
低唱鹿鸣恒负惭，高歌天保九重城。
冠裳酬酢几筵内，日月照临堂构中。
迪德永思孔颜训，修身长慕杏坛风。
淡泊清贫延晚节，肯将遗咏伴樵声。
笑谈今古无俗韵，悦怿词章接老彭。
敦仁讲义多自得，炎凉世事任升沉。
微编俚律研精密，始叙荒谈乐余生。
自问鹤发又增岁，扶杖无力亦感伤。
春来好伴山头杏，秋去金剪菊花香。
笑看蘭房多桂壁，箇箇寢床喜弄璋。
宾朋乐咏南山寿，九九重阳又添觞。
安梨火枣来山客，瑞云彩霞绕长廊。
骨骼清奇形貌古，携得儿孙賡麟祥。
梧亭此日非初度，何事芳声到远乡。
遵循河滨多令绪，盈庭和气无短长。
每忆功名成往事，老来莫说利宾王。
家传诗礼唯一教，绵绵延延乐羲黄。
淑气温风吹矮屋，薰弦披拂坐玉床。
暗数风花飞片片，堪笑河水势洋洋。
浮生何如风花少，名利岂似河水多。
闲中不言人是非，兴来惟有乐池塘。
欢娱尽日胡能御，携手蹁跹胥醉狂。
秉心塞渊无双衷，不管轮回日月忙。
现今八十成上寿，旋见俾炽复俾昌。
粉蝶飞飞花间舞，呢喃燕子巢我堂。
耕读开先绍基远，荫庇蘭桂福无疆。
八十年来多自在，凝眸犹见字堂皇。

月吉幸逢举觞日，仙风飘飘吹我裳。
抱素信是劲骨古，不作人间草头霜。
残篇断简多推理，文明气象绕扶桑。
高山流水景物好，座里飞红鬪梅粧。
眉宇真如瑶台客，意气不肯到北邙。
远水兼天淘湧浪，蓬荜冰轮衍玉光。
立德立功原无际，希圣希贤意颇顽。
从今莫接游宦客，桃李两行自能芳。
金昆玉季多成就，攀龙附凤不可当。
村落萧条物数泯，溪岚傍水韵悠扬。
勿谓偷闲多吟咏，千载陶潜与翱翔。

读完这首长诗，一个隐逸者的崇高形象便出现在读者的眼前。他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是希贤希圣，“进取尼山三益训，退学陋巷四非箴”的初衷不改，过上了“春来好伴山头杏，秋去金剪菊花香”的隐逸生活。他敦仁讲义、课子诒孙，世事炎凉、人事升沉对他来说已没有了一点作用，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他的人生成了一个真正能成就自己人生的人生。甚至许多慕名来访的“游宦客”都不想接见。他在他这么一个僻渠隘谷，没有尘世干扰的地方，“迪德永思孔颜训，修身长慕杏坛风”，“暗数风花飞片片，堪笑河水势洋洋”，“抱素信是劲骨古，不作人间草头霜”，“金昆玉季多成就，桃李两行自能芳”。这样的生活多么自在啊！多么满足啊！他自期希古，自比陶潜，没有“功名”，胜有“功名”。愿葭州人记住这个张梧岗，将这首诗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塑葭州人的形象。

碧山屏风

从葭州古城北门出去，有个一步塢口，在此，一剑挡关，万夫莫开。过了塢口，陡然突起一座石山，就是炮台梁。炮台梁是葭州北门外一处城防要隘，就象一道屏风守护着山城。清代同治年，韩垠在路边的石壁上题了“碧山屏风”四个大字。从此，古葭州便多了一道风景。凡到葭州的文人雅士都要到炮台梁看看韩垠的字。

韩垠，字琴舫，是葭州城里人。其兄韩塘，字莲舫，是清代的内阁中书。兄弟俩一样聪明好学，尤爱书法。在葭州城若论书法，明代要数柴牛山，清代就数高承继。高承继的书

法，不仅在陕西省有名，在山西太原也流传很广。山西晋商商行的好些牌匾都出自高承继之手。高承继在葭州城也留下不少字，最有名的就是“观音阁”三个字。韩氏兄弟十分敬佩高老先生，常说，练字能练到高老先生那样，足矣。

有一年韩氏兄弟准备给家严祝寿，作了一篇寿序，兄弟俩谁也不敢写，便请来了高老先生。韩氏兄弟每天美酒佳肴伺候着，可高老先生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眼看鹤寿在即，尚有一段还没有写好。不巧的是高老先生又病了，韩氏兄弟又不好催，只好等。等呀等，实在不能再等到了，韩塘只得亲自动手连夜把寿序补齐。

第二天，就是韩老大人寿诞之日，有赠联的，有祝贺的，热闹非凡。就在这时，高老先生来到韩府，见寿序末尾一段已被别人写了，心里很恼火。韩氏兄弟已有觉察，不知对高老先生如何表达自己的歉意。高老先生说：“写得好啊！狗尾续貂，真好。”说完沉着脸走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韩氏兄弟受了莫大的侮辱，好久，郁郁不乐，也很少读书练字。父亲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说：“尔等忘了孔老夫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诲了吗？高先生系我至交，他是在教训你们，让你们愤发，你们还不明白吗？”

韩氏兄弟恍然大悟，从此排除各种杂念，专心练字。当时，葭州城的居民都吃葭芦河上的水，水是浑浊的，家家户户过十天半月，就要掏瓮底上的泥糊糊。有一天，韩塘掏出一盆泥糊，发现泥糊十分的细腻，就象研好的一盆墨，他拿了一支秃笔，试着写了一下，感觉挺好。从此，兄弟俩便把平日写过的纸用泥糊写。泥糊写过，又用墨写，用墨写过再用泥糊写。一张纸写过好多遍才肯罢休。

就这样练了三年。有一天，韩垠说：“兄长，我看你的字已超过高老先生了。”韩塘说：“不可自诩，好不好要众人评，要后人评。为兄有个想法。高老先生在观音阁留下了三个字，咱们也找个地方留下几个字，让众人评述评述，不然，我们就永远成狗尾了。”韩垠说好。

于是他们便在炮台梁请人凿出一块石壁，刻上“碧山屏风”四个字。

高老先生听人说，韩垠在炮台梁题了几个好字，看的人很多，都说好。高老先生一生好学，哪里有了好字，就是不吃不睡也要去看，他已上了些岁数，炮台梁离他家还好有一截子路，可他不管，一个人拄着拐杖去了。恰巧有几个人也正在看，他们边看边议论。一个说，这字超过了高先生的字了。另一个说，恐怕不行，你不听“狗尾续貂”的故事吗？高先生看了许久，说：“后生可畏，龙头凤尾。羲之再世，葭山增辉。好，好，可喜可贺。”

高老先生没有回家，直接走到韩府求字。那时，韩塘已进了京城，做了内阁中书。韩垠推辞不过，只得写。至今，高家老宅庭院二门门头匾上留着韩垠“恺元居”三个字。高老先生也题了三个字“有余庆”。令人不得不对高老先生钦佩的是，他把韩垠的字放在正面，

把自己的字放在背面。

这一段笔墨佳话，至今在佳县流传着。古人那种种致学精神，那种豁达的情怀，真值得后辈人学习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建佳榆公路，炮台梁上开山炸石，炮声隆隆。我看见那字就要被炸掉了，很着急，便去找当时负责改建公路的马旭耀副县长，恳求想办法把字留下。马县长当即表示一定保存下来。葭县古城把多少文物古迹毁了，“碧山屏风”能保留下来，实在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啊。（《榆林日报》·文化陕北 2009 年 11 月 30 日）

《一鳞半爪》序

张明贵道长年逾八秩，鹤发童颜，白须飘逸，气宇不凡。素有过目不忘之能，入耳强记之力。尤善诗联，喜作谜语。其作品皆信手拈来，张口即就，从不落稿。古人云：“化当代莫如口，传后世莫如书”，道长有化当代之口，无传后世之书，诚人生之大憾也！

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倘若世无道德五千言，谁知老子？安有道教？张道长虽不可与老子同日而语，亦可算白云山立观四百余年中，不可多得之高道。道长非无言者也，倘若伏案于几上，推敲于月下，并落笔于纸上，其著述岂只等身？惜乎！道长脍炙人口之作，多乎哉！然再过数十年，必将无传矣！

道长，我之良师，亦我之益友，每每提及此事，不仅道长有后悔莫及之痛，我亦有爱莫能助之叹。道长一心向道，而我则许身于儒。时日苦短，任重而道远，实难分身助其编辑成书，此我之深愧者也。

幸哉！姜继成先生将此事成全。2010 年元月 23 日，道长同姜先生拿着书稿，要我作序。展而览之，不由我为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呜呼！此非道长传世之作哉！我之夙愿也，是可序矣。

洋洋数十余万言，皆历年即兴之作，无一字落于纸上，全凭回忆打开记忆之尘封，将埋藏于心灵深处之宝一一挖掘出来，如是常人，万万不可能也。然而仅仅三个月，而且此三个月还不可以天天用之于回忆，然而就这样子书稿却奇迹般编注完毕。人脑乎？电脑乎？神脑乎？

书名《一鳞半爪》，我窃思，其中或有道长自谦之意，言此作，不足登大雅之堂；或有道长自负之意，言此作，不过冰山之一角；抑或别有深意，言此作，乃道之一鳞半爪也。昔孔子赞老子犹龙，老子者，道之化身也，老子犹龙，道亦犹龙。我以三或请道长开示，道长笑而不答。其实，不答亦是答。凡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者见愚，自古皆然。我之揣测，不亦惑乎？

刘勰《文心雕龙》说，道有文，动植皆文，形之则成章矣，声发则文生矣，皆自然耳。“夫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与？”

人皆有心之器也，为文必文。孔子文言，文言之祖也。文之无文，传之不远。文也者，外饰之谓也。饰之过，反而为丑。道长之文自然之作也。自然即美，美全在于自然。由此可知道长深知作文之道矣。

道之为物，无时不在，无处弗届，道长为文亦然。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人间仙界，三教九流，梨园乒坛，应有尽有。一则谜语，令人费解，忽然破解，捧腹大笑，笑过之后有所悟；一首小诗，一副对联，微言大义，蕴含深刻，让人深思，思而后有所得。此包罗万象之书也。不会诗，读后能诗，不会联，读后能联，不会谜语，读后可作谜语。姜先生，深知道长者也，亦深知诗、联、谜语者也。其注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与道长之作珠联璧合，浑为一体，诚可读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海纳百川，必具无量之量。道长博通经论，学富五车，诗联谜语，喷如泉涌，令诗联大家叹为观止，我等初学，更是望尘莫及。

1974年，批林批孔之风席卷全国。我，一介无知之辈，居然妄想批《白虎通义》。此书，东汉班固所撰，乃儒之经典也。我非但读不懂，连句读都一无所知。于是四处讨教，可找不到一个章通句解者。最后有幸找到张明贵，令我大开眼界。一个只长我九岁，而且只上过小学一年级之人，居然可读懂许多老年读书人难以读懂之书。岂非天才乎？原来还在母乳之时，其母就教他《三字经》。外爷是个举人，很器重其父张应午。应午二十岁赴省乡试，恰逢科举废止。于是不得不以舌耕糊口。张应午亦善诗联，著有诗联集《笔墨衣钵》，该书扉页印有“压倒元白”四个字，足见其才学之富。张道长从小受其父良好之教育，上小学前就将《幼学琼林》、《弟子规》、《三字经》、《鉴略》、《千家诗》烂熟于心，使其打下良好之基础。稍长读《三国》、《水浒》、《红楼梦》、《东周列国志》、《史记》、《汉书》，使其博学强记。做道士之后，每天早晚课诵读道家经典，使其知天知地。苦不堪言之道童生涯使其读懂社会，人情练达。云游四方，使其胸怀广大。参访高僧大德，使其大彻大悟。访西方诸国同道，使其心怀天下。

孰有如此之阅历？如此之经历？如此之游历？孰又有如此之记忆力？我看《一鳞半爪》，确是一鳞半爪。我盼望能看到续集，看到全集。我更盼望读此书者有所悟，即使一鳞半爪，不亦乐乎？

为张福昌的记忆画而作

摆在我面前的这些画，似写生又不是写生，不是写生又似写生。我这样说，是因为画中的景观早已不复存在，要说存在，也只是张福昌先生记忆中的存在。倘若画中的景观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古葭州肯定会被今天的人列为人类历史文化名城而倍加保护。然而，就这么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寨式的山城，被愚昧毁掉了。

看着至今还残存下的历史痕迹，今天的人谁能不痛心疾首呢？二十一世纪，世纪之初，有一个从外地来的老人，他说他到过好多地方，当他用一个历史文物专家的目光把山城进行全面考察之后，发出这样的惊叹：这座古城要是不被破坏，比山西平遥的价值高的多，即使现在得以恢复，依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奇观。于是，他拿着张福昌先生的画——《葭州古城》，到处奔走、呼吁。然而，毁掉容易，恢复难啊！经过几年的努力，毫无效果，老人只得怀着莫大的遗憾离去。可是，土生土长于山城的张福昌先生却依然做着恢复古城梦。他不停地画，

画出一幅幅令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中的画。他说他老了，看不到恢复的那一天了，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将自己的记忆留给后人，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说来，人是很可悲的，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把什么事都可以忘掉，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来的，这么一个原本不该忘了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倘若当初，或者之后，有人如张先生那样把当时的情景，或记忆中的情景用文字或画记下来，何用达尔文苦思冥想出一个“进化论”来呢？很可惜，没有人这样做，或者做了，没有能一代一代传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先生这些画也可称之为画中之极品了。

文明启迪愚昧，愚昧吞噬着文明，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真实历史。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到处都在除旧布新。许多存在，今天还是真实的存在，到了明天就会变成记忆中的存在。因此，张先生虽然只比我长几岁，可他的记忆就比我丰富的多，而且他是个有心人，又善画，能把自己的记忆变成可观赏的存在。他的这些画不仅可以唤起许多老年人更多的记忆，而且可以给许多年轻人无穷的想象。他不为名，不图利，一丝不苟地为恢复山城原貌做着贡献。在当今的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张先生这样的文化老人，也应是人中之贵器了。

古人在营造肉身家园的同时，也在营造着精神家园。古代的葭州虽然地瘠民贫，可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努力，终于建立起了自己极为富丽的精神家园。文庙、武庙、二忠祠、白衣殿、祭孤坛、观音阁、普照寺、白云观等二十七座庙宇，构成了儒释道三教共光的一个十分和谐多元精神文化体。这个多元文化体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她使葭州的官清正廉洁。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个叫秦丹的知州，勤政爱民，民谣颂之曰：“只饮葭芦一勺水，从来不爱半文钱”；她使葭州的读书人“成己成物，教泽常新，永矢弗谖，乐道津津”；她使葭州的人民“无狗盗之事，少诉讼之争，有邻里之和，多亲友之宜”，总之她使葭州人不管走到哪里，俯仰无愧，堂堂正正傲立于天地之间，那是何等的气象！

孔子是人类精神导师，关羽是义的化身，二忠祠祭祀的是两位为国捐躯的宋代守城将领，是忠于国家的典范，他们都是血肉之躯，都有成功的人生，因此，被人敬之为神。城隍爷一年三次出府祭孤，施食，安抚的是那些孤魂野鬼，孤魂野鬼尚且如此，而况于人乎？白衣殿为人演绎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妖魔尚有忠贞不渝的爱情，而况于人乎？至于节孝石坊，张扬的更是乡闾之美德，人间之正气。如原观音楼底的石坊上就刻着这么一副对联：

生不贰天烈日严霜争皎洁

死犹同穴葭山芦水共辉光

以上种种可知，精神家园的主人，是人而不是神，享受人间香火的神也是人而不是神。

儒释道原本都是教育，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就是通过教化使人能成为人。这是精神家园存在的全部意义。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为了肉身的家园去毁掉精神的家园。须知，没有肉身家园受的是肌肤之苦，而没有精神家园则受的是心灵之苦。精神家园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往往需要某些特殊的历史机缘，因此，精神家园的建立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但愿张先生记忆中的画能早日变成真实的人文景观，但愿那些人文景观能重新注入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内涵。这不仅是张先生的祈盼，也是葭州人的祈盼。（《榆林日报》2007年11月10日）

《韩晓峰硬笔书法集》序

韩姓，古葭州望族，代有闻人。或以文章著，或以德行称，可传可法，不乏其人。我的高祖韩塘、韩垠，皆清代书法名家。韩塘尤为著名。咸丰辛酉科，考授中翰，供职都门，敕授文林郎内阁中书。一时文字风雅，籍籍京华，宰文衡者，皆以名手笔相器重。厥后，韩氏列祖列宗中虽无名德重位者，然世世不改书香门第。民国初年至今，韩姓族大丁繁，虽有不少上学者，然知诗书者，善文墨书画者甚稀。我读书十余年，因儿时未曾读诵古文经典，至今头发苍苍，腹内空空，徒有虚名耳。韩氏世代书香之慧脉，断之我手，我之罪也。

我常对我的儿女说：“‘藜藿有余终为孝，诗书犹在莫言贫’，此句是我们的老先人留下的至理名言，我未能践行，令我悔恨不已。尔等，尚在年轻，万莫重蹈我之复辙。”所幸儿女听话，不仅自己开始攻读古文经典，且能教其子女从小诵读。每每听到儿孙琅琅书声，我便感到格外欣慰。薪已尽，火犹可传，此又是韩门之幸也。

韩晓峰是我长子，似乎更有悟性。从小喜好书法，尤其喜好祖宗留下的墨宝，经常读，经常以帖临之。1997年12月，连参“97中国硬笔精英大赛”、“鹤城杯”、“书堂山杯”、“红枫杯”四家赛事，全被入选，并编入《97年中国硬笔书法精品集》、《当代书画人名作博览》、《中国当代书法艺术人才精品大典》。随后，成为东方书画协会会员。近日，在其习作里精选出几十幅，意欲出版，我展而观之，此字虽不能和我祖先的字同日而语，且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毕竟有了长进。作为父亲，我是非常高兴的，若有高明者览之，幸勿见粲。

书香兴，家道兴；书香败，家道败。我以为此乃千古不易之真理。愿我儿再接再厉，勤奋读书，勤奋习作，让书香充溢门庭，代代相传。推而广之，让族中、邻里处处充满书香，让全乡、全县、全国处处充满书香，岂不伟哉！

儒释道与陈继春的哲学

陈继春的《人本主义的多元合力存在论》面世了，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哲学著作。

一个哲学家的产生，一定是吸足了先哲营养并积蓄了当时精神精华破土而出的。陈继春亦然，在“砸烂孔家店”的年代，他却抱着“四书”精读。他一向勤于学、乐于思，正是这种治学态度成就了他高境界、大胸怀的哲人品格。他曾写过剧本，哪怕是一出小戏，一段唱词，无不蕴藏着一种哲学的内涵。他务过农，做过企业，不管做什么，都会把他所做的一切放在宇宙人生、国家天下的宏观格局中思考。他总想通过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思考，发现一些尚未被人发现的哲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深深印在他的心灵里，他怀着对祖国、

对世界、对人类、对未来深深的爱，不停地学，不停地思，不停地实践，每有所得便迫不及待地向周围人、甚至想告诉国家领导人。

古今哲学家无不关爱着宇宙人生，无不想彻底弄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人本主义的多元合力存在论》，论的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他用他的发现，他的独见，他的视角，他的方式，构建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千万别小看了这个体系，它的产生也许会动摇此前的，执其一端的某些哲学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对人生、对世界、对宇宙的看法和态度，从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极其严重的生存危机。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危机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类自己。《天演论》中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哲学观念，从西方传到了东方，传遍全世界，人们都以为是对的，因而引发了世界性的疯狂竞争。竞争到现在才发现，不是“适者生存”，而是“无有适者”。事实又一次证明，科技的发展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做指导，一定会把人类引向灾难的深渊。《人本主义多元合力存在论》认为，宇宙是一个宏观的多元合力结构，地球是宇宙合力存在中的微观合力存在。不论宏观存在，还是微观存在，都处在一个相互作用的中和关系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类以及万物就生存在地球这个多元合力存在之中，人们亲切地把大地称做母亲。然而人类是唯一有能力干扰地球的物种，地球一旦被扰乱，灾难就会降临。因此古人留下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格言，说的是人类不知为人类自己，必然遭到天诛地灭。历史自从进入所谓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就把目光投向了不可再生的物质。可以断言，能源耗尽之时，就是地球毁灭之日。有人会说，煤、汽、油资源耗尽，人类肯定可以找到新的能源代替。《人本主义的多元合力存在论》告诉我们，煤、汽、油等物质是地球这个多元合力存在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一旦耗尽，地球原本应具有的作用力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任何科技力量都无法阻止的。地球变暖，冰川融化，气候失常等等异常现象渐渐显现，已经在告诉人类：地球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地球！“二十一世纪，人类如果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到孔子、大乘佛法中寻找智慧。”这是 1988 年 75 位诺贝尔奖得主巴黎会议上发出的共同宣言，然而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问题毕竟得由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解决。这本哲学著作就是在这么一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陈继春在《我的宇宙观》中写道：“可以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在人类是宇宙的心灵这样的人本主义前提下，确立我的宇宙观、人生观。对世界、对人生作本源的探讨，无疑属于哲学的范畴的。古今中外赫赫有名的诸多圣哲，思想智慧之光彪炳日月，照耀千秋。他们的学说著作汗牛充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人类智慧的源泉。本人虽然读书不多，但确实是

在贤哲思想的启迪下，对宇宙，对人生萌生了自己的思考。”“没有什么至高的万能创生宇宙，宇宙就是创生本身。互相作用的合力就是绝对存在，互相作用的合力就是至高的万能。当宇宙终于创造了人类，宇宙从此有了灵魂。”

这就是陈继春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其实，人本思考始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不记哪位哲人还说：“人为天地之心”。宋代大儒张横渠所谓“为天地立心”，其实立的就是人。道家哲学的核心也是人。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禅宗也认为，佛不在彼岸，就在自己的心中。”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儒、释、道哲学的核心思想都是人本主义。至于不生不灭，生成万物的存在，老子名之曰“道”。陈继春名之曰“多元合力存在”，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说明是什么样态的存在，后者却明确表述为多元合力存在，如果这个哲学观点能够成立，人们就会重新认识一切，这也许是一个重大突破。

《人本主义多元合力存在论》用大量的篇幅论说人如何能成为人，“离开人类的社会化，没有任何个体的人化！离开人类个体的人化，没有任何人类化！有助于人类人化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有助于人类社会化的人类，必然是人化程度较高的人类！”这个问题，《中庸》作过精彩的论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一个至诚的社会，才能使人成为人，人成为人，才能尽物之性。才能帮助天地化育，人能帮助天地化育才配称为人。否则，人很难成为人！

“珍爱自身存在，必须将自身融入社会存在！珍爱自身赖以存在的存在，为宇宙系统增光添彩，这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使命所在，价值所在！这也正是建构人本主义的多元合力存在论的宗旨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难以解决的课题，哲学家就是为了解决时代课题而生的。但愿更多的人能成为思想家、哲学家。但愿地球这个多元合力存在宇宙中，四时有序，节侯无差，稳稳当当地运行。但愿人类爱人爱物，乐山乐水，在地球上平平安安繁衍生息。

（《榆林日报》·文化陕北 2010 年 12 月 13 日）

春耕时节话春耕

都说气候变暖了，可在陕北给人的感觉更冷了，已到春耕大忙季节了，天气还忽冷忽热，连会品天气的老农都摸不着老天爷的脾气。

气候问题已经成了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头等大事。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为八节。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四月立夏小满，五月芒种夏至，六月小暑大暑，七月立秋处暑，八月白露秋分，九月寒露霜降，十月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十二月小寒大寒为二十四气。一气三候又分了七十二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年复一年，春夏秋冬，循环不已，运转不穷，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律，农民就是按这个规律进行年复一年的农业生产，并总结出了永远可以使用的生产经验。为了把这些经验一代一代传下去，编成谚语，口口相传，形成了一部“活农书”。过去的农民大都不识字，可就凭着这部“活农书”进行耕作。现在所说的“气候变化”，指的是气候变化没有规律了，不正常了。这是一件自从有了人类以来，最为严重的事情，如果南北极的冰雪融化了，就会使桑田变为沧海。如果气候真的变化了，就意味着地球上的动植物将要灭亡。

气候是否真的变化了，现在要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就今年的情况看似乎真的有了变化。农谚说：“二月清明一片青，三月清明不见青”，按正常的气候，清明出现在二月，节令提前，气候暖得早，虽是二月，但一到清明节百草萌发，遍地一片青绿。今年的清明节就在二月，可今年的清明节看到一片青绿了吗？没有。连桃花都没有开。旱魔死死赖在南方不走，春姑娘在北方姗姗来迟，这一切是不是在告诫人们气候真的在变化呢？

谁都得承认现代科技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谁也得承认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为严峻。如果没有水利设施作保障，粮食生产是最有风险的产业。然而粮食生产又是人类所有产业中最最重要的产业。

古代有一本书《范子计然》说：“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晁错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曹植也说：“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金，而美一餐。”毛泽东也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些话都在告诫人们必须重视农业，尤其必须重视粮食生产。舜命后稷：“食为政首。”

事实上，有许多人忽视了农业，忽视了粮食生产，尤其是没有经过饥饿岁月磨练的人，他们不生产粮食，没有“粒粒皆辛苦”的感受，白米白面糟蹋无数，老年人管不下，常常会说：“让他们好好饿几天。”现在的年轻人幸福，他们根本不知道饥饿是个什么滋味，平时他们说

饿了，只是想吃东西了。民国十八年陕北遭了大年馑，我虽然没有赶上，可我的父辈赶上了，一个元宝换不来一个窝窝头，一个女儿换不来一碗稀汤汤。吃草根，吃树皮，吃白土，甚至易子而食。1965年那一场旱灾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过，春上无雨，三伏无雨，到了秋收时节，粪堆还在地里放着。全凭政府从东北调来救灾粮，保住了陕北人的命。救灾粮能救下命，可解决不了饥饿，有许多人还是被饿肿了。那一年的大旱，使人们意识到兴修水利的重要，因此各个村都兴修了不少水地，有建高抽条件的村子，还打了蓄水坝，建了高抽，为的是营造一点能保命的田。1962年，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筐洋芋，不少干部就回家去种地，有人说他们没有远见，其实，他们为的是保命。

当下最要紧的是搞好春耕生产，能多打点粮食。《汉书·食货志》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为什么必杂五种呢？因为五谷杂粮收不收，各有年份，糜子不收谷子收，黑豆不收高粱收。哪一种作物出在哪一个年份，我们事先不得而知，多种几个品种其实是为了多加几个保险系数。今年的墒情好，一般来说捉苗不会有问题，但是气候变化无常，种进去天气太冷，一时出不来就会坏种，即使出了苗，气温忽然下降到零度以下，就会冻死。农谚说：“四月八，冻死黑豆荚。”因此，发现苗不全的情况就要及时补苗，俗话说：“见苗一半收。”

出外打工的农民，或年轻干部，能请准假的尽可能回家去帮助家人把地种好，“地是刮金板，人勤聚宝盆，粮食才是人的命根根。”“市上买的吃不出，地里打的吃不了。”现在的农村人多数把眼光盯在城市，打工挣钱，村里留下了“三汉”，即老汉、憨汉、懒汉。出外的人如果不回去，地就“荒”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田里的”才是正务。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喂猪站羊的吃肉。”“一粒下地，万粮归仓”，“春播迟一天，秋收迟十天”。粮食比什么都金贵，尤其是饥饿的岁月。

其次要检查水利设施，“保命田”还有没有？有多少？陕北这块土地是盛产五谷的宝地。不仅能保住陕北人的命，而且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月给延安同志的复电里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防。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

陕北不仅有丰富的地下资源，而且地上的物产资源也是极其丰富的，尤其五谷，自古就是陕北的特色经济。加上现代科技的支撑，能源开发的资金保障，陕北农业会搞得更好，更有特色。

（2010年4月15日发表于博客中国）

羊绒自述

我叫羊绒。过去，我是不值钱的，不知怎么搞的，现在，我的身价高了，羊的身价高了，羊肉也因此而贵得惊人。

春天，耿大爷把我从羊身上搔下来，放入柳筐，挂在门肩上晒太阳，我任风吹日晒，无人过问。一天，村里来了一个收购员，耿大爷这才把我取下来。糟透了，我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垢。耿大爷把我放在地上，抖了打，打了抖，生怕有一点点不干净的东西混在里边。就这样，收购员还在挑剔，说：“看看，脏成什么样子！这东西出口，出口你知道吗？就是卖给外国人。和外国人做买卖，我们可要讲信誉啊！”

“是的，是的”败坏国家声誉的事，耿大爷是不干的，他把我又是一顿抖打。直到连收购员都有些不耐烦了，他才息手、过秤。

就这样，我离开了耿大爷。

当天，我和我的同类被运往县城。听收购员在嘀咕什么要“加工”我们。“加工”以后才卖给县外贸公司。

我想所谓“加工”大概是就象耿大爷那样把我们身上的尘垢弄得更干净。可是，我想错了。原来，收购员是些二倒贩子。一夜之后，我的体重增加了许多倍，在我身上不知粘上些什么东西，使我们简直难受得要命。

我恨这些二倒贩子。县外贸公司就那么容易骗吗？等着瞧吧，你们倒霉的日子快到了。第二天，外贸公司的经理来看货。他个子矮矮的，可长着一双谁都难以欺骗的眼睛。他随便看了看，就看出了问题。

“你们这是什么绒毛，全掺了假。”

“经理”，二倒贩子眨巴了几下熬夜熬红了的眼睛说：“别那么认真了，如今嘛，宜假不

宜真，瞒公不瞒私，你就收了吧，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

“不收！你们怎么能这样坑害国家呢！你们知道，这东西要出口，出口你们懂吗？就是要卖给外国人，和外国人做买卖，我们可要讲信誉啊！”

“嘿嘿，这我们知道，”二倒贩子脸上现出了一种复杂的笑容：“老兄，别假正经了，咱们又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何必打官腔呢？货出手以后四六分红，你的六，我们的四，怎么样？”

“三七开！”经理突然象个赌徒似的冒出了这么一句。

二倒贩子犹豫了一会儿，说“三七开，就三七开，反正羊绒出在羊身上。”

生意成交了，他们谁拿了多少钱，我就知道了，也许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

这些事情，要不是亲自经历，谁能相信呢？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谁知海关上检查得十分严格，凡做了假的全堆放在码头的另一边，象小山那么高。我和我的同类挤在一起，被篷布包起来，等待上面发落。

不久，我又被带到一个科学院的实验室里，经过化验，我身上粘着一种由许多分子组成的混合物，有机油、有滑石粉、有白矾，甚至还有铅粉，要把这些复杂的混合物从我身上分离出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院组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经过 808 次试验，研制成了一种洗涤剂，这种洗涤剂妙极了，只要把我们这些掺假的绒毛在里边泡一泡，就洗得一干二净。

我们终于被装上了远航的货轮。

回想这段经历，真是一场恶梦啊！要是有一种洗涤人心灵的洗涤剂该多好啊！就象 808 那样。（1981 年发表于榆林报）

蛤蟆的“自白”

我就是蛤蟆，我的天职就是消灭害虫。

可是有一天我被一个法师抓住了。

“先生，我对人类又没有什么害处，你放了我吧！”我恳求说。

“你对我来说太有用了，哈、哈、哈！”

后来，不知法师把我带到什么地方，我又渴又饿。

“先生，给点吃的吧”。

“好好好，这就给你吃。”他把一颗花椒硬塞进我的喉咙，简直把我噎死啦。然后他偷偷把我放在一家人家。等到半夜主人睡着时，我使劲咳了几声，想把那颗该死的花椒咳出来。主人听到响声，点着了灯，我害怕起来，不敢响了。主人听听没有声音，又去睡了。过了一会儿，我实在忍不住，又咳了几声，这下可把那家主人吓坏了，大喊“有鬼！有鬼！”

这家人请来了法师。法师说：“你们家里有鬼作祟，如不驱除，定要大难临头。”他让别人在屋外等着，自己一人进了屋。只听他嘴里念念有词，还有麻鞭在空中挥打着。过了一会，法师找到了我，打开门说：“恶鬼已被我抓住了，我把他变成一只蛤蟆”。这家人不知道怎样谢法师才好，送了他好多好的钱。

法师带着我到了村外边小河旁，把花椒从我喉咙里取出说：“去吧，你帮了我的大忙。嘻嘻！”

我虽然受了点委屈，但明白了一个道理：“鬼，原来是骗人的把戏！”（1980年2月发表于上海《儿童时代》）

刘文西心系古葭州

5月20日，著名画家刘文西又一次来到葭县。

葭县是一块十分贫瘠的土地，迄今没有探明地下有什么宝藏，而地上的物产也称不上丰饶。然而在这个艺术家的眼里，这里却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藏。他说：这是我第五次来这里探宝。他每每来到这里，就万分激动，因为毛主席在这里留下闪光的足迹，因为这块土地上浸满了革命烈士的鲜血，因为这里的人民像黄土地一样纯朴、厚实、无私，还因为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1962年冬天，背着画夹第一次来葭县时，他只有二十八岁。大卡车沿着一条刚刚修通的山路慢慢爬行，他看到的是一座座光秃秃的山岭，一道道深幽幽的沟壑，很少看到树，也很少看到水，这和他的家乡——江南水乡，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这些看去几乎没有多大区别的山山岭岭，开始，他还看着新奇，可看得多了，也就失去了它们的魅力。可是，当接近葭县山城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奇观。时值清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远处，一座拔地而起的石头城像一幅剪影，映衬在五彩的天幕上，层次那么多，那么分明，看去那么辽阔，那么深远，他好象看到了半个地球。他被这从未见过的奇观迷住了。下了车，选了最高的一个山岭，为葭县山城画了一幅长卷。之后，不仅他自己画，他还要把同伴领到这里画。

葭县山城不愧为一座历史名城。它东临黄河，晋陕峡谷激起的浪涛声不绝于耳。站在城头远望黄河，来无头去无尾，浩浩荡荡，气势那么宏大，那么奥秘。城西山脚下流淌着一条温顺的河流，那就是葭芦河了，这条河硬是劈开百丈岩层为自己闯开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在城南汇入黄河，使山城形成了个“半岛”。此城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因此有“铁州”的美称。然而城内乏水，视水如油，难怪县志上有“有水则雄关，无水则鬼国”之说。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曾驻足城头，东望黄河，感叹不已。葭县虽然穷，可这里的人民是那么坚毅，那么无私。艰苦的生存环境把这里的人民铸造成了人类中最能吃苦最能革命的人群。因此，毛主席为中共葭县县委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光辉题词。毛主席在葭县的神泉堡、朱官寨、梁家岔、白龙庙、南河底、谭家坪等十几个村庄度过了九十八个日日夜夜，乌龙河畔，五女川里到处留下了毛主席闪光的足迹。那些笼着羊肚子手巾的陕北汉子，那些不住嘴地唱着陕北民歌的婆姨女子，不管是谁，都能说出几段毛主席的故事。那些故事激励着这位年轻的画家从早到晚的画，不论是在寒冬季节，还是酷暑盛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葭县，不停地画。他在陕北画了万张速写，他创作了许多陕北题材的画，在他的陕北农民形象的画卷里，有的人甚至可以认出自己来。他的那组反映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组画——《曙光就在前面》，一共八幅画，其中，《凭城东望》、《决不过黄河》、《稳如泰山》、《我是毛泽东》等四幅画，就取材于葭县。刘文西说他一来到葭县，就好象回到家。的确是这样。他曾经画过的那些农民、船工，那些婆姨女子，那些基层干部都成了他的好朋友。他的那幅《同欢同乐》几乎在家家户户的墙壁上挂过。有人指着画中的人说，这个像谁，那又像谁。都能叫上名字。在刘文西的画册里有好些人物形象，葭县人看着面熟。根据朱官寨有个叫成女的小姑娘的形象，他创作了一幅《陕北姑娘》的画，不仅在国内展出过，而且在新加坡展出过。

刘文西几乎画了一辈子陕北农民，可他越画越想画，他说这是个永恒的主题，他希望能有更多艺术家能在这里探宝。

夜已经深了，可刘文西住的房间里还挤满了人，看望他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有的还给他送来了大红枣。他们谈得那么热火，刘文西简直是个葭县通，他对葭县那么了解，那么关切。他不仅是一个人民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真正的人民代表。他不管走到哪里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全国人民代表，人民的呼声，人民的要求，他都要详细记在本子里。当他得知葭临两县准备在黄河上架桥时，显得十分高兴，说：“这个构想很好，黄河上一旦架起了桥，就把葭县变活了，葭县人民在战争年月付出的太多了，我想谁都会支持的……”

最后，县长请他题词，他挥笔写下了四个大字：勤政务实。

（1986年）